

社會科學教科書（第三冊）

第二編

論唯物史

（上）

編者 基士甫柯 塞姆

譯者 儀沁 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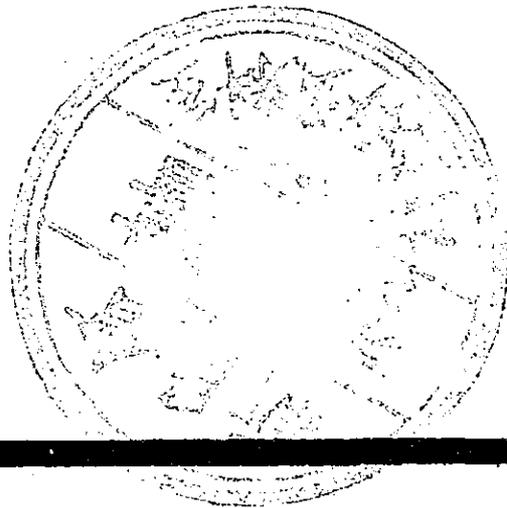


春秋書店版

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社會科學教科書 第三冊
第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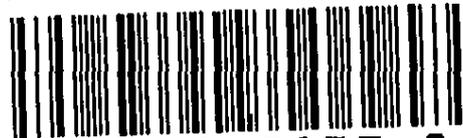
史的唯物論



一九三〇年

春秋書店版

500
686



3 0568 5837 0

: 3
1

目次

社會科學教科書
第三冊 第二編

史的唯物論(上)目次

原編者 塞姆柯甫士基
譯者 劉沁儀

一、馬克斯主義之歷史的準備

馬克斯以前的唯物史觀	坡克羅甫士基	三
威哥的歷史法則	拉發格	一〇
「人性」之觀點	普勒哈諾甫	一六
王政復古時代的法國歷史家	普勒哈諾甫	三三
史的浪漫學派	默林	三三
英國經濟學、法國大革命、及德國哲學、		
——三者之綜合者馬克斯主義	考茨基	四二
史的唯物主義是歷史之產物	默林	五四

02641

二、達爾文與馬克斯

達爾文學說之基礎的要素……………恩 格 斯……………六一

達爾文的理論……………滌密里亞塞甫……………六四

馬克斯主義與達爾文學說……………普勒哈諾甫……………六六

人類勞働之過程……………馬 克 斯……………六九

動物的器官是人類的用具……………普勒哈諾甫……………六七

達爾文與馬克斯……………滌密里亞塞甫……………九〇

達爾文學說與馬克斯主義之光笈之下的美學……………普勒哈諾甫……………一〇四

自然環境及人爲環境……………拉 發 格……………一二三

人爲環境之作用……………拉 發 格……………一二八

三、自然條件與技術

地理的關係與生產……………普勒哈諾甫……………一三三

自然條件之影響……………馬克斯……………一三六

風土、種族及生產方法……………默林……………一三七

爲什麼以技術爲基礎而不以自然爲基礎？……………布哈林……………一四三

人——自然——社會……………克勒士·克羅士……………一四五

人口增加不是第一義的要素，是第二義的要素……………布哈林……………一五一

機械之發達……………馬克斯……………一五四

作生產力之基礎、的技術……………布哈林……………一七三

技術之發達……………考茨基……………一七五

技術的發明……………哥爾特……………一八〇

發見與發明……………默林……………一八八

自然——人體——社會……………考茨基……………二〇三

第二編

史的唯物論(上)之一

馬克斯主義之歷史的準備

馬克斯以前的唯物史觀

馬克斯主義二特徵——唯物史觀與歷史的動因的階級鬥爭說，在「共產黨宣言」未出以前早已各處散見過。三百多年前意大利的著述家馬基亞菲里（Machiavelli 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就曾對其故鄉佛羅連士（Florence）的政治機構之變化，用經濟的原因——即階級鬥爭——作過說明。詳言之即他在其著「佛羅連士史」中，說明了最初封建地主與都市商人鬥爭、其後商業家和產業閥又與小手工業家勞動大眾等鬥爭、的各點。佛羅連士本很早（十四世紀起、直到十五世紀）就轉化成了商業民主主義。其情形很與眼前英美有相似處。當時佛羅連士的廠主，對全歐羅巴供給種種商品（尤其是羅紗），銀行也對



全歐國王供結金錢。在眼前我們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自然是司空見慣，但當時封建的歐羅巴所全莫明其妙的許多事物，在這佛羅連士則都能最初發見。比方交易所的勝負，保險、公債、統計、等等就都是。并且這世界最初的產業民主主義，在某一種意味上決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各國。卽在那佛羅連士裏面已經有了累進稅。其最低率爲收入的五%，最高率爲三三%。這累進率可謂非常之高；然佛羅連士又還有苟不參加生產則任何人——總經營者也好勞働者也好——不得享有政治權的制度。以致名門貴族爲想不作一無權利的廢人起見亦起而加入於毛織業者機織業者的組合之中；將羊毛堆在門首，將羅紗掛在門前，以作自己的『職業』招牌。這進步現象雖在現代布爾喬亞西中亦不能看到。現代布爾喬亞的觀點并不否認懶惰者之得享有權利；而且除英美各國現今通用的一切權利以外，有時候雖名譽亦可得而享受。

佛羅連士經濟之成熟得早，正說明了佛羅連士著述家的思想所以也那麼成

熟得早。不過自新大陸與印度洋發見及世界貿易移向大西洋、的情勢一形成，意大利在經濟上的優越地位就完全喪失而從歷史舞台上退下來了。而且陷于沒落之淵不得翻身了。馬基亞菲里則正是這沒落的目擊者。可惜新成爲資本主義的驕子、的各國，則和這佛羅連士的制度及其思想家的觀念內容等距離得很遠。以致『佛羅連士史』一書遂成爲完全孤獨的作品，除極小範圍內的極少學者以外幾沒人知道。同時著者雖對於事實加過精當的指摘，將事實概括起來、賦之以科學的意義、的點，則也還沒有做到。蓋科學發達的程度，在當時十六世紀的時候還極低，所謂科學的世界觀還沒有形成；故像社會現象之合律性、及社會現象依一定的合律性而循環、的思想，在十六世紀也就無由產生。即社會科學還不會占得到坐位。

科學的世界觀之開始形成，是一世紀後的十七世紀的事。當時自然界各種現象的過程——人們的行動過程也在內——內具有機械的合律性在、的觀念，

已漸次有力地展開起來了。如運動是一切現象的基礎、一切皆當準據運動的法則——即當準據機械的法則、的話，德卡特 (Descartes 一五九六——一六五〇) 就曾指明過。荷布士 (Thomas Hobbes 一五八八——一六七九) 及斯批諾扎 (Spinoza 一六三二——一六七七)，又當由此導出過：人間的行動是表示原因與結果之機械的連鎖的、中世紀關於『意志之自由』的學說全是無稽、等唯一而又正確的結論來。

斯批諾扎且曾這樣說過：『使隕石亦能自作思索，則亦將自信其隕落是出于善意』。——由此、和別的一切現象之發展相併行，人類行爲的合法則性之說明就開了端，即進向科學的歷史理論之第一步，就開了端。

這理論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東西的話，由荷布士說的：爲生活而鬥爭、爲生活之福祉而鬥爭、是人類行動之基礎的彈簧、的話內就可看出。蓋他——荷布士是不認政治的行動——即爲權力而鬥爭——爲自立的行動的，而只認爲是派

生的行動的。即他認人們之爲權力而鬥爭，要不外是因一獲得權力即能對其生活給以全部的福祉。這見解是非常和經濟史觀相接近的。其後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則更不過是這早一世紀的偉大的唯物論者的後繼人及宣傳家。荷爾巴哈——站在同一見地之上、即站在一切事物皆常用物質的原因去作說明的同一見地之上、而著有名的『自然之體系』“*Systeme de la Nature*”的荷爾巴哈 (Baron Dietrich von Holbach 一六三三——八九)，且對於先知過去——即先將過去探究清楚——據以發見支配人類歷史的法則時、則未來亦可預測、的信念，得到了極科學的歷史的解釋。他是法國大革命的最先驅，他曾說過『在革命騷動的震撼之中，即在那把政治的社會實情把握了、而且常要導成現成組織之顛覆、的革命騷動之中』，『凡參加在那裏面的人各按其所佔的地位而發生的言論行動、思想意志、乃至熱情等，其非自然的一個也沒有，當行動而不行動的也沒有，當造成結果而不造成的也沒有。……這事實，在對於參加

者的精神上肉體上所起的一個一個的動與反動能有理解、而且能够評價、的那種具有智能的人，是很明瞭的」云云。

同時科學與哲學的發達全過程，亦會必然地向這歸結路上前進過。即不僅唯物論者如此，就是唯心論者康德（Kant 一七二四——一八〇四）——所謂這時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也會用同樣的眼光看過歷史。

在康德時代，歐洲各國關於人口增殖、犯罪、死亡率、等有規則的及統計的觀察，已經發生。這些觀察，對於人們最「偶然的」最「隨便的」行動亦會明晰地證明過是有條理而且合法地要反復發生的東西。并且因為有了這種觀察，某月自殺的應多、某月自殺的必少、的那類事情，亦能預為明白指出。

——康德之主張歷史法則存在，就是根據這種單純的統計觀察出發的。他固然不是唯物論者；但他也會認定為生存而鬥爭的那種努力是推着歷史向前發展的主要彈簧。即他的立場也是和「經濟史觀」很相接近。

這正是說十七十八世紀的中世教會主義的世界觀，已被新世界觀起而打破；後來『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則是深刻地從這新世界觀的基礎理論內發源。也就是說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各大思想家還只能朦朧暗昧地看到的東西，一到大革命後即立具起明確的形態。

比方階級利害之相衝突，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里亞間利害之不一致，在『宣言』未出世的二十年前，就已由聖西門提出過，給過基礎。

經濟現象在歷史裏面所占的先行性，也是一切空想主義者（上舉的聖西門、傅立葉、倭文）所共同承認的；他們都會想過在生產關係之改革上建築人類將來的幸福。

三世紀之間如急湍地流下來、愈到近代則愈成爲壯大的巨浸、的這思想之流之中，馬克斯與恩格斯之參加進去，自然在我們眼裏絲毫也不足以減殺『宣言』的作者的意義。因爲任何偉大的作品，都是將人們腦內多年貯蓄下來的

材料加以總結帳而成的。(坡克羅夫士基：「經濟的唯物論」)

威哥的歷史法則

歷史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等，在舊的著作之中除對威哥(Vico)的「苛爾習與里倭盧西」一著以及其他亂七八糟地被引用乃至亂七八糟地被論述的他的二三著述以外，差不多都不會讀威哥。而反之這威哥則在其自著「新科學」之內，把歷史的基礎法則，公式化過。

威哥他說人類社會進化的基本法則，是在於一切民族皆不問其人種的起源如何及地理的分住如何、皆必得通過一個同樣的歷史過程、的點上。唯其都要這樣通過一個同樣的歷史過程，故某一民族的歷史就是發達到了較高的階段的

別一民族、的歷史之反復。

他說：『自野性、野蠻、殘虐獠悍、的狀態起以迄於人類進於開始文明的階段止』，即人類到了定住的狀態的階段止，『有一一切民族歷史所必通過的、永久的、理想的、歷史存在着』。(註一)

他所完全不曉得的莫爾干，則更用實證的完善的公式採擇了和這同樣的法則。同時後一個美國的人類學者，且將前一個拿破里 (Napoli) 的哲學家從一切民族皆依一預定計畫而發達、的見地下所導出的種種民族的等質性，歸之於兩個原因。一即人們的精神有近似性，二即人們在其發達當中所不能克服的障礙、又有同一性。對於人們有精神的等質性的點威哥自然也是相信的；故他曾說：

『人性之中，必得造出一切民族所共通的精神的言語來；這言語是一樣地標示生活上有活潑潑地的作用、的物之本質的，又是含有和物之種種關係相對

應、的同一表現在內的；這種言語之存在，在作民族生活法則的諺語中可以看出；這諺語自古迄今雖表現方法不一、然內容則同』。(De'li Elm. XXIII) (註

二)

(註一) 威哥時代的意大利語當中，*Civili Nare* 的那種動詞恐怕還不曾有。法國最初使用這個字是十八世紀的事，用以標示進步的運動的意味的。法國學士院 (Academie) 初將「Civilisation」一字插入於其辭典當中是一八三五年的事，故看來其發生極近；傅立葉唯用之為標示近代布爾喬亞時代而不曾作過他用。

(註二) 亞里士脫特勒士，(Aristotles) 曾特別注意過諺語。他所編纂的『諺語集』雖已不復存，然古代許多著述家率曾看到過。西涅沮且曾這樣說過：「亞里士脫特勒士曾在諺語裏面找尋前代哲學思潮的遺物。該哲學思潮雖在人們不能不遭逢的革命當中已歸滅亡，然其遺物則在斷章絕句的特殊而又確切的形態之下保着殘存。換句話即諺語與諺語裏面所表現的思想，具有和最高哲學相同一的重要意義；諺語所具有的高尚

印象正即最高哲學的遺形。理由則因古代人較現代人遙為深刻地理解過真理為何物之故。——如西涅涅這個話所證明，古代是以爲人類不進化而且退化的。希臘神話裏常能發見這觀念，『伊里亞』(Iliad) 內部尤數見不鮮。同時看黑羅德特所說的『通過了神、英雄、人、三時代』的話看起來，埃及的僧侶也同抱過這思想當可曉得。蓋人自從其種族的共產主義時代走出以後，『唯在退化中的。幸福、地上的樂園、黃金時代、等，就概以爲是過去了的東西。進步乃至『人們具有向完成之路去的能力』等思想的發生，是布爾喬亞西接近政權的十八世紀的事。不過布爾喬亞西也如基督教一樣將幸福之實現弄成來世天國的功課了。空想主義的社會主義家才又從天國拉到地上來。而聖西門說過『衆生不是在我们的後面而是在我們的前面』。

莫爾干說『一切人、一切種族與一切民族的智力都相同，而能力可有限，故人智必然地是偏差僅少而以同一的形態表現出來的東西。國不論遠近，時不論古今，人智所達到的成果，要爲一致的經驗的結果；而且爲形成該結果之連

綿的論理的鎖上各環的』。(II. C. IX)『人類中各種族之形成，和地質之漸次形成一樣，亦可視之爲在發達途上重積下來的盤層的系列。同時將各種族這樣加以區分時，由野生狀態以至于文明的人類進化過程，就可瞭如指掌』。

(IV. C. I)『爲什麼呢？因爲人類發達的過程，差不多隨處都是一樣的形態』。

(III. C. v.) (註) 同時、將經濟的進化過程作過研究的馬克斯，對莫爾干這思想更作了明證。其『資本論』序文內說：『工業方面發達較多的國家的情形，卽發達僅少的國家將來的光景』。

(註) 莫爾干：『古代社會』·一八七九年。

爲此、故依威哥的意思，一切民族無例外地不能不創造的『理想的歷史』，并不是表示什麼崇高的存在所預定的神之計劃、的東西，而純是表示純人類的歷史自己進步計劃、的東西。歷史家如將種種民族所造出的各種階段加以研究而比較之，且依其所到達的發達之相對的高度而將各階段分類之，則這

計劃必立能認識到得。

半世紀以來對野蠻民族古代民族及現代民族的研究所得，已實證威哥這法則極爲正確了。即都已表示了任何人不向其地理的與人種的起源如何、在其發達過程上皆非通過同樣的家族、財產、及生產形態不可、又非通過同樣的社會的政治的機關不可、之說之爲真理了。丹麥的人類學者，曾最初確認這事實而將前史時代分爲三期，即按其最初製作用具的材料爲何而分之爲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各民族的歷史之有違異，并不依其種之爲白、黑、黃、紅，或地之爲赤道、南極、北極，純是根於威哥所謂『理想的歷史之階段』，或莫爾干所稱『歷史地重積下來之盤層』的高度、如何而來的。同時爲想保着馬克斯的形容詞時，則爲站在較高發達階段的民族是對較低的民族表示該民族自己將來的光景。

人類精神的活動，亦服從威哥這法則。言語學者與文法學者，關於言語與

國語之形成是依於同一的法則、的點，已經發見過。人類學者們則於種種野蠻民族文明民族裏面，如威哥之尋出過同一的諺語一樣、復尋出過同樣的故事傳說，像這些相同的故事乃至沙加 (Saga) —— 北方民族的古代傳說。編輯者原著)，並不是各民族個別地製出的，各民族只是古昔相傳地保存下來的；其創出則許多人類學者都以為是由於一共通的中心地，由此中心地始擴及於全世界云。不過這見解，因其和對人類創造力之別的方面的觀察相矛盾，即對該創造力之別的精神的社會的乃至物質的產物在觀察時相矛盾，不能成立。

靈魂這觀念及由這觀念所發生的其他各觀念、之發達史，就是人類精神發達上非常有同一性的好例。靈魂這觀念，在一切民族——雖最野蠻的民族——裏都能够發見。為從死者的靈魂——占領過迷信家的頭腦的死者的靈魂——得到解放起見，一般民族都會一樣地想過：在屍體解體之後當為靈魂覓到一個最完全最幸福而又最新的住家使之能够繼續其婆娑世界的的生活、庶不致再返人世

作怪害人。同時野蠻民族內的靈魂觀念，固然依其後民族發達階段之進展而其重要性日有減失，但再到一發達階段時則又安定，而且為想獲得支配的地位起見又由其自身創出了神的觀念、『偉大的精神』、等類的東西來。詳言之，該觀念在有史以前的英雄時代確曾存在過，誰也容易承認；但在後一期——有史以後，地中海沿岸各民族內則缺如；這是歷史家所能立證的。然到基督教出世的數世紀前則又出現了，以來直到今日還占領人類的頭腦。但歷史家都僅對這顯著的事實加以確認，而不對之作說明。大概他們在其自家的研究範圍內也就找這說明不出來，因為這是必待適用馬克斯的方法、去研究經濟的環境之中所起的各種變化之後、而後這說明才能希冀其發見的。（拉發格：『馬克斯的史的唯物論』。）

「人性」之觀點

認『人性』爲法律道德政治經濟各領域內、解決一切『麻煩討厭的事件』的最高法院、的點，是前世紀啓蒙學派所倡，而十九世紀著述家所完全紹繼接收下來過的。

如果人們出現到這世上來的時候沒有帶來什麼先天的『道德觀念』的既成貨的話；德行這東西之爲一般所尊重又是如羅克（Locke）所主張乃是因其爲利益而不是因其爲生而有之、的話；社會的功利主義，又如埃輝修士所說是最高法則的話；舉凡論人與人的相互關係時人又是物的尺度的話；——則人的天性當然可結論之爲是判別世上何事爲利、何事爲害、何者爲合理、何者爲不合

理、的立腳點的。從這立腳點出發，十八世紀的啓蒙派曾考察過當時存在過的社會制度及他們所希求過的改革。而人性又是他們和反啓蒙論者爭論時的主要論證。這論證意義在他們眼中之爲如何重大，看康多爾塞（Condorcet）下引的推斷就可曉得；即康多爾塞說：『正義與權利的觀念，在具有感到觀念而且作成觀念、的能力的人們，必是同樣地形成的。故從而這些觀念就是一樣』。固然人們有損毀這種觀念的事。『但正當地判斷的人，其在道德方面概如在數學上一樣、不可避地也是必要達到一定的觀念的。這等觀念——人性——，是人爲能感能思的動物的真理、所產出的必然的結果』。但是法國啓蒙派的社會見解，其實并不是從這麼一種貧弱的真理所導出得來，而是從其周圍環境所暗示得來。即他們念頭上所記得的『人』，并不是僅以感覺能力及思維能力爲特色。換句話他們之所謂『人性』，還要求一定的布爾喬亞的秩序。（荷爾巴哈的著作正包含得有後來憲法會議所實現的各要求）。即人性還要求商業自

由、要求國家對市民財產不加干涉、要求『自由放任』、及『讓我過身！』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等。(註)——啓蒙主義者蓋是藉一定的社會的必
 要及社會的關係之分光鏡 (Prism) 而看人性的；然歷史在他們眼前放有某一分
 光鏡的事他們又竟老不以爲異。他們空想着人性那東西也是藉他們的口而發言
 的東西，也是結果必爲人類文化的代表所理解所評價的東西。

(註) 自然不是常常這樣。有時候哲學家且常於人性的名義之下忠告立法者對『財產不平等
 應謀其平等化』。這是法國啓蒙派很多很多的矛盾中之一。不過這個我們在這兒可不
 必問。我們在這兒唯一重大的事，是指出抽象的『人性』在各個場合完全成了適應社
 會——尤其布爾喬亞社會——的某一社會層的具體要求。的論據，一事。

本來、人性這東西如想其能具最高尺度的作用，則當然當認之爲永久具有
 的東西，及不可變的東西。由前揭康多爾塞的話就可看出；他們啓蒙派的人對
 於人性實在是曾這樣考察過。但是人性如是不可變的話，人類的智識發達行程

乃至社會發達行程又怎樣可依人性作說明呢？我們得問：一切發達過程是什麼？——自然很明白那是各種變化的系列。然則這些變化可由一永久具有的某一不變的東西去說明得了麼？抑是不變的量老不變，而可變的量變化不息麼？然啓蒙派的人又深知其不如此。因此他們爲解脫這困厄起見就指示之曰：不變量到某一定限度時能成爲可變量、云云。譬如說人皆須閱歷少年期青年期壯年期等種種年齡。在這種種年齡中，人的要求決不一致。『少年期生於感情、空想、及記憶之中，日唯遊嬉是務。歌唱小說是耽。於是而到憧憬熱情之年，精神唯激動傷感是求。再次則到思考力發達及理性亦發達的壯年，而且這理性自身亦要求實際練習，其活動能擴及於知識慾所觸及的一切事物之上』。

這個發達過程是誰也相同的。其如是如是的推移則是人的天性使然。唯其這種推移是各人的天性，故在全人類的精神發達裏面也就能够看得出來。各民族皆以詩謠始，以哲學終，亦由這推移才能說明得了。云云

但是很容易看出：這種「說明」實在是什麼說明也不成，要不過是對人類智識發達過程的敘述上給以一種繪畫的色彩而止。（比喻之爲物，總是對被描述的對象之特質能給以鮮明的印象的）。同時又很容易看出：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一方面這樣作些說明，他方面又已回到了迷宮裏面去了，即所謂環境造人、人又造環境、的那麼一種迷宮去了。殊不知實際上人類的智識發達——即人性之發達——必依社會的必要才說明得了，他方面社會的必要之發達又必依人性之發達才說明得了。（普勒哈諾甫）：『史的一元論』。

王政復古時代的法國歷史家

『依歷史研究的結果可得而定出的一重要結論是：政府是國民性質上

最·有·効·的·一·個·原·因·；·國·民·的·長·處·或·短·處·、·精·力·或·弱·點·、·才·能·、·文·化·或·無·知·、·等·，·概·不·是·由·於·氣·候·關·係·或·人·種·的·固·有·性·而·形·成·；·自·然·對·於·一·切·的·人·都·給·以·一·切·的·東·西·；·唯·政·府·才·本·原·地·將·作·人·類·共·通·財·產·的·本·質·，·在·其·所·支·配·的·民·衆·之·中·保·存·之·或·廢·滅·之·。『在意大利，氣候上、人種上、都會沒起過什麼變化（野蠻民族之侵入亦為力極微、不會使其固有性有所變化）』。

『自然對一切時代的意大利人都是一樣；變化過的祇是政府。這變化總是先於國民性之變化而發生，或則伴着國民性之變化而一同發生』。

——對國民之歷史的命運絕對地依存於地理的環境、的學說，西士底會作過如上的駁論。（註）這駁論決不是沒有根據的東西。地理這東西，在事實上本不能說明盡淨歷史上一切事象。因為歷史究竟是歷史。即西士底所謂地理的環境始終是不變的東西，唯政府才是變化的東西。不過這宗事情究沒什麼關係，我們現在所引為有興味的，全然是別有所在。

(註) 「近代意大利共和國史」(Simondi: 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âge.

巴黎版·第一版·序論·五——六頁)

讀者當立能感到：西士笞底持地理的環境之不變性和國民之歷史的運命之可變性相比較，而曾將該運命歸之於一個根本原因——『政府』身上：即曾歸之於該國的政治組織身上。換句話即一國民的性質完全依政府的性質而轉移。不過他——西士笞底——這樣範疇地將該命題斷定之後復立會筆鋒一轉，對這斷定加了極重要的收束。即他說：政治的變化先行於國民性格的變化，或則同伴。這一來則政府的性質必有時候要成爲依國民性格而轉移了。換句話西士笞底的歷史哲學又必碰着我們所已知道的法國啓蒙學派的矛盾，即一國民的道德風俗依存於其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復依存於道德風俗、的那種古來的矛盾了。而他西士笞底也就果然和啓蒙派一樣，對這矛盾不能解決。只能將這二律背反(Antinomie)的某一部分，按各種場合用作自己判斷的基礎。同時、他的立脚

點既明是站在這國民的性質依存於其政府、的見地之上，他對於『政府』這概念又必不能免於要賦以誇張的廣汎的意義。即認政府爲決定地包含得有一定的社會的環境之一切固有性、與一切特殊性。更確切地說時，在他、一定的社會環境之全固有性概是『政府』所能左右，概是政治制度的結果。但這是十八世紀的看法。法國唯物論者爲簡潔雄勁地表示自己對環境能絕大地給人們以影響、的自信時，曾這樣說過：“C'est la législation Qui fait tout”（萬物皆依存於立法）。而一說立法，他們又差不多完全是以政治的立法、國家組織等爲念。有名的威哥的著述裏面，有『用羅馬的政治革命說明羅馬的民法、的法律制度上的研究』一小論文。這小論文雖是十八世紀最初期的作物，其中所表現的民法對國家組織的關係、的見解，則直到法國王政復古以前都還占住過支配的地位。——啓蒙主義者把一切一切的東西都還元到『政治』去了。

但『立法者』的政治的活動，雖不一定都是合目的的，然全爲意識的則不

待說。而人的意識的活動又是跟着人的「意見」走。故法國啓蒙派的人縱在其想將環境之全能的思想加以鮮明的表現的時候，也還是不知不識之間要再回到意見具有全能的思想去無疑。

但西士筭底雖還是站在十八世紀的見地之上（註），較他後起的史家則別抱新裁了。

（註） 他在一七九六年已開始研究意大利共和國的歷史。

蓋雖最「啓蒙的」思想家亦曾被陷於迷路、的法國大革命的過程與歸結，曾澈頭澈尾地將人的思維具有全能性一思想打得粉碎無餘了。結果於是許多人對於「理性」的力量就根本失望；不失望的人則仍傾其全力去接收環境萬能的思想、而開始研究革命的發展過程。不過在王政復古的時代人們對於環境也就已經是從新的見地出發下觀察而不復是一仍舊貫了。因爲這革命以迄王政復古一大串的歷史的大事件，把「立法者」、把政治組織、都笑死下去了；一定

的社會環境之全固有性之基本原因，再歸之於政治組織——即再歸之於憲法——之所爲，未免太過於滑稽奇異了。換句話，政治的憲法要不過是結果、是派生的東西、而不是原因、的點，人們現在都明白起來了。

故基卓 Guizot 在其『法國史論』“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註一）內就說：『著述家、學者、歷史家及文明批評家的大部分，概曾努力於想依這社會之政治制度去說明該社會之一定的狀態，及其文明之程度乃至種類。但是要知道政治的制度且理解之、時，究以從社會本身之研究爲出發點的辦法爲賢明。蓋這種政治制度，在其未爲原因以前已經作了結果。社會未受這制度所影響而變化以前，已早創出了這制度。我們應該不依政府的形式去測斷國民的狀態，在判定政府應爲什麼形態、及可得爲什麼形態、以前，我們首先應研究該國民的狀態究如何。……社會，社會的構成，依存於社會的地位、的個人之生活狀態，各人所屬的各階級的關係，——要言之人之市民的狀態（L'état des

Personnes)，無疑義地才是一切想曉得國民是怎樣生活的、的歷史家以及想知道國民是如何被統治的、的文明批評家所第一應當注意的問題。(註二)

(註一) 初版一八二二年。

(註二) 『論文』(Essais, dixième édition, Paris, 1860, p.p. 73—74.

這見解和威哥的見解恰相反對。威哥用政治革命說明民法的歷史，基卓則反之用市民狀態——即民法——說明政治組織。同時這法國史家基卓，在其分析『社會之構成』時復進了一步。即他說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一切國民裏面、的人之『市民的狀態』，都與土地關係(état des terres)有過密切的關係。故這土地關係之研究，又應在各國民之市民的狀態之研究之前、行之才妥。即曰：『為理解政治制度起見應先研究社會內各種階級層及其相互關係。為理解這種種階級層起見又不可不曉得土地關係的本性』。(註一)——他自己於是依照這見地將最初兩代王朝的法國史加過研究。結論則為這二

代王朝史是當時種種社會階級層的鬥爭史。在其所著『英國革命史』裏面，則又更進了一步，認這革命是布爾喬亞對貴族制的鬥爭；說明該國的政治生活時復不僅說對其土地關係要加研究，而且對其一切財產關係皆須研究的點也加了承認。（註二）

（註一）『論文集』第十·巴黎·一八六〇年·七五——七六頁）

（註二）十七世紀英國的宗教政治各方面的黨派鬥爭，『隱蔽了社會問題，即隱蔽了各階級爭權爭勢的鬥爭。誠然當時英國也如其他各國一樣·各階級的分界並不明白；其相敵視的程度也不如別國那麼利害。國民都沒忘記有力的男爵等不僅爲其自身的自由而且爲國民的自由·曾奮鬥過的事。即農村的貴族和都市的布爾喬亞西，曾亘三世之間於英國自治體的名義之下共集於議會開過會。但是到前世紀，社會各階級間的相對的勢力生起大變化來了，而政治組織上則又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大變化伴起……布爾喬亞西·農村的貴族·及在當時農村內占極大多數的農業家（Farmer）與小地主

等，對於社會無數事件的行程，並未給以和自己的地位相當的影響於其上。他們雖然長成了，然還是沒有露頭角，故和其他——較他們尤為低下的——別的社會層一樣，為謀自己猛烈的發展而想摺到一切機會。的氣勢，——私慾觀念極強的氣勢，就從這裏面發生了出來。『英國革命史論』“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 Angleterre”, Berlin, 1850, p.p. 9-10.) 又基卓所著關於英國第一次革命的六卷，及對其他當時種種社會活動家的生活錄，亦請參照。著者在這些著述當中亦差不多沒有放棄其階級鬥爭的見地。

但對歐洲政治史抱過這種見解的人又決不僅基卓一人。其他許多史家亦概如是。其中如滌也爾(Auguste Tier)及密涅(Mignet)尤可看出。前者滌也爾在其『英國革命之展望』“Vues des revolutions d' Angleterre”裏面曾將英國各次革命史概描述之為布爾喬亞與貴族的鬥爭史，且記其第一次革命曰：『舉凡其祖先曾對英倫施以征服的，概棄其居城而馳集於國王陣營內，而一一就其和自己

身分相當的位置。都市的住民則大舉投入反國王的陣營之中。當時的軍隊，正是方面是由安逸與權力之名義召集的，他方面則由勞働與自由的名義召集的。舉凡參加前者的，不問其出身如何素性如何，都是以不勞而享樂爲業，爲擁護其和自己的利益相適合的利益起見而參集於王旗之下的。反之當時從事於生產事業的舊英倫征服者的遠裔中出來的子弟，則概參加了自治黨 (Communists) 』。(註)

(註) 滌也爾全集第六卷·十版·『歷史研究十年間』“Dix ans d'études historiques”，六

六頁。

依滌也爾說時，當時的宗教運動，實不過當時實質的生活利益的反映。『雙方都積極地爲實質的利益而鬥爭。其他皆不過招牌，口實。擁護臣民的，大部分是新教徒。他們在宗教方面尙且不想服從，別的服從更不待說。贊成反對黨的人，則屬於英格蘭教或舊教。因爲他們在宗教方面尙希冀權力存在及對

人民課稅，別的方面也更不待說」。滌也爾於此且曾引過霍格士的『潔姆士二世治世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James the Second”內下列那些話：『自由黨（Whigs）對於一切宗教的意見都用政治家的眼光觀之，其對舊教之特感憎惡，亦與其是說由於對該宗派的迷信或所謂偶像崇拜的點而來，反不如說是由於想在國家設定一絕對的權力的希冀所致』。

又照密涅的意見說時，『社會運動是依支配的利害而受決定的。社會運動是在種種障礙裏面追求自己的目的，待其目的達到則停止而進於第二運動，而與第二運動相交代。這第二運動最初是不太現形的，變為支配的運動的時候才顯現。而後讓於第三運動。封建制度的發達行程就正是這樣。蓋封建制度在其未實現以前，就已為人們所必要，而在該必要當中存在過的。這是其第一期。第二期的時候則和必要相對應的事已日在減少而在實際上則又還存在；故其結果該實際的存在也就必得消滅。——革命該是用這樣一種方法幹的，除這方法以

外的革命會沒有過一個』。(註)

(註) 『聖路易的封建制度及其王朝時代的法律的影響』『De la féodalité des institutions

de St-Louis et de l'influence de la législation de ce Prince?』, Paris. 1822. p.p. 76-77。

密涅在其所著『法國革命史』裏面又曾從各種社會階級所具有的「必要」、的見地上觀察過各種政治事件。依他所見，則這等階級鬥爭正是政治上各種事件的主要動力。……

唯其如此，故我們如向基卓、滌也爾、密涅等問以一定的國民之國家組織究是由於道德風習、抑反之道德風習乃是創自國家組織、的話時，則恐他們必將同樣答之曰：國家組織與道德風習之間的交互作用雖為極大而且極鮮明，但二者都是由於第三者而來的，即由於更深遠的一動因：『人·之·市·民·的·狀·態·、人·們·的·財·產·關·係·』而來的。——這樣，於是十八世紀的哲學家等所迷陷於其中的矛盾，就很像獲得了解決似的。……

但是十八世紀哲學家的矛盾，要不外是十八世紀的社會觀：（1）人與其一切思想感情都是環境的產物、（2）環境又是人的產物、人的『意見』的產物、——的那種社會觀的派生物。——這話我們上來已經說述過了。現在基卓等的這新歷史觀，把該法國唯物論的根本矛盾可以說加了解決麼？他們王政復古時代的法國歷史家，對市民狀態之起源會怎樣作過說明呢？又財產關係，——依他們說時必得深深地加以研究而後理解歷史的鍵鑰才可獲得、的財產關係，其起源他們又會怎樣加過究明呢？

他們說：人的財產關係是屬於其法的（權利）關係之領域之中。財產這東西，首先是一種法律制度、權利制度。所謂歷史現象的理解關鍵當求之於人的財產關係之中的話，要即這關鍵是存在於法律制度之中之謂——云云。不過這制度乃至這機關是從那兒來的呢？基卓曾說過很正確的話，即說政治組織未曾作原因以前，先已作過結果；社會先創成政治組織，而後受其影響開始變化。

——但是和這同樣的話就財產關係不能說麼？財產關係不也是未作原因以前已先作過結果的麼？社會不是未從財產關係受決定的影響以前，已不能不創出財產關係來的麼？——對這種至當不移的質問，但是基卓曾如何答復過呢？——他的答復非常不充分。

基卓說西羅馬帝國沒落後登到舞台上來的各民族之中，其市民的狀態都與農業有密切的因果關係。人對土地的關係，決定了人的社會地位。全封建時代之中，全社會的施設要不外就是土地關係。這關係——基卓又說——『在最初野蠻民族侵入後的時候，本來、』是依土地所有者的社會位置而決定的。即『土地依土地所有者的勢力程度如何而具某種性質的』。——但是這種時候，土地所有者的社會地位又是依什麼而受決定的呢？『在最初野蠻民族侵入的時候，本來』土地所有者的自由程度的大小及勢力程度的大小又是怎樣決定的呢？是依征服者——蠻族——之間從來的政治關係而受決定的麼？——但

基卓說過政治關係不是原因而是結果。我們要理解羅馬帝國未沒落以前的蠻族的政治形態時，還得依著者的勸告先研究其市民狀態、其社會組織、其社會內各階級的關係、等才對。但這樣一加研究時，問題必又會把我們導回到人的財產關係由什麼決定、一定的社會之所有形態由何決定、的點上來。而反之如果不用此財產關係而用什麼自由與勢力之相對的程度、去作各種社會階級之狀態之說明時，則我們必將毫無所得。那將不成爲說明，不成爲答案。那將不過是變詳細了一些、形態也變了一些、的一個新的質問。（普勒哈諾甫：『史的一元論』。）

史的浪漫學派

史的浪漫學派之爲非常和史的唯物主義見解相接近的話，我們當很感謝布連塔諾(Luigi Brentano)；因爲他心地純良地把普葵里洋(Lavergne Peguillien)著作(註)內下一段文章引了出來，我們才有機會曉得這回事。普葵里洋曾說：『社會科學之到現在猶僅發達些些，恐怕是因我們對於經濟形態不能充分看清楚所致；乃至對經濟形態之爲一切社會組織國家組織之基礎、的點，全然忘記所致。我們會忘記過生產、生產物的分配、文化及其普及、國家立法及國家形式、等之內容與發達，是特別是從經濟形態內承受下來的，一事。又曾忘記過這些極重要的社會契機雖在其當然可適用的場合亦是從經濟形態當中必然地產生出來——恰如授胎力與受胎力二者交互作用之中產生出來的萌芽一樣——的，一事。同時又曾忘記過舉凡社會的病患所在的地方，該病患的根源必是在其社會形態與國家形態之間的矛盾之中的，一事』。——這是史的浪漫學派內著名的代表所說的，亦即一八三八年馬克斯在『德法年鑑』上曾盡量地加過視

蔑與批評的人所說的。假使我們不注意馬克斯是主張生產與分配不從經濟形態導出、經濟形態反是從生產與分配當中誕生、的話時，不僅馬克斯爲什麼要那樣批評他、我們不能曉得，而且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輪廓且像是從他拜借得來似的。

(註) Lavergne-Pegullien. "Die Bewegungs und Produktions Gesetze" S. 255.

同時與該見解恰相適合的應用，也由他們史的浪漫派找出來了。即他們對於布爾喬亞的古典經濟學表示反對，即對該經濟學所解釋的布爾喬亞的生產方法是自然的、且宣言布爾喬亞的社會形態是自然的永遠法則、的點，曾表示反對。不過他們的反對法如何，則他們對於布爾喬亞經濟學的這種誇張，提出過擁護貴族階級的意見；即對地主農奴間相對立的經濟關係，他們會想用宗法家長的理論去作解釋；對自由主義派之要求政治自由，又提示過國民的真正組織不在於一片憲法的法律之中、乃在於力之經濟的關係之內、的反

對意見。他們這種對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所作的理論鬭爭，很明瞭地是在封建時代移傳下來的主人對奴隸的關係上、對布爾喬亞西和貴族階級間的階級鬭爭之觀念形態、所作的反映。蓋這兩階級都是想用其和自己相適合的色彩塗之於生產方法爭之觀之上，而視經濟形態為永遠地自然地不動搖的法則的。

其次在這鬭爭上，粗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據為根據的是抽象的空想，他們史的浪漫派所據的則為現實的峻巖的事實。前者多少帶理想主義的色彩，後者則多少具唯物主義的精神。理由則是由於二者——相爭鬥的二階級——在各自的歷史發達階級上具有差異的原故。詳言之即布爾喬亞西因為想做支配階級，遂將自己的天國認作是萬人幸福的天國。而他方面貴族階級則因素是實際上的支配階級，故遂對經濟關係——作其支配權的基礎的——的屬性賦以浪漫的色彩。

上舉普葵里洋的文章，即正是這浪漫色彩之表出。他所想獨斷地說出的

話，是封建的經濟形態應為一切社會組織及國家組織的基礎、——國家的構造與國法須和這經濟形態相適應、以及社會的病患之發生是發生於與這經濟的形態相離反的時候、——等點。故他毫不隱諱地、在上引文句之後還跟着這樣加過論證：

「各市區內富裕而有教育的人應即是該市區的立法者及執政者，他們應利用他們對市民大眾——受他們所保護的——的關係上所表出的權能」、組成貴族制度以君臨該市區。和這貴族制度一同具有勢力的是耑制政治；但耑制政治在其最極端的時候也不是用「法律的壓迫」以圖破壞社會力、的東西，反之乃是非「利己主義」的王政，「用平等的愛、從其皇皇上位、統治此黎民而擁護其利益的東西」。——普葵里洋這個話，目的在什麼地方自然很明瞭。即他要不外想將封建時代的榮華再為中興一遍。即他說：「und der König absolut wenn er unsern Willen thut」（帝如尊重我們的意旨、則讓他作獨裁者吧）。——

這正是一種封建的社會主義；其價值如何，看『共產黨宣言』內所作的批判就明白。即曰：『有時候他們用痛烈而又精銳的理論把布爾喬亞西擊破過。但同時他們對於近代歷史的進程又全沒理解能力，於是浮出了滑稽的印象』。

對封建的經濟形態以外的任何經濟形態皆絕無理解能力——表面的理解都不可能——的點，正是浪漫學派的一特徵。他們這種為鈍感的階級的利己主義所浸透了的浪漫學派，只知道想用這封建的經濟形態去滲透空間地上以及一切法律的、經濟的、國家的、宗教的、的關係。故有時候遠遠地聽時雖很像也搬出了和史的唯物主義相類似的問題在那兒高談闊論，但實際則和科學的智識之階級的利己性相同，究與史的唯物主義相隔天壤。二十年之後格爾里亞甫與習塔里二人，在其和拉薩勒相爭時也正是取的這浪漫派的態度。格爾里亞甫常在普魯士議會——地方法官們所組成的——內，對着自由主義的反對黨員發揮後來拉薩勒所發展過的組織理論。但同時給這史的浪漫派最後的先生們以致命的

打擊的，實則又不是別人而就是拉薩勒，即拉薩勒在其所著『獲得了的權力之組織』一書內對他們擊破至於體無完膚。要之他們這學派和馬克斯的史的唯物主義是半脈也不相通的。（默林：『史的唯物主義』）

英國經濟學、法國大革命、及德國哲學、——三

者之綜合者馬克斯主義

在十九世紀，有三個國民是近代文化的培植者。把這三個國民的精神加以認識、且將其創成的一切果實加以研究、復將自己所處的時代之一切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了的人，才能幹成用這十九世紀的手段所能幹成的最大偉業。

這三國民之思想之綜合，是將三國民之純國民的偏倚的思想加以除去之後的最高的統一，亦即馬克斯恩格斯之歷史的活動之起點即在其中。

如前所述，在英國，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就已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已發達到了最高階段。事實首先由當時英國經濟狀態就說明得明瞭。即英國在十八世紀就會用其征服與侵略的植民政策，大大地得了橫利橫財；大西洋沿岸的歐洲大陸各國，因此且概陷於一蹶不振。蓋英國是一島國，別無常備軍的必要，盡其全力於海軍的發達上既可以自衛，復獲得了海上的支配權。

同時炭與鐵的豐富，又使英國將其由植民政策所獲得的資源，得以適用於大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上。這大工業則又藉英國海上的支配權獲取了大量消費生產物——在鐵道未發達以前不依海道即不能輸送的大量消費產物——的全世界市場。

結果、於是在英國不僅比任何國早可以研究資本主義及其傾向，而且比任何國早可以研究由資本主義之成長所產生的普羅列塔里亞的階級鬥爭。并且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法則之認識——即經濟學，也唯英國獨發達，其他各

國遠遠不及。依世界貿易之發達而後發達的經濟史與人種學二者，也是一樣唯英獨盛。因為比任何國家英國都易於發見未來世界的胸臆內所藏伏的東西。新的社會科學於是就在英國發達；支配全歷史上的社會發達的法則於是就在英國容易看出；從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一致、的基礎，在英國也就容易築成。——不過雖然如此，英國也究不過在這點提出過一些最好的材料，講到研究方法則又決不能說是最為完全。

英國因為是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故其布爾喬亞西之獲得在社會上的支配地位是在封建制度尚未充分完成——在政治經濟精神三種生活當中——其任務與作用的時候；亦即布爾喬亞西自己尚未獲得完全的自立性的時候。故結果、那麼強有力地助成過資本主義發達的植民政策，反於領主方面給了一種新的力量。

加以如上所述，常備軍在英國是不必要的東西，因而就會沒充分發達過；

結果強有力的集中的政府權力，也就曾未發生過。換句話即官僚沒有組成過強有力的組織，支配階級的自治反亦和官僚比肩併駕地獲得了著大的權力。——這一來於是階級鬥爭也就常是分散衝突的形態，不能取得嚴密集中的性質。

從而一切生活與思想也就總是依新舊精神的妥協而敷衍下去。新興階級的思想家與前衛鬥士，原則上概不排斥基督教、貴族制、與帝制。其政黨亦不提出廣汎的綱領。唯努力於某一定時候最有益的實際策略，包羅萬象的綱領毫不在他們意中。并且他們這種狹隘性，保守主義，對政治領域內些細的日常事務亦喜歡小題大做的脾氣，及對遠一點的前景則持否定的態度等，不僅是某一階級的特質，且成了一切階級的特質。

法國則和此完全不同。其經濟發達情形比英國低得多，其資本主義的生產品大部分是奢侈品，其小資產階級在國內占大勢。像巴黎那種大都市的小資產階級，且是全國國民生活的指南針。同時這種五千以上的人口的大都市在鐵道未

築設以前已經有了很多。其作用又較今日爲尤大。理由則是鐵道修成之後大衆迅速的輸送才可能，以前則軍隊也是少數而且散在全國不能集中，其武裝又不完全，民衆與之鬥爭時又不是和現在一樣毫無防備，之故。故人口衆多的都市於是就成了有力的反抗中心。巴黎人尤其常特具頑強性；大革命未發生以前，就曾常常挾其小資產階級的反抗力逼着政對讓過許多步。

且在普通義務教育未實施以前，郵政通信未改善以前，鐵道與電信的恩惠之下全國的週刊新聞尙未普及以前，法國大都市市民之知識上的優越，從而其精神上的力量，較其他任何國家皆遙爲強大。信扎往來與對談，往往成了廣汎的無教育的大衆之唯一教育源泉。并是依這兩方法，藝術的見解也形成了，科學的認識也獲得了。大都市尤其——較之小都市與農村——在這些點上發達得最快。有智識方面的興味的人差不多都集於巴黎，發達其精神的力之餘且希望發見其應用之道。住在巴黎的活動家更不待說都是知識上的優越分子。

在這些知識優越、好作批評、好扯皮而又果敢、的巴黎市民的眼睛面前，誰知國家權力及支配階級迄未有過的破產光景忽然展開。

首先、阻碍法國經濟的發達的一切原因，復日陷法國封建制度及國家於沒落。尤其植民政策使國家犧牲極大，兵力財力皆為衰弱不少，其中尤其農民與貴族之經濟破產更因以加速。而國家、貴族、教會、三者，則反藉常備軍、發達的貴族制度、及國民自立的組織、等之缺如，巧妙地集中權力於政府手內，財產的破產雖劇，仍用盡一切方法擁護其專制的支配。

結果於是所謂法國大革命的瓦解崩壞之局遂得以形成。巴黎小資產階級及普羅列塔里亞遂於短期間內征服了全國，且和全歐羅巴開起火來。同時革命在思想方面也早已充分地發生，即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西所指導的民衆要求、和國家權力所擁護的貴族僧侶利益、之間之激烈而且日日增大的矛盾，在大革命未發生以前就在思想方面已充分地釀起了激戰。即一切傳統的權威，都被宣告

了死刑，宣告了革命。在英國退化了的貴族所引為消遣消閒之具的唯物論無神論，及布爾喬亞西一勝利即立刻歸於消滅了的唯物論與無神論，一到法國則成了新興階級圈內最果敢的改革者之精神的糧。同時該國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上的經濟基礎雖處處不及英國那樣鮮明，然在「革命之國」的法蘭西，一切階級鬪爭，還概是完全以獲取政權為目的、的鬪爭，即各大政黨皆不拘屑於部分的某一二改良之實現，全精力皆集中於奪取政權的一點上。再則由奴隸化了的階級起來遂行這奪取權力的工作時則全社會關係之改造必可伴起、的理論與事實之被一般所認定，在法國又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容易作到。因為在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國雖經濟思想特發達，法國則政治思想發達到了最高的頂點。英國為妥協精神所迷漫，法國則急進主義激上激下。英國在組織的建設方面許多些細的日常小技小業雖發展，法國則暴風雨一樣純是一革命的熱情的國家。

且果敢的實踐的急進主義未發生之前，果敢的思想上的急進主義在法國又

先已存在了。而在果敢的思想之急進主義之前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又無一是神聖，無一而不可侵犯了。即這思想之急進主義，曾毫無所恐懼且毫無所容恕地將各種思想都追究到過其論理的最後巢窟之中，且從其中提出過作出過一切極端的結論來。不過同時這塊天牌也還有一背面在。這背面是很不漂亮的。即其表面思想與行動之燦爛而熱烈的結果，裏面遂不知不覺地包含了許多缺點與錯誤。詳言之即在一心一意只求急速地貫徹最後最極端的目的的當兒，誰知革命思想對實行上的許多準備竟都沒工夫加以顧及。大家在那以鉄血的暴風雨去奪取敵人的堅壘、的熱狂的冀望之中，誰知竟都忘記了作包圍之組織的準備。——結果於是最高真理之火樣的憬憧，遂得了一種材料完全不充分所齎來的過急的結論。非堅苦毅忍去加研究不可的場所，誰知竟爲警拔的、逆理的、偏鋒的、說法所占領。生活之無際限的多樣性，竟想用幾個很簡單的公式與標語去汲盡之。——英國人那樣低劣地覺醒，法國人這樣言辭上陶醉。

在德國則我們發見一特殊狀態。其資本主義之發達較法國猶不及。全歐羅巴之世界貿易的大海路——大西洋，既差不多全從這國家切斷分離，三十年戰爭後慘澹的荒廢又恢復得極其遲慢。以致比法國還多多地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度。同時強大的集中的國家權力又還不具備，分裂成爲多數的小國家。而且一個大的都市也沒有；小國林立之餘又小市林立。致狹隘的怯懦的小資產階級愈得以創成。——德國封建制度之崩壞并不是國民革命的力，全是異國侵入的力。掃除德國主要各州的封建制度的，并不是本國的市民，全是法國兵。

固然，英法二國的布爾喬亞西所獲得的非常巨大的成功，也很給過德國小資產階級隊伍以強烈的興奮。但是他們內部最有精力而又具教養的分子的這學步英法的熱望，卒因西歐布爾喬亞西所取得的一切活動範圍、皆不許他們染指、的原故，他們這熱望還是無由實現。他們創立大工業而指導之、在議會與有力的新聞雜誌上發表言論給國政以影響、及占取海陸軍的首席、等的可能

性，概被奪去了。「現實」在他們是很不愉快的東西。他們於是想離開現實，去從事於純思索與純藝術的生活。結果遂在這些領域內他們大努其力。而且實際地創造了偉大的東西，遙為英法所不及。英法二國出過披特（Pitt）、霍克士（Fox）密拉波（Mirabeau）、單當（Danton）、羅伯士披爾（Robespierre）、涅爾孫（Nelson）、拿破崙（Napolion）、等，德國則出過希拉（Schiller）、歌德（Goethe）、康德（Kant）、菲希特（Fichte）、黑格爾（Hegel）等。

思索於是成了德國偉人們的主要職業。依他們說時世界是理念（Idee）作支配。同時思索方面的革命，又即化全世界為革命、的手段。現實愈不愉快即愈超越於現實之外、從現實那框內脫出而抱擁一廣大的東西、的見解，在他們裏面是很強很盛的。

英國人考案如何保障其海軍與工業的勝利、的最良方法時，法國人考案如何保證其陸軍與革命的勝利、的最善方法時，德國人努力開拓其用新方法以達

到思想與學問的勝利、之道。

但是德國人的這種勝利，和英法二國人的勝利一樣也具有不利的方面。這不利的方面在理論上實踐上且都表現了出來。即他們忘却了現實，故對世界就繼續地離反，對理念的意義就繼續地再評價。他們用其離世獨立的生活為生活。他們的頭腦，離開了生出他們及曾實現過該頭腦的人們、而獨立。他們自滿自得於自己理論之公正，如何去獲取實現這理論、的力，則不冀求。在深奧的他們德國哲學的背後，在他們德國科學之基礎性的背後，及至在他們德國理想主義之高飛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完完全全為一切權力作鬥爭、的逃避，及隱藏了無際限的實踐力量之缺無。他們德國的理想，誠然比法國英國的理想都高得多。但如何去接近這理想的工作，則他們絲毫也沒有幹。人們於是都以為理想是可望而不可接的東西。

英國人額上烙了保守主義的印；法國人額上刻了言辭上急進主義的字；德

國人，以來也就蓋了瞑想的理想主義之章。最近幾十年大工業之發達結果，自然這影響也少了很多；不過尤其以法國革命精神之侵入為最重大。這法國革命思想與德國哲學方法之會合流為一，我們只要想想德國後起的幾個偉大的智者——如海涅 (Henrich Heine) 及拉薩勒 (Ferdinand Lassalle) ——就可知道。同時由英國思想所授胎的合流，則更結了壯大的碩果，——我們由馬克斯恩格斯的體系裏面可以完全體得。

這馬克斯恩格斯二人，才理解了政治與經濟、細微的組織事務與革命的大刀闊斧、之概為非常互相制約的東西；又理解了無偉大的指導目標去作強有力的刺擊，則日常事務必無成果；且理解了為貫徹該目標起見不具備能給以必要的力、之無形的預備工作——時，則該目標必失却一切現實基礎，等於空中樓閣。同時又理解了這目標不是單純的革命熱情所能產出，只有依科學方法的忠實適用才能發見；且理解了必在其(目標)與人類的知識總額相合致時，人們才

可以脫出幻影與自欺的牢籠而得到自由。最後在其用德國的哲學方法去研究英國的經濟關係的時候，他們又理解了唯經濟關係是社會發達的基礎；唯在經濟關係裏面這社會發達之爲用自然的必然去運行不息、的法則，才可算出。——他們用這樣一種方法，於是就發見了爲貫徹該目標起見必得如法國那樣：獲取力、獲取政權、才有辦法。

結果、於是英法德三國思想內所包含的一切偉大而豐穰的東西遂被他們所統合，而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就爲他們所創成。（考茨基：『馬克斯與其歷史的意義』）

史的唯物主義是歷史之產物

資本主義社會之對於史的唯物主義的態度，和前代社會之對於達爾文主義及半世紀前之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略約相似。即資本主義社會只曉得嘲笑史的唯物主義而不理解之。對於達爾文主義之爲不僅止於『猴子的理論』、及社會主義之爲不僅講的是『分配』與『幾千年文化成果之掠奪』、的點，該社會經過非常努力之後雖漸得到了理解，然對於史的唯物主義則以爲還不過是『有才能的 Demagogie (煽動家)』的一羣、所圖案出來的『空想』，只用無聊無味的爭論時候的惡言惡語加之於其上就行。

歷史之唯物主義的理解，本質上是和該理解自身所表出的歷史法則，不可分的。這唯物地研究歷史的方法，是史的發達之產物。以前最具叡智的天才也沒想到過。必到歷史達於某一水準的時候，人類才能發見這個秘密。『在以前一切時代，想將推動歷史的原因加以究明是不可能的，因爲那些原因與其手段間的關聯異常複雜而且隱而未彰。到我們的時代，這關聯變成非常簡

單了。於是這秘密的謎也就得以釋然。在巨大的產業侵入時代，——即至少在一八一五年的歐羅巴，英國一切政治鬥爭皆纏綿於地主貴族(Landed aristocracy)與布爾喬亞西(Middle Class)二階級之權方要求之周圍的事，在英國初非無因。同樣的事實在布爾邦王朝再興的時候，法國人一般意識之中也發生過。這再興時代的歷史家——從帥埃爾至基卓、密涅、滌也爾、止，都說過這事實是理解中世紀法國歷史的關鍵。同時在一八三〇年以來，普羅列塔里亞特又如權力爭奪的第三個戰士一樣，而登台而出現於這兩國之內。於是由兩個偉大的階級鬥爭遂進而成爲三個。在這三個偉大的階級爭鬥之中及利益衝突之中，推動該時代的社會——至少推動這兩個最大國家的社會——的力是什麼的點是至明至白的，即各種條件都非常單純化了；你如不想認識這力與這條條件，那你就只好閉起眼睛、自去盲目。(註)——這樣地、恩格斯曾對於歷史發達的水準——引起他和馬克斯的唯物史主義之最初的概念、的歷史發達的水準——作過敘述。至

於這最初的概念其後怎樣地發達過的話，則讀者可以對恩格斯自身去作質問。

(註) 恩格斯：『浮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之終結』。

(默林：『史的唯物論』)

第二編

史的唯物論(上)之二

達爾文與馬克斯

達爾文學說之基礎的要素

達爾文從其研究旅行歸來，帶回了動植物的種類不是不變的乃是變的、的見解。這見解在家裏面更想發展下去時，除用人工去培養動植物外沒有更好的方法。而英國關於這培養的點，又正是古典的國家。他國——比方德國——在這點的業績就遠不及英國項背。此外還有許多結果則為過去百年所發生的事件。因此故要證實這事實（見解）時也就并不怎樣特別困難。而結果，達爾文果就發見了這人工培養在同種的動植物中引起過很大的區別，——較一般所認為別種的種類內的區別還為大些的。於是一方面種類之有可變性的點在某一程度上就得到了證明，另一方面屬性不同的有機體可得而有共同的祖先的點也得到

了證實。從而達爾文又進而探究：在自然之中——即別無培養者之意識企圖介在於其間的、自然之中——，不斷生存的有機體內部是否亦有發生同樣——和人工培養同樣——的變化、的原因在？的問題。探究的結果，他發見了有機體中這種發生同樣變化的原因也具備得有；在自然所生產的極多數的胚種與實際可得而成熟的極少數的有機體、之間的不均衡之中，這原因即能看出。蓋這些胚種都是努力自謀發展的，故結果必然地要發生生存競爭。該競爭而且不僅是在直接的肉體競爭或弱肉強食內表現出來，就在植物——為互爭空間與光綫等場合，也能形成該競爭形態。且在這競爭裏面——雖不激烈而極瑣細的時候亦容易看得出具有某一二有利的個別特質的胚種，總多具些成熟的可能性及增殖的可能性。從而這個別的特質，於是又具有遺傳的傾向。在該特質在同種的許多個體內都表出時，即遺傳累積起來時，該特質且在其所選擇的方向之中有愈益強化下去之勢。反之在不具這特質的個體則生存競爭上必容易敗此而漸歸於

消滅。——結果於是胚種是依自然淘汰、適者生存、的理而自起變化的點就發見了。

達爾文學說的大要如此，但丟林 (Dühring) 氏說：生存競爭這觀念之起源，正如達爾文自己所說當求之於經濟學的人口論者馬爾薩士 (Malthus) 的見解之中；唯其如此，故馬爾薩士那種關於人口過剩的見解、內的一切缺陷——亦正是馬爾薩士那種牧師式的見解的特徵——，也就必傳染到這觀念上來，而成爲這觀念的缺陷；云云。但是生存競爭這觀念之起源必求之於馬爾薩士的話，在達爾文是全沒想過的。他不過這樣說說而止。即說：他的關於生存競爭的學說是將馬爾薩士的學說適用之於動植物界。這個話固然是表示了達爾文的素朴與單純，不必要地而且無條件地對馬爾薩士學說作這種採用，自然是錯誤很大；但是雖然如此，自然界之有生存競爭的事實還是至明至白，不假馬爾薩士的眼鏡也還是一目瞭然。該競爭，是大自然爲消費而生產的無限多數胚種的

量、和一般地能够成熟的少數胚種的量、之間的矛盾；該矛盾的大部分，實際上且是必依生存競爭——有時候且是必依極殘忍的生存競爭——而後能得到解決的。和李嘉圖(Ricardo)根據馬爾薩士的理論而樹立的理論已經消滅了之後、工錢法則猶得存在一樣，自然界的有機體也是具有其人口法則的。固然這法則素來差不多完全沒有人探究過；但其確立，是於種之發展學說上具有決定的重要性的。至於在這方面給過根本的刺激的人是誰？則不待說除達爾文外沒有第二個。(恩格斯：『反丟林論』“Anti-Dühring”。)

達爾文的理論

對生物植物及動物作研究時，能導深切注意的觀察者去達於一個普遍的結

論。即一切這種生存物，在其共通的複雜性之中都是不思議地特別完全。在該完全性之下我們又能看到其各部分——即各器官——是對於其機能適應，全有機體則是對於其所處的環境適應。

爲什麼這些生存物，有機地這樣完全，這樣組織得好，與其生存的各條件這樣調和得如法？——這自然是使自然科學家哲學家等必得注意的問題，也就是使一切意識地追求世界觀的思想家們必得反復研究、不解決則不休的問題。

我們對事實的經驗愈積累得多，則對這完全性、便宜性、組織的自然之調和性、等的驚駭，就愈有增無減。許多思索家與學者，常對於這些事實作單純的證明就算了，就滿足。他們用很鮮明的色彩——有時候且用帶有誇張性的鮮明色彩，描寫這完全性與這事蹟。但是你如提『爲什麼這樣完全？』的質問去問他時，則你可得而拜聽的答復又只爲『因爲造物如此』一句話。這答復，自然不能使一般人滿足，同時也就不成爲一個答復，而且是對答復的可能性本身作

否定的一種說法。同時，因為對這自然之一般的、而且每次用新的形態反復表出的、這謎團不能解答的原故，他方面有一些學者於是更由這屈辱的自覺轉趨於另一極端。即他們對於自然之便宜性及調和性所加的一切新讚嘆之中，都帶起了一些嘲笑與愚弄的傾勢來。這個只要看海涅就知道。海涅——他素來對科學與哲學各種麻煩問題本是最注意不怠的，但他在『加爾擇旅行記』內述及和一單純的市民論自然之便宜性——該市民會以此問題質難他——時，他曾這樣評答過：『我實在忍無可忍了——海涅說——我於是盡力迎合他的口吻說話。我說：對的，對的，自然裏面一切都按排得好極了，——自然為造出甜的肉汁起見就創生了牡牛，為供人類常能得到自己的比較物對照物起見又製出了驢馬，最後為吃肉汁起見又造出了不像驢馬的人類』。——這就明是帶有嘲笑愚弄的態度、的標本。

不待說很明瞭地海涅是具有銳智的。但真實——至少一小部分的真實則歸

他的對方市民占去了。——嘲笑是一不能解答組織的自然之便宜性，二又不能消失該便宜性的。但是不僅止於嘲笑的程度而已，進一步更可驚異的事實則為以沉默去逃避、以抹殺去忘却、——持這麼一種否定的態度的人。理由則因為該自然界的情形太使人易於驚異了，太使人的智力苦於不知所出了，太使智力窮於應付、無從解明了，的原故。例子則看十八世紀的七十年代食蟲植物發見時候的事就知道。當時都否認這發見，而且認為是迷惑在自然裏面探求便宜性的智力、的東西，而咸不好引用牠；——直到百年以後達爾文樹立真理、且發見許多更可驚異的事實、的時候為止。

但是對自然的事蹟徒作抒情的歡喜，或學上引海涅逃避式的方法單作輕蔑的嘲笑，乃至因為對現實理解之無力轉而趨於現實否定、的那種偽懷疑主義等，都是絲毫也不能滅殺現實之意義的，——誰也明白。反之組織形態及生活現象之便宜性，還是不變地在有自覺的一切人們之周圍現象之中對這些人們作

征服者。

正如嘲笑了自然而自然來作答復一樣，又正如自然故意跑來嘲罵人類一樣，——每一新研究一新發見出世時，人類面前即愈一刻一刻地展開了自然之更新的完全性。而在達爾文未將這問題解決之鍵提示以前，問題總是那樣擱着，自然之謎且成了苦痛的謎。

這許久許久以來就期待過探求過的鑰鍵，但誰知竟藏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一日里涅夫會議席上公開的兩頁記錄之中。這記錄之無味乾燥的學術的紙殼之下，誰知竟藏有一嶄新獨自的世界觀，竟藏有自然之全哲學，及藏有尚未研究盡淨的論理的歸結。

不過這鑰鍵究在那兒呢？持着推論尚不足的聯鎖，達爾文果達到了組織的世界之便宜性及調和性之原因、之所預期過的解答、的程度麼？

為解答其進步的原則起見、達爾文所採用的例子太過於獨創、一眼看起來

且太過於悖理 (paradox)、的原故，他的敵人與反駁者——我們國內的人也有幾個在內——遂鬧到如今還不理解他，或不想理解他。他爲解明自然裏面物理的力之影響之下所作成的東西起見，曾將人的知識意志之影響之下所作成的東西搬來作過比較。

人的一切人工作物，及由人所作成的動植物的性質，站在人的利益的立場——不站在有機體自身的利益的立場——上看時、無疑地都是具有完成性的烙印的。即一切這類的有機體裏面，都有人的思想意志等反映在內。牠們都是表示人所想出的某一目的之實現的。但人究依什麼方法將這些目的實現過呢？用什麼方法人把有機形態變化過——使之適應於人的希望——呢？關於這點，在園藝家、牧畜家、實際培養之前，就曾有過所謂撰擇——那麼一個一般的方法存在過，我們知道。這方法是基於兩個根本原則、即基於有機體下列兩個共通性、而成立的，即子肖其親否呢？曰肖，曰不肖。換句話，肖是肖的，但不是無條

件的肖。所謂肖者是自然的一個原則——即遺傳的原則——之結論。所謂不肖者是自然另一個原則——即變異的原則——之結論。蓋有機的生存物，其特質必得遺傳及其子孫。然同時又能變異，該變異亦得遺傳及其子孫。無條件地互相肖似的二有機體決不存在，從一植物、從一果實、所採取的多數種子，有種種的樣相。這種種的樣相傳及子孫。——而人則遂利用這遺傳與變異的二性質之結合——即利用這變異之遺傳的相傳，而適符合自己的希望地、以模造所謂有機的形態。蓋變異性給人以必不可缺少的材料，遺傳性給人以確保這材料、及集積這材料、的方法。人僅小心地在各世代選擇最適合於自己的目的的生存物，而各使之結果蕃殖就行。在這裏面一切不複雜的選擇方法於是即存在於其間。即其根本原則弄清了之後一切選擇方法都很簡明，只在實行上加以非常小心心的觀察與手法上的熟練就得。同時在選擇較為大規模的時候，即如園藝方面某種植物的發育狀態不良須與之以剷滅的時候，則園藝家就不可僅以保護為能。

事，應於苗床中將該不良的苗株細心地全部加以艾除使之不傳及於其子孫。而每年每年這樣按自己的理想去使植物日和這理想相接近，也就正是去促該植物種族之抵於完成的。

一切人爲的種族，爲使之達於完成起見的全祕訣，就在這選擇上，乃至在這選擇過程上。把這一點認清了之後達爾文於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在自然裏面，一種同樣的選擇、一種無人稱的選擇、即無選擇者的選擇、不具有人選擇時的那種指導意志的選擇、——簡言之即在有機體自己的性質與環境之影響之下的選擇，到底有沒有呢？的一個問題。

對於這問題他因爲認飛躍不是很急澈的東西的原故，他於是想到了關於使動植物種族完成的一工作上、人也是到最近才成爲有意識的活動家的。換句話在人未實施這組織的、意識的、選擇之前，還有一無意識的選擇時代先存在過；在這無意識的選擇時代之中人不過是一完全沒有意識的力之要素而止；

——他說。比方野蠻人在凶年饑荒的時候沒有辦法必得滅殺其犬數。這時候他們所打殺的犬，無疑義地是他們平常所不大喜歡不大中意的犬。而結果則全然出于意外地犬種就得到了改良。反之使野蠻人沒有這種減少犬數的必要存在時，則這種不大中意的犬必還保存無疑。

因此我們現在就可暫將自然裏面無意識的選擇究存在與否的問題拋開不談，而能另提出一更簡單更明瞭的質問來：即自然裏面的這種不大招人中意的生物之潰滅、絕種、的事究有沒有？

達爾文對這質問作答復時，曾將我們周圍一時一刻也沒停止過的一大規模的潰滅光景提出了于我們之前；該光景之大，而且使我們望之不覺茫然自失。即那種潰滅絕種的事，實在是有；而且具有如下所引的絕對的數字材料作其證明根據。蓋生物之再生是與其繁殖相連關的。任何植物，如唯一地存在于地上的時候最短期間內必將其所能達到的全地域表面佔盡。比方一株蒲公英的子孫

如全能保存，即風能將其種子全部吹散而一一獲得安全的土壤以待春來，則在其第十代的時候必就將占領全地球而猶有餘。我們國內樹林中一孤立的植物——如千鳥蘭之類，如其全種子都能成長，則到其第三代的時候——即一植物的孫代的時候——必將全地表用緻密的氈絨裹覆起來無疑。一滴之水之中（最近常常聽到這類駭人聽聞的事），有細菌（Bacteria）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個。這細菌每二十分鐘又能增加一倍。同時繁殖得很慢的人也一樣。如果人像北美合衆國一樣在別的地方也總能那樣增殖下去時，則二五三五年之後人數將如蟻羣、摩肩擦背、地上陸上都鋪滿蓋滿。

由這些數字，我們于是能夠作出一結論來。即一個有機體保存下去時，幾百萬的有機體就必消滅。幾多的生命，在其生存可能的狀態之下亦必消滅無影。——然則誰是其選出者呢？這幾百萬生物之中誰當生誰當死，是由什麼狀勢去決定的呢？很明白地、即一切競爭者之間必要發生鬥爭——更正確地說時即必

要·發·生·競·爭·；·而·作·這·競·爭·的·賞·品·的·則·爲·生·命·。至于下這判決的究爲誰，則簡言之就是自然之盲目。由該盲目所下的這些判決之所以是確實，則又正是因爲該判決是盲目的原故，機械的的原故。同時我們對這種正確的判決，如束眼縛手去作思索，則不能得其道，不能明其妙，也是理之當然。因爲這自然之判決是競爭之結果所得來的，是只依該競爭者的價值如何而決定的。詳言之在這競爭當中博了勝利的，必是在其自身的組織 (Organisation) 裏面具有特徵的；該特徵縱是非常沒有什麼意味的東西，但在該勝利者自身則必是能藉以更進于完全、的東西，在其該競爭狀態之下必是較敗北者更適于生存的東西。而同時這一次競爭的勝利又不能以爲就是鬥爭已告完結。鬥爭還繼續未已。各有機體在其生存的各瞬間都是生存于其他無數有機體之多數壓迫之下，即是生存于或想奪其植根立基的片土地、或想掠其休養生息的一綫陽光一塊養分、的其他無數有機體之圍攻夾擊之中的。換句話，任何生存物身上都常懸有一「生呢？死

呢？」的未解決的問題。唯於存在的各瞬間、比自己的敵人還爲完全、的那一個條件之下，一個生存物對於自己生命的權利才能保住。

是故在這生存競爭與鬥爭的時候，作最後的決定的是競爭者自己的完全性究如何、的一點。此外任何條件都不可能。換句話即這競爭的結果，必然地是最完全的得到保全，即得到被選擇的權利。這選擇，這別無選擇者在、的盲目的、自動的、無休無止疲於奔命的、而且自有生動界以來即無限地存在的、這選擇，——在『於有機體有益』、的唯一條件之下對有機體外面大的特殊性與內面構造上小的細微末節，概加以同等的選擇。——簡言之自然之選擇是有機世界之完全性之原因，時間與死是有機世界之調和之調節者。（滌密里亞塞甫：『達爾文與其理論』）

馬克斯主義與達爾文學說

達爾文用生存競爭的理論把動植物種族如何發生的問題解決了。馬克斯則用人類間的生存競爭的見解將社會組織的種種形態如何發生的問題又解決了。論理上說時，馬克斯的研究是從達爾文研究所得的終點出發的。動植物存在於自然的環境之影響之下。自然的環境則以由生產力——依其個別性而或速或慢地發達的生產力——作基礎而發生的社會關係為媒介，對社會的人起作用。達爾文對於種的起源，已經是如拉馬克 (Lamarck) 一樣、不用生物體固有的發達力去作說明，而用生物體對於其外部條件之適應去作說明了。即外面的影響而不用生物體的本性去作說明了。同時馬克斯對於人類歷史的發

達，也就不用人的天性而用社會的人之對外面的自然起反作用時所發生的人間的社會關係，作了說明。故在研究的精神上說，兩思想是完全相同。從而馬克斯主義，故又就是向社會學方面應用、的達爾文學說（雖年代上并不如是，然不要緊）；同時這又正是唯一的科學的應用。因為有些布爾喬亞學者從達爾文學說作出來的結論并不是科學地用達爾文學說去對社會的人之發達研究上作應用，而只是布爾喬亞的烏托邦，而只是非常醜陋的內容之道德的宣傳，和主觀派（指羅羅甫、海羅甫士基、等民粹派的學者說的，——編輯者）的先生們之從事於宣傳其美的內容一樣。蓋布爾喬亞的學者之引用達爾文，并不是紹介達爾文的科學方法而只是紹介達爾文在其著作內所論述的獸的本能。而反之馬克斯和達爾文是一致的；布爾喬亞學者則使達爾文的研究變成了野獸與家畜一致。

（普列哈諾甫：『史的一元論』）

人類勞動之過程

勞動這東西，首先就是人與自然間的一過程，換句話即人依其自己的行爲去媒介、規制、管理、他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的一過程，人對於自然的物材，也是把自己當作一自然力、而與之相對立的。人因爲想占領該物材以供自己生活之用，故將自己身體上所固有的各種自然力——如腕、如腳、如手等——一使之運轉。這運轉的結果，於是人對其本身以外的外部自然就能生出作用而使之變化；同時他自己本身的自然也就因此而亦變化。人是展開自己本性內未覺醒的各種潛在力，而將該潛動力的活動置之於自己的支配之下的。

在這兒，動物式的、本能的、最初的勞動形態，是不成問題的。這種尚

未脫却最初本能形態的人的勞働狀態，較之勞働者自作一賣勞力的人出現於商品市場的狀態，自然是早已成了原始的陳跡。我們這兒所引作前提的勞働，則是人類所獨有的形態之下的勞働。我們知道蜘蛛所作的各種業務很和一個機織工人所作的各種業務相像。又知道蜜蜂之構造其蠟巢，雖建築師亦嘆不如。但是雖然如此，就是一個最差的建築師也比一個最良的蜜蜂要具有該蜜蜂所遠不及的本來的特色。即他在未用蜜蠟去構築蠟巢以前，他必先已在腦子內構築了一遍。換句話他在勞働未開始以前，一個蠟巢已觀念地存在於他的表象之中；他的勞働過程之開始則是這表象內的蠟巢之實現，勞働過程之終尾則是這表象內的蠟巢之完成。即他不僅是把自然的形態加以變化，而且是意識地對那決定——如一個法則的樣子——他的行為的種類及樣式，及使他的意志必須服屬於其下、的目的等，加以實現的。同時這意志之服屬，又決不是支離分裂的行為。除了勞働的身體內各器官之緊張之外，他的注意——即他的合目的的意志

又在勞働之全行程上面必不可少。尤其是該勞働本身的内容及實現出來的樣式不能多多地使勞働者感興味時，即勞働者不能多多地把他的勞働當作肉體精神兩方面的力之遊戲而自陶遣時，則那意志就愈必要。

勞働過程之簡單的各契機，一是合目的的活動或勞働本身，二是勞働對象，三是勞働工具。

供給人類以現成的生活資料的東西是天成的土地（經濟學上、連水也算在內）（註）；土地是不須人類幫助而自能存在的，且是作人類勞働之一般對象的。至於依勞働而即能從地球直接的聯絡之中引離出來的東西，則概是天然存在的勞働對象。如從其作生活要素的水裏面可以分離出來、捕取得到、的魚類，原始森林裏而我們能砍代得着的木料，鑛脈裏面我們能裂取得到的鑛石，等即是。反之勞働對象依過去的勞働而被「濾過」了的時候，則稱之為材料。如從鑛脈內裂取出來而準備好了去洗滌的鑛石，即其例。材料都是勞働對象，勞

働對象則不限定盡是材料。勞動對象依勞動而受了變化時，才成爲材料。

(註) 『土地的自然生產物，爲量很少，且完全離却人類而獨立。正如給點點金錢與一青年，使之置產營業的樣子，自然這東西，正是這樣供給人類以土地的生產物的』。

(士突亞特：『經濟學原論』James St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Dublin

版・一七七〇年・第一卷・一一六頁)

勞動工具 (Arbeit mittel)——或譯勞動手段)則是勞動者挾以置之於自己與勞動對象之間、乃至以傳其活動於對象之上、的一物或數物的複合體。勞動者爲使一方面的東西能恰如自己所意圖成爲對他方面的東西生作用、的工具起見(註一)，常利用那些東西之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性質。在其採取天成的生活資料——如菓實之類——時，其自身的身體各器官固然可作勞動工具之用；但將這種場合暫置不問時，則凡他所能直接左右的對象都不是勞動對象而只是勞動工具。因爲這樣，他於是將他自己周圍的許多自然物加之於他自己活

動的各器官之上——不管聖經上的說法是怎樣——，而將他自然地具有的體格變化之爲一可能延長的器官。土地一方面是他生活必需品的本來寶庫，他方面又是他勞働工具之本源的藏室。比方土地供給他以石頭，使他能投能磨，能壓能切，卽一例。同時土地本身也成爲一勞働工具。不過在作農業上的勞働工具時，則還須要別的一大羣勞働手段及比較發達到了高度的勞働力來作前提才可能（註二），在勞働過程多少發展了一點的時候，加工了的勞働工具又非有不可。人類住的最古的洞窟裏面我們就能發見石製的用具及武器。人類初有歷史的時候，則除特別加過工的石材木材骨料貝殼等之外，養馴了的家畜——依勞働而被變化成功的——也是主要的勞働工具（註三）。本來使用勞働工具及製造勞働工具的事，在某種動物裏面就已粗具萌芽，但是這究是人類勞働過程上所獨具的特徵，故佛蘭克林（Franklin）曾將人定義爲『製造用具的動物』“*A tool-making Animal*”。我們要明瞭過去動物種屬的身體組織時，當知道其遺骨的

構造；同樣、明瞭了勞働工具的遺物時，在鑑別以前經濟的社會形態之究爲何形何態上當可得到非常重要的線索。區分經濟上各時代的，并不是用某時代製出過什麼東西、某時代製出過什麼東西、的那種方法，乃是用如何製出的？及依什麼勞働工具製出的？的方法（註四）。勞働工具不僅是測量人的勞働力之發展程度的測量機，而且是指示勞働所處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勞働工具本身裏面，總括起來可呼之爲骨格體系及筋肉體系的那種機械的勞働工具，較之單能作勞働對象之收容之助、總括地可稱之爲生產之脈管體系、的那種勞働工具（如管子、桶、籃子、瓶子等），反遙能多多地表出社會生產時代的特徵。後一種勞働工具，在化學工業盛行以後才占到重要的地位（註五）。

（註一）「理性是有力量的，同時可是很狡猾的。其狡猾的點，在其使各種對象各依其本質以相互作用。且成爲一體以發揮全力。而（理性）自己則不直接參加這過程。僅在如何實現自己的目的之媒介式之活動裏隱藏着。的點上可以看出」。〔黑格爾：「百科全書

『內第一部論理學』• Hegel: "Encyclopädie, Erster Theil, Die Logik" • 伯林 • 一八四〇 • 三八二頁)

(註二) 加尼爾 (Ganilh) 的『經濟學說』(Théorie de l'Econ. Polit.) 巴黎 • 一八一九年) ; 在其別的地點上說是一很貧弱的著作 ; 但其反對重農學派 , 將作固有的農業之前提 • 的各種勞動過程 , 一一列舉出來的點 , 是很中肯要的。

(註三) 突兒哥 (Turgot) 在其『富之形成與分配』"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一著內 (一七六六年) , 曾適切地把養馴了的動物在文明初期是怎樣重要 • 的點 , 加過說明。

(註四) 一切商品當中 , 嚴密的意味上的奢侈品是把各時代作工藝的比較時最不重要的東西。

(註五) 第二版註——從來的歷史記述 , 對於物質生產之發展——即一切社會生活的基礎——差不多全不知道 , 從而一切現實的歷史基礎也就差不多全不知道 ; 但是至少對於

有史的前的時代，也就會不以所謂歷史的研究爲基礎而以自然科學的研究作基礎。由用具及武器等材料・區分之爲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及鐵器時代了。

舉凡傳導勞働作用於對象去、從而在某一種形式方法之下作活動之導體、的各種東西，當然是勞働過程上的工具；但此外在勞働過程上的必要的一切對象條件，也可以廣義地計入于勞働過程的工具之內。固然這種條件不直接進於勞働過程之中。但勞働過程沒有這種條件也必完全不能進行，或則進行不能如意。在這些勞働工具當中，最普遍的還是土地，因爲土地能供給勞働者以站腳的地盤，對勞働過程又能供給之以作場 (field of employment)。這種已經由勞働媒介出來了的勞働用具，譬如工作廠、運河、道路、等就是。

要之在勞働過程裏面，人類是藉勞働工具作手段、將其所早就打算過想加之於勞働對象上的變化，加之於該勞働對象之上的。勞働過程，于是成爲生產物、而告終結。這勞働過程的生產物是一個使用價值，卽是依形態之變化而被

用爲適合於人類欲望的某一自然物材；而勞動則又在該生產物中被和對象相結合。即勞動已被對象化；而對象被勞動加了工的則爲生產物。亦即勞動者方面用不休不止的方式所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到生產物方面則成了休止不動的性質，用存在(Sein)的形態出現于世。勞動者紡織過了；其生產物即爲紡織品。

我們對這全過程從其結果——即生產物——方面去作觀察時，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兩方面正如生產機關(Produktionsmittel)(註六)勞動本身方面則爲生產的勞動(Produktive Arbeit)(註七)

(註六) 譬如尙未捕得的魚。呼之爲漁撈上的生產機關，似乎很像是本末倒置。但是在魚所未棲止的水中謂可得魚，其技術也素來未曾發明。

(註七) 這樣規定下來的生產的勞動：是從簡單的勞動過程之立場上規定下來的；在資本家的生產過程上說則還不充分。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

動物的器官是人類的用具

佛蘭克林曾呼人爲『製造用具的動物』。用具之使用與生產，誠然是人類獨具的特徵。但達爾文曾對唯人有使用器具之能的點，加過駁論。他說許多哺乳動物在其幼稚形態之下率能使用器具，且舉示了許多例證。他的這個說法，在他的觀點上說，即有名的『人之天性』之中別無任何一個特徵爲動物內所不能發見者、故認人爲一種特殊的存在而推崇之達於特殊的『王國』之中是毫無根據的事、——他的觀點上說，本完全是正確的。不過量之不同立可變成質的不同。的點又不可忘記！某一動物的種內萌芽地存在的東西，能成爲和別的種作區別的徵候的話是不錯的。這個尤其關於使用器具的點上說，非常明白；

比方象能曉得折樹枝以驅蚊蠅，這就是很有興味而且很有意義的事。不過雖然如此，在『象』種發達史上看，其與蚊蠅鬥爭上折使樹枝一點并不具有什麼本質的地位是很明白的。象決不是因其多少像自己的祖先折過樹枝以拂蠅、遂成爲象。而人則不同。澳洲土人的全生存都靠其彈弓，如現代英國人的全生存之全靠機械一樣。試從該土人奪去該弓矢而使變爲農人看看，則他們的全生活樣式，全習慣，乃至全思考樣式，全『天性』，必概變化無疑。

我說過把他們變成農人看看的話。不錯，在農業方面人對自然的生產作用也不僅是以勞働工具爲前提的。勞働工具不過是構成生產上所必要的各工具中的一部分。故不就勞働工具立論而一般地就生產機關之發達及生產力之發達立論必遙爲精確。——縱使在這發達當中占最重要地位的還是勞働工具、或則至少在重要的化學的生產未出現以前還是勞働工具、的話，是完全正確。

人在勞働工具裏面，獲得了變更其自己所謂解剖學的構造、的新器官。人

自發展至于使用工具以求，其發達史完全爲之一新了。以前則和一切別的動物一樣，其進化史也是跟着其自然各器官之變形走的。今則不同了，第一就成了人的人爲機關器官之發達史，成了人的生產力之成長史。

人是造器具的動物，同時又是從古以來長期間多少總大羣地生活過的祖先傳下來的社會的動物。但在這兒我們應當引爲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的祖先當時爲什麼羣居以爲生的問題。這是動物學者應當說明而且現正在說明中的問題。而反之在歷史哲學的觀點上這兒所當引爲最重要的問題，則是自人的人爲各機關器官在人的生存上占決定的地位以來、人的社會生活本身卽和其生產力之發達過程相呼應至于產出了變化、的事之爲非常明白、——的那麼一個問題。（普列哈諾甫『史的一元論』）

達爾文與馬克斯

一八五九年這一年不僅達爾文的『種之起源』出現了，而且馬克斯的『經濟學批判』也出世了。這不單是年代上的符合。在和人類思想——常是難於一致的——領域相關係的這二著作之間，很有充分可相對比的相似點能夠發見。在前者最後結論的頁和後者燦爛的第五頁，二人概以可驚可駭的鮮明與簡勁，展開了各自思想過程的總計。前者是達爾文二十年間活動之完成，後者是馬克斯智力滿開時代的結晶，後者尤如作者自己所承認：是其死時才撒手、的二十餘年間活動上的『指路碑』。二著作概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頭的歷史上留過極深的痕跡，今作其簡單的對比則如次。——

「達爾文是近代科學上偉大的革命家，不、更正確地說時是一切時代的科學上的偉大的革命家（約特孫說）；達爾文『從陋巷陋室的研究所裏面引導一切思索的智腦入於歷史上曾無類例的運動之中、的點，實在使人爲之浮一大白』（列寧說）；——誠然是：從倫敦「丁街」那一陋室之中一躍而出而把握過全人類的意識與實在、的這運動，是一歷史上前無古人、聞所未聞、的運動。蓋這運動是對當時帶神學玄學的臭味特多的科學懷疑，對聖經上關於生產之創造的教義懷疑，而于『物質的條件』之中發見了對於種之起源的真正的說明的。同樣、馬克斯則是對黑格爾學派之玄學的『法律哲學』懷疑，而全生涯健行不息地努力，最後遂達到於那作『指路碑』的那種結論的。換句話即對於國家的法律與形態等，發見了由其本身或由人的精神去都不能說明，其根原都是含在生活之物質的條件之內。——的那種結論的。二理論都是求其說明之出發點於物質條件之科學研究上。這是很明白的一個共通點。馬克斯且曾用『經濟史觀』、

『經濟的唯物論』等字樣明確地表出過。換句話即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法是決定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各形態——簡言之即『觀念形態 (Ideologie) 的各形態』——之『真實的基礎』的；更換句話即決定『上層構造』之『真實的基礎』的。同時，『在其(生產方法)發達的一定階段上、社會的物質生產力』遂與從來存在的『生產關係相衝突』，『這生產關係遂由生產力之發達形態一變而為生產力之桎梏形態』。『這時候社會革命的時代就要到來』。

——達爾文學說與馬克斯學說的關係如何，素來論之者都是以這幾句話作中心軸而圍着迴轉。

如說達爾文學說是進化學說、進化和革命是恰相反對的、的那種論者，即其一例。但達爾文著作裏面雖沒有革命字樣，其理由當別有所在。即達爾文——亦即當時的生物學界——恐怕是還沒有忘記丘威的『地球之革命』

“*Revolution du globe*”的學說的原故。蓋丘威曾說過地球的生物必會和戲場上的背景一樣，即必會無數次全滅無遺、而又必無數次別樣的新生物起而代之。他這學說，當時又曾被一般人解之為與地質學者所倡出的『激變說』“*Calacrysm*”同其性質。——因此故達爾文怕自己的學說又會被和這相混同，於是遂特避用革命兩字。但是達爾文他雖沒有用這兩字，他的兒子——承繼了父親的性質的兒子喬治、達爾文（*George Darwin*）（有名的天文學者），則將政治現象範圍內及宇宙現象範圍內或單純的力學現象範圍內、革命之各種概念之間具有科學的聯繫、的點，加過展開（註）。

（註）請參照我所著的『劍橋與達爾文』一著。同時喬治·達爾文在其展開革命現象之合律

性一思想——自然這是英國布爾喬亞聽衆所不願意聽的一思想——時，還曾故意補充

之曰：『達爾文這個人，在其表現關於進化的考察時，自己所應担負的全責任是很會

意識過無疑』。五五。

達爾文也好，馬克斯也好，在其作說明時都是從現實之具體研究出發的。不過前者主要地是以說明全生物界黑暗的過去為目的而作此研究，後者則主要地以『動向』（註一）為基礎，不僅是想依現在去預斷將來，而且是想對將來發生作用，故作此研究。蓋馬克斯曾說過：『哲學家曾各隨其所好地任意把世界說明下來了。但根本的點是在於把世界變革』。同時這兒有一點要附說的就是達爾文則并不是用自己的嗜好對世界作哲學的說明，而只是基於現實作了說明而止。次則是他對人們半意識地利用中的新種創成過程（人為淘汰）喚起過注意，其研究且作了近代奇蹟創造者及新生物形態創造者——巴班克（註二）所達成的可驚的結果、之上的援助。這點我們亦不可不特在這兒標出一下，

（註一）伯倫士台因（Bernstein）曾亂七八糟地嘲笑過馬克斯的這個表現。

（註二）關於巴班克的事蹟，請參照我所譯的加爾否德所著『更新了的地球』，及格拉納特兄弟百科辭書中所載的「巴班克」一語。

馬克斯認經濟的要素是決定人類歷史發達、的基礎的、始點的、物質的、要素，其他的東西則概認作是『觀念形態的上層構造』。達爾文則隱喻地認『自然淘汰』（倭姑士特、孔德（August Comte）的消去法）所生的——亦即馬爾薩士人口論法則所生的——歷史過程為生物發達的主要要素。達爾文因為作過這樣認定，於是就惹起了竭爾奴伊歇甫士基及丟林等一派人對他的責難；但責難者殊不知馬爾薩士的這法則是從早已在動植物上適用過的博物學者（林涅、佛蘭克林等）借用得來、而初非自己所杜撰。也許他們責難者是忘記了這些事實。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進一步去尋這自然淘汰現象究在什麼地方可以發見。則簡言之就在生物對於生存條件的適應內就可發見。且誠如達爾文在其所著的開端所作的說明：在該適應之中理解生物界的鑰鍵也伏含在內，對生物界根本的謎之說明也包含在內。但適應這句話，以來雖成了近代生物學界的標語，然許多生物學者所懂到的則不過是適應之歷史的現象。善於造新名辭的黑格爾

Hackel)，曾提倡過研究適應現象的學科應呼之爲“*Ökologie*”。這名辭尤其在美國流行，於是和植物生理學并立、創設了生態學（*Ecologie*）那麼一個新科學。但是這名辭是和 *Ökonomie* 及 *Ökonomika* 等同一希臘語源產出來的。然則與其造新語，何不保全概念相似的舊語之更爲愈呢？故我在幾年前就曾提案：植物學的這部分可呼之爲植物經濟學（註二）。但這些暫不管，總之如上所述在達爾文也好馬克斯也好，其所研究的歷史過程之基礎要素，完全是如合符節。在語法的標示之完全相同上，該過程之爲同一就已完全顯出。我們於是獲得了對生存之經濟的條件之說明。

（註一）最近德國有一著生態學入門書的著者——滋爾德，更曾進一步提倡將植物生棲地的一般環境，用希臘系的造語“*Ökion*”表出之，字義則解之爲物質的狀態與能率源泉二者的總體。

（註二）請參照我的「十九世紀的生物學發達史概觀」（一九〇八）。有些學者想將植物學動物

學的這等部門名之爲「生物學」或「生物學的」，但沒有成功。如果成功，讀者必將其明其妙：到底我們論究的是什麼生物學。即是現在生物學——動植物學——的總體呢還是其一部分呢，必將莫明其妙。

但達爾文與馬克斯的相似點又還不僅這些，兩者對於這經濟過程上的生產物所下的說明又酷似。即馬克斯說人類在初期的發達階段上，即人類在初從動物轉化成人的時期中，其行動是在於生產工具之發見的點上面。詳言之即「勞働工具之製作……特別是人類的勞働過程上的特徵……故佛蘭克林呼人爲“Tool-making Animal”，即呼人爲製造勞働工具的動物（註）。考茨基對於馬克斯這思想，更曾用過德國特有的字語、加以有情有味的傳述。即他說動物在自然裏面能够“finden”（發見）工具，人則獨能“erfinden”（發明）工具，云云。路特霍德（Lutherford）在其最近的演講中，更將人的這發明力初期各階段鮮明地描述過，即曰：問題是歸着於將同量的能率（Energy）漸集中於最小限的

空間、一事。比方最初是用棍棒，不過多少打着一些平面；後則發明了刀與小刀，作用就集中在一條綫上；更後則槍箭又發明了，於是能率就集中於一點上；云云。

(註)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一九〇八年俄文版·一三四頁。

至於動植物對於生存條件的適應過程、除製作各種器官——即工具——之外還在什麼地方存在過、的話(註一)，則這兒只簡單地將其有關係的字語加以考察就可明白。在十九世紀初，俄國學者曾稱生物體——即組織好了的肉體——為『工具的』肉體。但爲什麼生物是工具的肉體，是工具的生物體呢？——要說明時達爾文曾說過必從其起源下手，從而又說過這工作是希望對其起源能作說明、的自然實驗家的主要工作。即他對於我們俄國所已達到的這種斷片的理論，說過『自身的種種複雜的機構與本能，我們當認之爲是對外界的好的適應之長期歷史的總計，即如藝術品那樣統一了的總體，才行』(註二)。——故由

此看來，達爾文對生物形態起源所作的說明，正和馬克斯對社會形態起源所作的說明一樣，都是認生存之經濟的條件作基礎。的即其活動之最初的產物就是製造用具。同時製造用具的一活動，又不僅是原始人類最初步武的特徵，在人類進化到高等活動階段的時候，也還是一樣。馬克斯恩格斯曾說過最初對我們以史的唯物論作基礎的世界觀、盡過宣揚之勞働的是培根(Francis Bacon)；這培根就曾宣揚過人對『人類的王國』——即科學的王國——及自然，將來必全勝利；而且曾將：“*Ner manus nuda, nec intellectus sibi permissus multum valet instrumentis et auxiliis res prebicitus*”（『赤手空拳與天賦的理智并不是怎樣價值了不得的東西；工作是用工具及其他的補助物去做的』——編輯者），認作是新發生了的實驗科學的活動方向之特徵。

（註一）這點馬克斯在『資本論』內曾指摘過。俄文版。一八九八年，第十三章三二三頁腳註九

(註二) 達爾文『種之起源之基礎』一八四二年。到一九〇九年該原稿才發見，印行出版。

『赤手空拳及天賦的理性，不是怎樣價值了不得的東西；工作是用工具及其他補助物去做成的』——的思想，不僅在近代科學誕生的黎明期——培根時代——是確切不移；在近代科學發達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也還是一樣。

有名的物理學家菲涅爾，在其『我們的感覺範圍之擴大』(註一)一著內曾這樣說過：即物理學最重要的功績，和器具之驚人的完成有密切的關聯云。又說這器具，很像是耑門模倣人的感覺器官的東西；這感覺器官，借伊、巴、羅甫的確切的表現法說時，又正是人對外界的『分析器』。同時波滋曼對於發明分光器的基爾希哥甫，曾用其獨特的警策語句——即說『基爾希哥甫完全從眼球造出一器官來了』——明白地表出了和菲涅爾的所見完全相同。——故結果，無論是考察生物界的起源或考察人類社會的起源，在其基礎上我們皆必得從生產之經濟的過程出發才行。該生產又無論其是植物之原始的生產或人類活動之王

冠——所謂科學之生產——，最初一步我們總得從這生產之器官乃至工具之起源去着手研究才行。要之，史的唯物論與達爾文學說，在其對象上雖一者爲人類，一者爲動植物界，并不一致；但其間兩者的相似則概如上述。還有則爲『種之起源』與『經濟學批判』出版二十年後，達爾文又曾出版一本『人之起源』。爲論證人是由動物類型發達出來的見解起見，他又曾將其考察範圍擴大及於社會方面而不僅限於生物學方面。結果且曾說：人之較動物特具知識方面精神方面的優越（借馬克斯的話說時則爲上層構造），是由於人有兩個物質方面的特點，一即人的神經系統最高部——腦髓——發達（結果智力就發達），二即高級動物裏所附具的『社會本能』發達。——故由此看來，社會的本能與社會的性質等，在達爾文也如在馬克斯一樣，也是認爲是人類知識能力及精神能力之發達、之自然史的過程之起點。從而英德兩國的學者，常目達爾文爲現實的倫理學派之建設者，也就不爲無因。不過這兒如想將這關係上的達爾文主義與

馬克斯主義之并驅情形加以展開，則紙數就要得很多（註三）；也就和我這兒所論的一八五九年，要超出很遠。

（註一）請參照我所著的『近代自然科學之必須任務』。

（註二）請參照我的『總結帳與年忌之年』一論文。

（註三）如把這個與一八六四年出世的 J. S. Mill 的「功利主義」的關係，一并敘及時常興味不少。

『種之起源』與『經濟學批判』——那麼兩個偉大的作品，如上所述思議地同時出現於一時；其彼此未曾直接地相互影響過的話自然也就毫不待說。而根本觀念之相似則又概如上論如是之多且深。不過這兒有一問題，即二十年間完全像近隣（相距不過一點鐘的路）好友的樣子住得很近的這兩偉人，為什麼直接沒有結成朋友呢？關於這點，馬克斯的女婿亞佛林且明顯地說過：直接發生交情的事絕對沒有過。但無比無類的博讀家馬克斯，對於達爾文的全著作

必會綿密地加過研究則又無疑。而且他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一八七三年第二版），曾送過達爾文一本。當時達爾文亦曾這樣寫過回信：『承先生惠贈大著『資本論』，誠不勝光榮感謝之至！敢不衷心自矢：對社會經濟各深遠而重要的問題此後更作根本的探討以期毋負先生之高懷雅意？弟與先生之研究方面雖不一致，然我輩都是以普及科學為職志者；科學則誠於人類福祉上有貢獻者也。忠實而又尊敬先生的茶爾士、達爾文敬具』。

我現在回到我的本題而將這小論文結束罷。對於那時候沒有人注過意的一八五九年，及可稱為達爾文與馬克斯的十年間——的六十年代，我們現既已將其意義加過這樣一番探討，對於兩者在自然科學旗幟之下進行過展開過的點我們現在更須注意及之。兩人都有過在自然科學裏面澈底地搖動人類的『意識』與實在的使命。而發見過其革命理論之唯一鞏固的基礎。（滌密里亞塞甫：

『科學與德謨克拉西』

達爾文學說與馬克斯主義之光筭之下的美學

達爾文在其有名的作品『人之起源與雌雄淘汰』裏面，關為美感在動物生活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点舉過很多例子。有些人或會因此就說美感之起源應該由生物學去作說明。或則以為人的這感覺之進化不可僅以為是人類社會之經濟作原因，謂為經濟作原因未免太狹隘。同時或還有人會說關於種之發達的達爾文的見解、無疑地是唯物論的見解，故生物學的唯物論應較偏面的史的（經濟的）唯物論還為根本些，我們當採用。

——這種反對論的主要性，我們很能理解。故現在試站住加些考察。

同時我們對這種論調如作答復，則對於其他許多從動物心理生活方面立論

的反對論調也就可以藉此一同作了答復。故一舉數得，非常有益。

首先、我們就當力求精確地將根據達爾文所舉出的事例究當作出一些什麼結論來的點，加以決定。同時達爾文自己對那些事實作過什麼結論，亦當加以考究。

在關於『人之起原』一著的第一部第一章(俄譯本)內，我們看過有這樣一些話。——

『美感——這感覺，一般宣稱之爲人所獨有的特性。但有一種雄鳥故意展其翼于雌鳥之前，誇示其羽毛之鮮麗。無此鮮麗的羽翼的異種鳥類，則不能發見這種獻媚求歡的動作。由此我們曉得雌必好觀賞雄的美無疑。同時趣味豐富地鮮巧地用許多裝飾物裝飾其遊戲室的有外套膜類，以及裝飾其居巢的蜂雀之雌者，必也是具有美的觀念無疑。并且同樣的情形在禽鳥的歌唱上也可以說是一致。如在戀愛期中雄鳥優美的歌聲，無疑義必是于雌鳥很悅耳的。假使雌鳥本無鑑

賞雄鳥美色美聲的能力，則用其特性以謀誘惑雌鳥、的雄鳥一切努力與打算，必全等于水泡。然這那有想得通的道理呢？事實決不如此。固然、爲什麼一定的方式配合下來的一定的音聲即能悅耳、的點，正如爲什麼某一種東西于嗅覺味覺上感愉快的點一樣，從來沒有被充分說明過。但是雖然如此，對同一個色或同一個音，我們起快感、各下級動物也一樣起快感、的事，則很可斷言。〔註〕

〔註〕 達爾文：『人的起原』·第一卷·四五頁。

達爾文這兒所舉的事實，一是證明各下級動物也如人類一樣具有體驗美的快感的能力，二是證明我們的美的趣味和各下級動物的趣味也相合致的。但是這些事實，又決不是向我們說明這種趣味之起原的。同時、生物學雖不能向我們說明我們美的趣味之起原，又猶能說明其歷史的發達。——這點讓達爾文自己說時則如次。

『關於美的觀念，至少關於女性美的觀念，人的所見是決不一致的。』

如後所述，種族不同則該觀念亦異，實在是千差萬別。而且雖同種之間，如鄉土不同該觀念也還是不一樣。照野蠻人所熱愛的那種刺目刺耳的裝飾與音樂看，他們的美的觀念或較下等鳥類還不如」。(註)

(註) 達爾文：『人之起原』·第一卷·四五頁。

美的觀念既依人而異，雖同一人種亦因鄉土不同而亦不同，則其不同的原因之不能求之于生物學之內而必另求之于生物學之外就很明白。達爾文自己也說過：我們的探究不可不轉向別的方面去。在他該著第二版英文版、我們上引的一節之中，還有“With activated men, such sensations are however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complexed ideas and trains of thoughts” (註)——這麼一些話。這個話在塞謁諾甫所監輯譯成的俄文版中則被略去了。

(註) 『人之源起』·倫敦·一八八三年·九二頁。新譯俄文本中或者有，可惜我手邊沒有

這書。

這個話是說「在文明人則這種(美的)感覺是和複雜的觀念及思想之連鎖密切地相結聯的」。這誠然是一重要的指示！由這指示，于是我們就被從生物學方面送到社會學方面來了。蓋文明人的美感多與複雜的觀念相結聯一事實，明是該美感受社會原因所制約的意味。但僅文明人如此麼？達爾文說這種結聯只在文明人內有之的話，果正確麼？當然不正確，很容易瞭解。爲什麼呢，試看動物的皮、爪、齒等，在原始民族的裝飾裏面很占重要地位就知道。這地位當用什麼去說明呢？是因爲這些皮爪齒之類的色與綫等配合得好遂爲他們蠻民所愛賞麼？不，他們蠻民之用這類虎皮虎爪、牛皮牛角以爲裝飾，乃是暗示自己的敏捷與氣力的。這裏面有真道理在。即蠻民心理以爲打敗敏捷的是敏捷，打敗強者的是強者；此外則或還夾雜些迷信在內也未可知。士克爾克拉甫特，曾說北美西部棕色民族非常喜歡用該地方最慍悍的猛獸——灰色熊——的爪所作成的裝飾品。他們以爲取該熊的爪飾之於身，則該熊的慍悍與勇氣即可由該爪以傳

達於自己。結果於是該爪，照士克爾克拉甫特的話說時——一方面成了棕色戰士的裝飾品，二方面又作了他們的護身符（註一）。我們如以為這種獸皮爪齒最初所以被棕色種族喜歡，端是由於其特有的色與綫配合得好的原故，則根本是大錯誤（註二）。反之，與此相反對的想像則反蓋然性多得多。換句話即最初是僅因其為勇氣、敏捷、多力、的表現，而用以飾之於身，繼則始漸因其為這種表現之故而喚起一種美感而遂決定之為固定的裝飾品的。故蠻人的美感也是複雜的觀念之聯合，有時候且是由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發生出來的。

（註一）『北美合衆國印度民族之過古現在將來·之歷史統計學的報告』·第三卷·第九章·二六頁。

（註二）同一種物件，端因其色而喜歡的事也有；詳如下述。

再引一種例子看看。許多亞非利加種族的女子，手脚上好串鉄環是我們都知道的。其富人的妻子且串上無數個。（註）

(註) 習歪因佛特 Schweinfurth : Au Couleur de l'Afrique. Paris. 1875. t. 1. p. 138.

這樣串戴起來，自然是非常不便利。但不便利決不足以妨害黑種婦女之串戴這種奴隸的鐵鎧。至於他們爲什麼串戴這種鐵鎧則引爲滿足、否則就不滿足、乃至串戴起來則自他皆認爲美、否則就不美、——的話，則也是由於許多複雜的觀念相結合而成，決不簡單。蓋如習歪因佛特所說：對這樣一種裝飾品特感欲求的種族，是現在正經過鐵時代的種族；即在鐵現正成爲貴重的金屬的民族之中，這種欲望即特發達。他們蓋以爲貴重的東西就是美的東西。富的觀念與貴重的東西在他們恰相聯合。比方他們裏面「丁加族」的女子，一到串戴二十個鐵環時，即以爲比其串戴十個的時候、即比其以前更貧的時候，自他都要覺得美得多。——這個很明顯地并不是環自身有什麼美，完全是與這環相結合的富之觀念有以使之然。

再取第三個例。在簪伯芷河上游的「巴特卡族」，凡沒有脫去上鍰犬齒的

人都認爲醜。這誠是一異樣的美的觀念；其來由又何在呢？研究起來乃知也是由於很複雜的觀念所結合而成。蓋巴特卡族是想脫却自己的犬齒以去模倣那反芻動物的。爲什麼要去模倣，在我們自然是很難了解的一個心理。但巴特卡族因爲是牧畜民族，對於自己的牛與馬差不多都神化起來了。——這場合自然也是認貴重的東西卽爲美；然其美的觀念又全是發生於別一觀念而來。

最後再取達爾文自引里溫格士吞的話內的例子看看。「馬卡拉族」人好於上唇鑿一孔，而簞「迫勒勒」——一種金屬——所製或竹子所製的環於該孔內。里溫格士吞因而詢其會長曰：『爲何女人皆簞此環？』，會長拂然，如遇一愚問不知所以爲答的神情，繼乃曰：『因爲美；這是女人唯一的裝飾品。男有鬚而女無之。不簞迫勒勒時女人像個什麼樣子呢？』——云云。這簞迫勒勒的習慣究是從那兒發生出來的話，眼前自然還不容易確答。不過其起原也當求之於非常複雜的觀念之聯合之中而不可求之於生物學之法則之內，則還是很明

白。并且我們或還可以斷定：這習慣是完全和生物學之法則沒有關係的東西。

由以上各例，我們當能承認：一種色彩的配合或物的形態所喚起的感覺，縱在原始民族也是與複雜的觀念相連結；至少這種形態與配合的大都分是必這樣結連起來而後一般才能認為美。

至於這種與觀念的聯合是由什麼東西所喚起；以及依物的形態而與我們內面喚起了的感覺相結合、的那種複雜的觀念，是從那兒發生得來；——的各疑問，則能答復的無疑地不是生物學者而只是社會學者！如果對歷史所提出的唯物見解，較其他對歷史所提出的任何見解皆於解決歷史上貢獻為多時；又如我們相信上說的聯合與複雜觀念，歸結起來是由於社會之生產力狀態及社會經濟關係所創成、時；——則達爾文學說、和我們上來所想盡力指出其特質的唯物史觀、之為決不絲毫矛盾、的點，就誰也應當承認。（普勒哈諾甫：『二十年間、藝術論』）

自然環境及人爲環境

環境不僅是對於有機能的器官給以直接的影響（如對鋼琴家及挖土工人則直接影響其手），對於其他的器官亦給以間接的影響。環境對全生物體所給的這影響，使自然實驗家都對於爵塞甫的理論不能不加以承認。所謂爵塞甫的理論，即爵塞甫、省特、伊拉、呼之爲「器官之附隨」、而糾威用：「各有機體形成單一孤立的體系，即形成互相對應互相作用以達於同一最後的結果爲目的、的諸部分之總體。同時其任何部分起變化時都必對其他的部分要釀起變化，否則其自身的變化也就不可能。」的語句加以說明、的那理論是。比方幾多代以來都吃慣了新種類食物的某一種動物的牙齒，其形態之變化是必要釀起

其他各種變化而後可能的。即兩顎及運動兩顎的肌肉，肌肉粘着得很密的頭蓋骨，頭蓋骨裏面所包含的腦髓（註），撐持頭部的骨及肌肉，腸的形態及長短，——總之身體內一切部分，皆非同時起變化不可。達爾文說蘇蘭格的牛有一種骨頭，因為常被放牧於急激的勾配（傾斜）地面上的原故受了許多變化。自然科學的實驗家對於海豹鯨等最初為陸棲哺乳類、後因在海內也發見了適當的營養條件於是成了水棲動物、的點，也一般共認。然因為由陸棲而變為水棲之故，新生活樣式遂根本變更了牠們的器官，適應水棲生活的新器官大為發達，舊的許多器官遂退化而僅留其痕跡。樵樹及其他沙漠植物，因為適應乾燥環境起見只得自己制限自己的成長，即將葉數退化到四枚或兩枚。同時其成長期也不和普通相同。即在盛夏極暑期則中止，而在每年涼濕氣較多的冬季則發育。

（註）解剖學者說：肉食獸的顳顬筋最發達；但因其太發達及運動過多，於是對頭蓋方面遂

壓迫，於是頭腦遂不發達；故其腦髓較之咀嚼器官不發達或較薄弱的動物——比方人——的腦髓，就要小些。總之這顯顯筋可用人工使之薄弱化些。以漸變更頭腦骨的內部構造，而增大腦髓的容積。

同時動植物受其支配影響而不能不與之相適應、的宇宙的乃至自然的環境本身，也如有機的存在物一樣、其所具的體系極複雜而廣汎。其構成部分，概言之爲地盤之地質學的構成，化學的構成，距赤道的遠近，海拔之高低，灌溉這地盤的水系，雨量及熱量，最後棲息于其上的動植物等。這些部分非常密切地相交錯，其任何部分都是不讓起他的部分之變化、自己即不能變化的。固然，在這自然的環境內的變化決不如在有機體的存在當中那麼顯著，但還是一樣能夠看得出。譬如森林就很對於溫度、雨量、土壤的濕度、等給以影響。達爾文且舉示過蚯蚓那樣毫不重要的動物亦能對於土壤之形成上給以本質的影響。伯特羅及德國解剖學家格里格爾與威爾發特三人，亦發表過寄生于莢豆類

上的微生物有豐穰土壤的作用。同時人能使植物與家畜繁殖下去時，亦能給自然環境以影響。亞細亞及阿非利加的豐饒地域變成沙漠，就是人對於其地的森林採伐——自羅馬時代以來——過甚所致。要之動植物與人類，在原始野生狀態時都是一樣耑蒙自然的影響；除器官具有適應能力外什麼防衛手段也沒有的。不過幾世代之間彼此所處的環境如都不同，則起原雖一，亦必不能不各自分道揚騾。即種種不同的環境必會將動植物及人類分成種種的種類與族類。

但人類除使自然環境變化之外，又能保護自己使不受自然環境的惡影響。或則至少也能謀所以減少該影響。其法即為創造完全新的人為環境乃至社會環境。同時這人為環境又如自然環境一樣亦給人類以影響。——人類于是在兩種影響之下生活着。又人所創造的人為環境中的各種形態，其彼此之間又很有類似點。結果于是人類遂一方面受其周圍變質的自然環境之分化影響，他方面復受其同質的人為環境的影響——即受那產生同一的要求、同一的慾望、及同一

的文化、而又使人種的差別日趨于減小縮少、的同質的人爲環境的影響。而在這方向上大有作用的，則爲他們所住的地方之同高同廣性，及從而該地方內植物區系動物區系二者所具的同一性。

這樣于是結論起來就是自然環境將人種加以區分，而人爲環境則將區分了的人類復想加以合同。

但自然環境的進化甚遲；故與之相適應的動物種植物種又很像沒有動。

而反之人爲環境則進化得很快，且愈進化即快度愈有加。故于是人類史比之動植物史就非常具有流動性與可變性。（拉發格：『馬克斯的史的唯物

論』）

人爲環境之作用

自然環境將人類造成在四十度乃至五十度的溫度圈內也能生活，在水長結冰的那種和南北兩極相接近的地方也能生活。在這非常特別的性質之中，人類誠然和老鼠一樣、攸往咸宜。同時自然環境之千形萬樣，復將人類分成了各種各族。

但是人類同時又是和蜜蜂海狸以及其他種種動物一樣，在人爲環境裏面也能生活的。換句話即能用自己的技術所生產的生產物以營生活的。結果于是人爲環境遂起而代自然負責，將自然人變化起來，日使之成爲社會人下去。自然環境以分散爲主旨，人爲環境以統一爲目的。

同一緯度之下的自然環境，誕生育長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動物與植物。同一經濟的生產樣式之下相互類似的人為環境，則將生存在該環境內的人類的習慣、家族體制、政治體制、宗教、哲學等，一一在極相類似的形狀之下使之發達。換句話如資本主義生產樣式所支配的地方，無論是極冷的加拿大也好，極熱的意大利也好，極新的澳大利加洲也好，都是一樣地倡什麼議會制度、制限選舉、進而普通選舉、以侵略掠奪為目的的軍國主義、及理神論的理想主義哲學等。這種類似并且不僅是幾世紀以來所走的社會發達的路都相同、的各民族之間纔如此。所走的進化的路是在歐洲歷史之外、急速地通過了進化各階段、的各異人種異民族之間，也是一樣。比方日本人自將機械工業輸去以後，立刻就從其封建環境一躍而進于資本主義環境。其政治制度、法律、乃至其衣服等，都不能不變化。他們現在已戴起我們這種醜呢帽來了，不久巴拿馬帽及「盧威埃帽」，也必要戴起來無疑。

這正是人類依其自己所創造的環境之媒介，日進于自己決定自己、及支配其社會的運命、的來由。（拉發格：『和爵勒士論爭唯物史觀及唯心史觀』）

史的唯物論(上)之三

自然條件與技術

地理的關係與生產

說明歷史的唯物論時，如前所述社會關係之現實的發達原因是第一個問題。『公民社會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之解剖』當由經濟作其關鍵的話，我們已經知道了。至于該經濟又是受什麼東西所規定，則：

馬克思曾答之曰：『在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人必走入于：與其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的發達階段相照應的、且獨立于其意志之外的、必然的、特定的、生產關係之中。這些生產關係之總體，構成社會的經濟構造，即構成那撐持法律的 political 的上層構造、的實在基礎』。

換句話即馬克思把經濟發達的問題，歸到社會的生產力之發達原因上面去

了。在這終極的歸納形式裏面，所謂社會的生產力之發達原因一問題，又是依自然的地理關係之舉示可得而答復的。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上，就曾把『世界史之地理的基礎』的重要性確證過。不過在他，發達的究極原因究是觀念；即他唯關於偶然的及不很重要的事情，才沒有辦法地採用一下唯物物的說明；像這兒他自己所提出的絕對正確的思想，故亦還不會使他導出過由該思想所必要產生的結論來。這結論是由唯物論者馬克思才能充分導出來的。

自然的狀態（即地理的環境之性質），規定了滿足人們之慾望的自然產物之性質，又規定了人類為同一目的而產出的生產物之性質。在沒有金屬的地方，人依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跳出那所謂石器時代的限界以外去的。同樣，原始漁人與原始獵人要想能變轉為牧畜生活及農耕生活，與之相對應的自然的地理關係——即一定的動物與植物——也就絕不可少。莫爾干說：『西半球馴養動物之

缺少及東西兩半球各種之差異，曾于兩半球住民之各時期各時期的發達上給過很大的影響』。歪茨說：『他們沒有家畜。這事體關係很大。因為他們之不能進于高等文化、始終停在低等文化之下，就是爲此』。又依習歪因佛特所主張時，非洲土人已經離開了人口過剩的地方而搬到了新的地方，因以順應其地理環境而變更其生活樣式；即『牧畜者變了農耕者：農耕者變成了牧畜者』。同時他還說過中部非洲產鐵地帶的居民，『鍛冶工作是其藝能之中最主要的藝能』。

還不僅此，在最低度文化階段上的各種族就已經有相互接觸、而交換其生產物的大部分、的事實。這事實正是使：于各種族之生產力發達上具有影響力的自然的地理環境之限界因而擴張，該生產力之發達亦因而進于高度的。并且，自然的地理關係本身之能使這發達容易或使這發達困難的話，又是很明瞭的事；黑格爾就會說過河海使人結合、山嶺使人分離。不過海洋則必待生產力

比較發達到了高度的時候才能使人結合，在低階段的時候反能使各種族分離，使其相互關係愈感困難，——正如拉擇爾所說。總之不管怎樣，自然環境愈是多樣而複雜時，在生產力發達上即愈有利益，這是很明白的。馬克斯說：『那構成勞働之社會的分配、及藉周圍自然狀態之變化以刺激人類的慾望能力、勞働工具、和勞働方法、等之日趨于多樣而複雜、的東西，并不是土地的絕對豐饒性而是土地的差別性及土地之自然產物之多樣性』。拉擇爾也差不多用同樣的語法說過下列的話，即『問題不是在於食物之非常容易獲取上，而是在於人本身特定的性格、趨向、習慣、慾望、等之能够釀成上』。

自然的地理關係，制約生產力之發達，生產力之發達制約經濟關係之發達，從而又制約其他別的社會關係之發達。馬克斯對這關係曾這樣說明過：『依生產手段性質之不同，生產所共同走入的社會關係、以及生產者交換其活動且參加生產之共同行動的條件，就必得不能不異。新的戰具槍砲之發明，已

必然地使軍隊內部的組織澈底變化了，個人之編制軍隊、及個人之得作軍隊的活動、的關係，也變化了，其他種種軍隊的相互關係也變化了』。（工錢勞動與資本）

自然的地理的條件之對於社會發達上作用很大的理論，許多人往往解之爲是氣候對社會人有直接影響的意味。詳言之即謂某一『人種』有某一氣候之下故愛自由，反之別的種族則多少願甘於專制君主的支配，還有別的民族則或信仰心深厚地喜歡做和尚，云云。這思想，譬如巴克爾就這樣唱道過。但在馬克斯，則認爲自然條件之作用是依特定的地域上特定的生產力之基礎上所發生的生產關係爲媒介的。而該生產力本身又是以這土地的自然關係爲發達的第一條件的。近代土俗學常取這立場；從而文化史上人種的作用問題，遂就漸被輕視。拉擇爾且說：『人種本身與文化之獲得不獲得沒有關係』。

但在某一文化狀態達到了的時候，該文化狀態之能對『人種』之物理的及

心理的性質上給以影響的話，也是不待說的事。

同時自然的地理關係之對於社會的人類所給的影響，還有種種深淺度數不同。由該地理關係所制約的生產力之發達，使人對於征服自然的力能够加高；因此人與自然的地理環境之間就能創出新關係來。眼前英國人，用其和該撒（Caesar）時代英國人所用的不同的別種方法，以反作用於其自然環境之上。其他各國人也一樣。——這就是說自然的地理關係雖同一、該國居民的性格猶得本質地變化、之主張之爲不通，及由此可以澈底加以駁倒的。（普勒哈諾甫：『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

自然條件之影響

社會生產之多少暫不問，隨什麼形態的社會生產之中，勞働之生產力總是不能獨立於各種自然條件之外的。這些自然條件，無論那一個又都可歸之於人類自身裏面——如人種那樣的東西——的自然、及圍繞人類周圍的自然、之中去。圍繞人類周圍的外部的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立分爲兩大部類。一爲生活資料之自然的富源，如肥沃的土地及魚類很多的河海湖沼等；一爲急激的流水、能够航行的河川、森林、炭山、金屬鑛山、等勞働用具之自然的富源；在文明初期，前種自然富源占決定的地位，在發達了的文化階段上則後種自然富源占決定的地位。舉一例如英國與印度，或古代雅典苛林特（Corinth）等與黑海沿岸各國，試一加比較即可明白。

在不獲得即不能生存的自然慾望之數量日減少、天然的土地肥沃與氣候恩澤又日增加時，生產者之生存與再生產上所必不可少之勞働時間就愈可減小；從而超出于爲自己勞働的範圍之外、的爲他人勞働的部分，又就愈可增大。故

所以諦倭多盧士 (Diodorus) 曾對古代埃及人的事說過這樣的話：『他們養育兒童所花費的努力與用費之爲如何僅少，我們幾全不能信之爲真實。即他們用手邊極簡單的食物弄給兒童吃。綠草莖之可吃的部分，及許多水草的莖根等，他們或者生的或者煮一下燒一下，即給兒童做飯菜。又因爲土地溫暖，兒童大概不着鞋襪不穿衣服，故養大一個小孩，大概不要二十“Drachum”（重譯者——這是古代希臘銀幣名，約合九片士又四分之三。）以上的資金。埃及人口爲什麼那麼多，大建築物又爲什麼那麼多的話，大部分可以由這點去說明得了』（註）不過雖然如此，古代埃及的大建築物之完成，與其說是因於人口多的事實而來，究不如說是由於可得而利用的人口甚多的事實而來。蓋生產生活必需品上所必要的勞働人口部分愈小，則可得利用之於別的勞働上面的人口部分就必愈大；這道理是和每個勞働者必要的勞働時間愈小則可得而供給的剩餘勞働就愈大、相同的。

(註) 諦倭多盧士·西枯盧士：『歷史文庫』第一卷·八〇章。

假定資本主義的生產已通行、別的事情又沒變化、勞働日之大小亦已一定了、的時候，則剩餘勞働之量，依勞働之自然條件如何——尤其依土地之肥瘠如何，就要生變化。不過同時這也不是說肥度最高的土地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達上最適宜的土地的意味，——這種反對的結論是不可作的。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成立，是以人類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太豐饒的自然之「攔住人類不放手，正如攔住步繩 (Gängebänd) 不肯放手的小孩子一樣」。

(即人類太倚恃這種自然時，必如小孩子學步時太倚恃步繩一樣，結果小孩子不易獨自步行，人類也就不能發達。——重譯者) 在這種自然之下，人類自身之發達是不由自然之必要所迫而成的——即不能成為必然的現象的。(註一) 故作資本之母國的并不是草木鬱蒼的熱帶地而轉是溫帶地。作社會分業之自然基礎、且藉人類周圍自然情況之變化而刺激人類欲望、能力、勞働工具、勞働方法、等之多樣化、的，并不是

土地之絕對豐度而反是土地之分化，反是土地自然產物之多樣性。換句話，產業史上最占決定的作用的，是社會統制自然力，節約自然力，及依人類自己的勞作將這自然力大規模地占有之且馴致之，等點。如埃及（註二）、郎巴底（Lombardy）、荷蘭、等地的灌溉工事，即其例證。印度及波斯等國的該工事也是一樣。這些國家之藉運河作灌溉，不單是將必要的水供給於土地，而且是將礦物性肥料用沉泥的方式使從山上流下來作用於土地的。譬如在亞拉畢亞（Arabia）版圖內的西班牙及西西利的產業之得到興隆，其祕訣也就是在這種運河工事上。（註三）

（註一）『前者（自然的財富）雖是貴重而有利的東西，然因此人們轉變成不注意，變成傲慢。及不節制。反之後者則使人深思。勤學。及研究技藝與政策等』。（脫瑪士曼：

『依外國貿易所形成的英國之富』——別題：『外國貿易之差額是富之規準』。倫

敦。一六六九年。一八一——一八二頁）。一個國民被放在一個豐饒的地帶，生活資

料大概由自然供給，衣服住宅等亦毫不須注意或不需。——時，我以爲是最可哀最不幸的事。……固然和這完全相反的極端場合，或許也有。但總之勞働而仍不得生存的土壤。與不勞働而能豐富地生存下去的土地。是同其程度地不好的土地」。(匿名者著：『現在食糧高價的原因研究』。倫敦。一七六七年。一〇頁)

(註二) 因尼羅河的漲水減水有預先確定之必要，埃及的天文學於是誕生，指導農事的僧侶階級，於是得成爲支配者。『日至 (Le solstice) 是尼羅河要開始氾濫的時期，埃及人素不能不以全副精力去注意之，觀察之。……把這時期確定起來，從而適切地定出農事上的辦法來，是他們最重大不可少的工作。故他們不能不在天空中求出這時期每年必在何時到來、的明鮮的徵候來』。鳩菲也：『地球回轉論』亞佛爾版。巴黎。一八六三年。一四一頁)

(註三) 印度有些相互間毫無聯絡的小的生產組織體，都處於國家權力之支配之下。這國家權力之物質基礎之一，則爲調節水的供給。該國從前回教的支配者，對於這點比現在的

支配者英國人還多具理解。一八六六年因饑饉而 Bengal 州的 Orissa 地方死亡的印度人達一百萬以上；由此就可知道。

同時優良的自然條件，也不過只使剩餘勞働（從而剩餘價值及剩餘生產物）可能，決不是就使剩餘勞働現實。蓋勞働之自然條件裏面是有差異的；故用的勞働量縱相同，能滿足的慾望量則還是要依國土而異；（註一）從而只要沒有別的不同，必要的勞働時間也就不能一致。這種自然條件之作用，換句話只是自然的制限、的意味；更換句話即只是將爲他人的勞働幾時可能開始的限點加以決定、的。故產業愈進步，這自然制限就必愈減少。在西歐社會的勞働者，等於用其剩餘勞働去購買爲自己生存的勞働、的許可證的原故，故供給剩餘勞働是人類勞働之一天性、的想法，就很像可能（註二）。但試把亞細亞東部、莎麵樹簇生於森林內、的各島居民的情形，想想看。「居民在莎麵樹上掘一孔，依以驗其髓濃了與否；如已熟則將樹砍倒而切斷之，剝出其髓，濾過其中

所含的水分，即得完全可吃的莎麵粉。每樹可得的粉量，通例為三百斤；有時可得五百斤乃至六百斤。——要之島民是這樣入山砍樹以採取其麵包的』。

（註三）現在我們假定東亞細亞的這種採麵包的人，為滿足其一切慾望起見一週間勞働十二時間（即已足）的話，則自然對他們所直接給與的恩惠是閑暇的時間極多、一事。這閑暇時間，他們如想用之於生產則一系列的歷史的事情就不可少；想支出這時間以作為他人勞働的剩餘勞働時，則外部的強制又不可少。假使資本主義的生產在這兒也已形成，這些良善的島民恐怕為獲取一勞働日之所得，每週非勞働六日不為功。他們為什麼變成了每週要勞働六日？為什麼變成了要供給五日分的剩餘勞働？由自然之恩澤的點是決說明不了的。用自然恩澤可得而說明的，只有為什麼他們必要的勞働時間、每週只限於一日、的一點而止。——要而言之他們的剩餘生產物，不是由於人類勞働本來的祕密性所產出，則是無疑。

- (註一) 『決沒有兩個國家同支出一樣的勞働量而獲得同量的生活資料的事。人類的慾望，是依其所住的地方的氣候之酷烈或溫順而或增或減的。故人類在其實際上所不能不努力勤勉的程度，要依國土而生出種種差異。同時這差異的大小又除依寒暑程度外不能更正確地加以確定。故在一定數的人口所必要的勞働量，在氣候嚴寒的地方爲最大，氣候酷熱的地方爲最小。的普通結論，就可導得出來。蓋在前者，需要很多衣服，土地耕作上亦需要更多的勞働』。(匿名者著：『自然的利率之支配原因』(An Essay on the Governing Caus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倫敦·一七五〇年·六〇頁)。這劃時代的匿名書，是 Joseph Massey 著的·Hume 的利子說就是從他取來。
- (註二) 『隨什麼勞働都不能不給一過剩(同時這個又像是屬於作市民的的權利義務)』。(蒲魯東)
- (註三) Friedrich Shouw 著的『土地·植物·與人類』·第二版·萊普漆希·一八五四年·一四八頁)

故以自然爲條件、的勞働生產物，亦必成爲勞働被併合在其中、的資本之生產力而出現；和歷史地發達了的社會勞働生產力毫沒不同。（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

風土、種族、及生產方法

在同一風土同一種族之中，生產的種種方法用種種形式決定生活的共同過程。其最有興味的一例如下——從有名的美國旅行家堅蘭的著作中借用得來——。即堅蘭還在二十歲的青年時候，——雖不知馬克斯恩格斯乃至其本國的莫爾干爲何許人——依其明敏的濬智，已獨自把握過史的唯物主義。勘察加半島的北部——全地球上最無趣味的一個地方——，有一約略由四十個族長的家

族所組成的種族——苛里雅克人——住在那兒，以牧鹿及馴育野鹿爲生活。因爲生產方法如此，他們的生活於是又取了遊牧的形態。『四五千匹的鹿羣，數日之內把一平方哩左右的雪原挖遍了，且將其下面的苔吃盡了。吃盡之後、其他還沒觸及過的場所自然也得找出才行。』即苛里雅克人爲使其鹿羣不餓死計，又得由甲地而乙地、由乙地而丙地、流渡下去。蓋否則鹿羣破滅之後，跟着不可避地他們自己也就得破滅下去。同時這苛里雅克人的自然與其生產方法間的關係，在其幼稚的宗教表現當中又反映出來過。即『他們一切宗教，都是取服從惡鬼惡靈的形態。當祭司的，爲證明其自身得了天啓起見必得將自己的肉體加以極殘酷的虐待，行所謂「苦行」。假使這樣苦行而身體仍不現出衰弱的樣子時，卽能承受得該試練起時，則他們就能被一般認作是該惡靈的下僕，而堪作祭司；於是其命令也就爲公衆所尊重。這正是這種環境之下的這種民族唯一可能的宗教。……假使無智識未開化的一羣回教徒移住到這東北西北利亞

來，且在那「士坦山脈」荒寒慘澹的一帶地方住幾百年，日爲莫明其妙的淒風苦雨所洗劫，人力毫不知所措手，同時疫病一來，鹿羣盡失，北極的星光（Orla）復明如宇宙的魔火一樣，唯使人戰慄而不能知其所自來，而運命的惡作劇更使他們罹於傳染病而至於靡有子遺——時，則那時候他們必會捨其對亞拉哈及摩荷默特的信仰而信仰和這西北利亞的苛里雅克人相同的妖教無疑」。俄國的教會，現方打主意想把西北利亞的異教徒變成基督教徒。但其多少能够成功的都只是在土着民族之內。游牧民族裏而則東風吹馬耳，誰也不聽不信。堅蘭說的：想使這些游牧民族完全變成基督教徒，必得先將其生活形式加以變化，即將其全生產方法加以變化；這話是很正確的。（註）

（註） 堅蘭著：「西北利亞的天幕生活」一五一頁以後。

這生產方法又不僅使苛里雅克人始終站在幼稚的宗教表現上，而且成了他們許多野蠻風習的原因；——堅蘭所說的「人類自然性之最強的震動」縱還不

算進去。至其野蠻風習的內容，則爲凡老耄者卽殺戮之，不復能挽救的病人則疊石或擲石碎死之，卽其例。『他們用最可怕的正確以區別其殺人方法。卽個哥里雅克人都須被強制地死於其最親近的肉親之手』，習以爲律。且『誰也不願取用別的死法』。『東北西北利亞地土之不毛及峻嚴的長冬，使人們尋出了馴育牡鹿以作唯一的生活方法；而牡鹿之馴育，又使他們必得取遊牧生活的方式。但不斷不休的移動復使他們認病人與老者爲極不適于環境的苦痛物。于是殲殺之風以起。在他們，蓋還以爲這是由理智與同情所產出來的手段』。同時這可驚可駭的風尙不能認爲是哥里雅克人生來的野蠻性、的堅蘭所強烈地主張的見解，又絕對正確。蓋這只是這遊物民族的生產方法的結果，卽使這游牧民族變成爲正直、好客、寬大、勇敢、獨立不羈、的生產方法的結果。他們哥里雅克人對其妻子尤其優柔。堅蘭住其間者兩年，曾未一次見過打妻打子的事。堅蘭且遭遇過幾多基督教文明國內所很難看得到的美德及寬大的款待、于這

所謂野蠻民族之中。

有三四百苛里雅克人因爲太疲勞，至于喪失其牡鹿而不得不開始其定住生活。他們於是在海岸上造一種木製小屋，以漁爲生。他們漁取臘腸獸，復採取美國捕鯨者在海中抽出鯨油後所拋棄而被海浪推來的鯨骨。他們又和俄國的農民及捕鯨者做生意。——但生活方法這樣變化的結果，他們苛里雅克人全生活過程上起過怎樣的變化呢？——試再聽聽堅蘭的報告。即堅蘭之言曰：『定住了的苛里雅克人，無疑義地是東北西北利亞最下等最粗野最骯髒的土人。……他們的性質，又粗野又殘酷，又無廉恥又不正直，而且好尋仇覓衅。一切點上，他們都和游牧的同族人完全相反』。但是這怎樣來的呢？——就中堅蘭曾認這變化原因爲定住方面的苛里雅克人走進了商業交通的那麼一個環境的原故。而且結論之曰：我對於游牧的苛里雅克人，衷心抱有同情；但對那些土着的，則我認爲是我從比令海峽直到烏拉爾山——所謂北方西北利亞裏面、一切

民族當中最下等的民族』。至於風彩、種族、及其他自然條件方面，則就在目下亦不能發見這二者間有更小的差異。（默林：『史的唯物主義論』）

爲什麼以技術爲基礎而不以自然爲基礎？

考·察·社·會·及·其·各·種·發·達·條·件·、各·種·形·態·、與·內·容·等·的·時·候·，我·們·不·可·不·從·生·產·力·之·分·析·出·發·，或·從·社·會·之·技·術·的·基·礎·方·面·出·發·。

這個一點也不錯。以下試檢討一下二三反對這見解的人的駁論。

第一、是大體上承認唯物論的觀點的學者所出提的。如枯諾（H. CULLOW）在『新時代』（Neue Zeit）第三十九年號、第二卷、三五〇頁以下（註），曾主張之曰：『技術非常受自然條件所制約。一定的原料之存在，決定一定種類的技

術之能普通地發達與否，又決定其發達的方向將如何。比方沒有一定的石材木材、鑛材、纖維、貝殼、存在的地方，土人必無由獨自學到對這些天然材料加工、及從而製出用具武器等事來的道理。我們則在本書冒頭就舉出過各種自然條件之影響的例子。然則我們爲什麼不從自然環境之分析出發呢？爲什麼方法論的出發點不擱在這自然界上面呢？況自然這東西，在枯諾所說的意味上對技術本是給以影響的。同時自然之先於社會而存在又是誰也明白的。然則我們取人類社會之物的技術的機構作分析之基礎、而不取自然，豈不是很冒瀆「正當的」唯物論、的分析法麼？

（註）俄文原本是說三五〇頁以下，德譯本則爲「五三頁」以下。（編輯者）

但是枯諾這種議論是怎樣錯誤了的話，我們只要多少對這問題加以注意就可曉得。不待說無炭床不能得炭；但同時手指頭也掘不出炭來。尤其是人連炭的使用性都不知道的時候，則更困難。「原料」決不是枯諾所主張那樣存在於

自然之內的東西。「原料」依馬克斯說時是勞働之生產物。拉佛爾(Raffaello)的畫和枯諾的襯衣，也一樣都不是自然界可得而「存在」的東西。(枯諾在這場會把「原料」和各種「勞働對象」混爲一談了(註)。枯諾把：要使木材鑛物纖維等能作原料之用時、與之相應的技術決不可少、的點，完全忘記了。炭，必待技術發達、掘成深坑、從地底下剝出到地面上來、的時候，而後成爲原料的。在供給材料的意味上、的自然之影響，其自身也是技術發達之一產物。蓋在技術未獲得煤炭以前，煤炭是不能有什麼「作用」的。在技術未持其觸角觸近鐵鑛以前，鐵鑛是能够貪眠醉死，而無由對人們發揮其絲毫影響的。

(註)「……反之若勞働對象本身被先行的勞働濾過了的話，我們就呼之爲原料。……一切

原料都是勞働對象，但一切勞働對象不能說都是原料」。(資本論第一卷·平民版

·伯林·一九一四年·一三四——一三五頁)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裏對作勞働對象的自然生作用的話，是毫無疑問的

事。不過原形原樣地存在於自然界裏面的各要素，這場合大概是不起什麼變化的。故用這些要素去說明各種變化是不可能的。反之變化的是社會的技術；這技術不待說又和那原形原樣地存在的各要素相適應。（我們不能適應「無」，隨什麼大砲也不能從一個空虛中製造出來）。但技術如是可變性的東西、而且技術之這變化又是使自然對社會之關係也要起變化時，則分析社會的變化之出發點就應該在此而不在彼；這是很明白的。（布哈林：『史的唯物論』第五章、第三四節）

人——自然——社會

人類全部的生活，可歸之於人——自然——社會——三要因之中。但這壓

縮了的公式，從而就很不精確的公式，我們有擴大起來的必要。我們認為各一定的地方之自然環境——即宇宙的、地質學的、地勢的、條件——，動植物界，及人類間存在的各種常恆的關係等，即是形成 *biome*（人）種的要素。又人類本是不能不獲取生活手段以保其生命不受一切危險的。這是他們的絕對必要。——正因為有這必要，故每個人就必得和別的人聯繫起來。

想根本本地將自然和生物間的關係加以變更時，人也好、動物也好、都用這社會的聯繫一事實就可充分做得到。因為社會的聯繫，是站在人及動物及自然環境三者之間、而創造人為環境、以使自然環境的影響能變成為於社會成員有利、的東西的。

但是想盡量地多多生產且盡量地將擁護自己的組織加以改善、的那種處心積慮，又不僅造出社會來而且創出用具來。而該用具又和人類的自然器官毫無不同，只是藉自然的環境而愈有力，依人為方法而愈善於適應而止。人用自己

一個孤立的力量時，稍爲高明一點點的用具都不能完成。故人類在其極初期的發達階段上就已經是製作用具時必與社會密相關聯的。於是社會和用具——兩要素，就相互制約，共形成一個保護人類不受外面自然之壓迫而獨立起來、——的單一的人爲環境。這兒於是表出了人類的特徵。因爲動物也有用具是很普通的事。有共同的社會生活尤不稀奇。然動物不能製造用具，這唯人類纔能，亦唯人類中的用具纔帶社會性。而這社會性又是使人爲環境的保護力及獨立力愈行加高，以使人類在全生物界上、地位愈行優越的。

這人爲環境的力之最初的顯現，是顯現於人類特有的適應方法上。一切動物之向新環境適應，概依器官之對應的變化，即對應的有機的變化，可以作得到。如果不起這種變化時，則動物一落到新環境內就必死亡。唯人才能單依用具之變化，適應得最複雜的環境。結果、於是人可得而生活的自然境界，遂益擴大；而其自然的肉體又在種種場所與時間條件之下不須變化。

即用具之變化代了這肉體的器官之變化。……

不過用具變化之急速而顯著，是在其取得了社會性以後。未取得以前，則人也是幾百年間住在地球種種地質變化及氣候變化之中、而蒙受其一切作用的。且亦如動物一樣，什麼顯著的心的變化也沒有，歷史也沒有，只過其單純生活的。但一自生產用具及保護用具帶起社會性以來，於是爲期雖短而內容則極豐富的人類史，就登了台。不過登台以後，在這人類史的全時期中，在這包圍人類的自然環境及人的肉體器官概沒什麼變化、的歷史發達過程當中，除用具變化外果什麼也不變化麼？曰，不，還有社會是變化的。即社會進化及社會歷史等，是受生產用具所制約的。（保護用具，我們視之爲單是生產用具的異形異態的東西；但較之生產用具，保護用具的意義要低下些）。

生產用具和自然環境一道地、制約生產方法。除開最原始的生產方法——只要有咀嚼器官及自然的把握器官就夠了、的果實與樹根之採集——外，我們

可以說狩獵、漁撈、牧畜、耕作等都是受社會所有的用具所制約的，——即受社會用以適用於開拓自然富源的用具所制約的。

論生產用具時我們不可忘記火的事情。因為火是人為地創出來、的最狹的意味上的用具。火最初本是從自然裏面發生的，後來才為人所利用。人利用以作強化自然器官或補充自然器官、的一切東西，如概是且概可呼之為——用具，則這火自然也是屬於用具的範疇之中。火在原始社會發生時，乃至社會發達成爲種種形態時，皆曾表演過非常卓越的作用，是誰也知道的。

原始的生產方法以後所續起的各種生產方法——直到近代巨大的機械生產方法止——，概是依用具之社會的發達而一個一個地交替下來的。這體系，依不斷地希求獲得更高的勞働生產力的欲求、而增大，而複雜化。自然環境對生產方法及對全社會生活的影響，則反之和這發達成反比例。因為用具將其可能作用於自然、的自己的能力交與社會，社會在某一程度上於是就得利用之而將

自然加以變革。同時生產方法及爲生產方法所制約了的社會關係，又於人的生理的生活上也能影響，將某一感覺銳化之，某一感覺鈍化之，某一器官發達之，某一器官退化之，——簡言之即助成『人種』的退化或完成。再則人的腦髓受社會產物的思想所影響而起生理的變化、的點，更是不待說的事。而且這些要素，對將來某一時候要到來的世代的性質上必給以決定的影響的話，也是具有蓋然性的。

這樣、於是自然之變化，乃至人之肉體器官之變化，亦爲有史以來人的生產用具及方法所制約了。用具之社會的體系使人類支配了自然時，這體系在人與自然之間形成了橋樣的東西時，——從那時候起這體系就制約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切關係。理由則因爲這體系第一制約人與人相互間的關係，從而第二復制約全社會生活。（克勒士、克羅茨：『何謂經濟的唯物論？』）

人口增加不是第一義的要素，是第二義的要素

想增殖的衝動，實在是牢固地存在于人的天性內部的東西。在人類社會未形成以前，我們就能發見牠。牠是自然的、動物的、生物學的過程，社會經濟未組成以前就存在過。這過程才真是全發達的基礎，社會的發達過程是受這人口密度之增大所決定的，——人們或許會這樣說。

但這合法則性，同時又很容易看出是反對方面的合法則性。換句話即人口數的增加之可能性本身，是繫于生產力的發達程度上、即繫于技術的發達階段上的。人口數之增加（多少總是繼續地增加），正即是社會組織體之擴張與增大。社會與自然的關係非常順序地展開得好時，這人口增大才可能。因為

數量上增大了的人口，沒有社會生活基礎之擴大在、是不能生活的。生活基礎縮小時，人口且必然地要減少。至其減少的方法如何則是另一問題。比方生產數自然減退，或人爲地制限之使之減退，或則死亡率增大，即由疾病、早老、及平均壽命之減短、等所形成的死亡率之增大，——等等都是；社會的生活基礎與其社會的容量之間的這根本關係，總得必選這些方法中的某一個以自打開局面是無疑的。

又這人口增大如視爲純生物學的『自然的』增加過程，則更完全錯誤。因爲這過程是依存於一切社會狀態之上的，即依存於階級分立、及各階級的狀態、以及社會的經濟形態、之上的。社會形態——即構造，則又如後所述是依存於生產力之發達水準之上的。於此，故誰也容易曉得：技術之發達與人口之變動——即其數的變化——之間的關係，是決不很簡單的；除素朴的人們外，決不會認人類之增加和動物之增加是同樣原始而又單純的事。比方一社會內要

使人口增加時，生產力也不可增大。否則如我們前面所述：過剩的人口就必會枵腹待斃。不過同時物質富財縱增大，一定常常地而且一定各階級地、人口皆概行增加的話，則又不然。如無產階級的家族因生活負擔太重常人爲地自減生其子女，上流社會的婦女爲保其容姿計亦常避忌做母親，法國農民爲使財產不分割起見亦不想生兩個以上的兒子。——結果於是人口變動，就按社會形態及按個個階級與集團的狀態、而依存于許多社會條件之上。

所以我們對於人口問題可能這樣說：即人口增加一事無疑義要以生產力之發展爲前提，社會之各時代各形態及階級的種種狀態又必惹起人口變動的特殊法則。『一抽象的（一般的、即和具體的形態相獨立的、——布哈林插入）的人口法則，人如不歷史地加以干涉的話，只是植物動物裏存在而止。……各特殊生產方法，皆有其特殊的、歷史地妥當的、人口法則在』。（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六七九頁。德譯註：漢堡版、一九一四年、五九六頁）同時歷史的生產

方法——即社會的形態，又被生產力之發達——即技術之發達所決定。故人口變動之合法則性不是決定的，生產力之發展及這發展（或衰退）之合律性反是決定人口之發達的。（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機械之發達

數學與機械學家常說用具（tool）是單純的機械，機械（machine）是複雜的用具。（英國經濟學者裏面也常能發見模倣這見解的人物）。他們說這話，不僅是對二者間的本質的區別絲毫也沒注意，而且是將槓杆、鈎、螺旋、楔、等——那些單純的機械力也認作機械去了（註）。隨什麼機械，都是由這種單純的機械力——怎樣假裝而成的也不管、怎樣複合而成的也不管——所組成的是事

實。但從經濟學的立場看時，上舉的那種說明法總是毫沒用處。因為其中缺乏了歷史的要素。

(註) 譬如看 Charles Hutton 的 “Course of Mathematics” 就知道。

另一方面則想于：器具之中人是動力，機械裏面則獸、水、風等和人力不同的自然力是動力，的見地之下將二者加以區別(註一)。依這區別法時，則種種生產時代所行的用牛曳犁、的犁、反是機械，一個勞動者的手所運轉、每分間能織成九萬六千個布格(Picks)、的克羅孫(Clausen)式的迴轉織機，反不過是一用具。同時，同一個機器，用手運轉時為用具，用蒸氣運轉時為機器、的說法也會成立。不過人類之利用獸力是人類發明中之最古的一項，故機械生產事實上較手工生產為先、的話，或者也可以說。威亞特(John Wyatt)在一七三五年發明紡織機器、開始了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時，雖一句話也沒說過該機械不要用人去運轉而用驢馬去運轉，但這工作還是歸到驢馬身上去了。他

會說明過這機械爲『不用手指能够紡織』的東西。(註二)

(註一)「從這見解時，用具與機械之間的界綫也可以尖銳地劃出。鋤·槌·鑿等·換句話別的点不論如何造的精巧然結局總是以人爲動力的各種槓杆裝置·螺旋裝置，總都屬於用具一概念之內。反之藉動物的力·風車·及其他的事以運轉的犁，則當算入於機械部內去。(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ktion", Zurich, 1843, S. 38)。

這書在許多點上都值得讚賞。

(註二) 在他以前，雖然極不完全然預防機器已經有人使用過，——最初像是在意大利。假如早就有人著過批判的工藝史，則十八世紀任何發明都不應該歸於某一二人的力，的點就當早就論證過。不過這種工藝史素不存在。達爾文曾喚醒我們去注意自然之工藝史(換句話即動植物爲生產生活資料而形成的各種器具、之發達史)；不過社會人之生產器官也是被用作各種特殊社會體制之物質基礎而形成的，豈不一樣也值得注意麼？著述這種形成史時，并且豈不比動植物的還更容易得多麼？因爲誠如威哥所說：人類

史是我們創造的，自然史則不然。并且工藝學這東西，又正是闡明人類對自然的能動關係的，換句話是闡明人類生活之直接生產過程、從而又是闡明人類的社會生活情況及由該情況所生出的知識上的各觀念之直接生產過程、的；閉却這種物質基礎時，宗教史都會成爲無批判的東西。而實際上，由分析以發見宗教之夢幻的觀念之現世的本質，較之從各場合的實際生活情況去展開其天國化了的各形態，還要容易得多。并且唯這後者，才是唯一唯物論的方法——從而故就是科學的方法。一般排除歷史過程、用抽象方式倡出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其弱點僅依其代辯者（Spokesmen）出了他們專門領域時立要懷抱起來：的那種抽象的、唯心的、各種觀念一看，就可曉的。

一切發達了的機械，概是由於本質不同的三部分所形成。即發動機（Motor Mechanism）、配力機（Transmitting Mechanism）、及最後的用具機——即作業機（Working Machine）、三者。發動機是全機構的動力作用者。其中如蒸汽機關、熱汽機關、電磁機等自能造出動力來的也有，如水車之于水、風車

之于風、及其他受外部既存的自然力之刺激的也有。配力機則由節動輪，動軸，齒車，滑車，索帶，鋼，調帶，小齒車，及各種各類的聯動機，所成。是用以調節運動的，必要時且是用以使運動形態轉形——如從垂直運動轉形為圓形運動——且傳達運動于用具機之上的。——以上兩部機械，都是專為傳達運動于用具機、使用用具機把握到運動對象而合目的地變化起來的。同時作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之出發點的，也實是這用具機。眼前凡由手工業（Handikraft）經營、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經營推進到機械經營方面去的，也還是這用具機不斷地作出發點。

但更進一步把用具機——即把嚴密的意味的作業機——加以觀察時，我們當立能發見：其中形態變化得利害的地方雖也屢見不一，但大體上還是手工業者或工場手工業勞働者所使用過的裝置與工具之再現；雖然從前是用作人用的用具，現在是用作機械用的用具——即機械的用具，其中誠然有些差異。要之

全機械，如力織機 (power-loom) 一樣(註一)不過是將舊來的手工業用具多少加以改訂而出版的；或則如紡織機內的紡錘、編襪機中的編針、鋸材機中的鋸子、裁斷機內的小刀、等一樣，將古來就存在過的作業器官取而裝之于作業機上的。這些用具和嚴密的意味上的作業機體間的區別，在前者之誕生中就可看出。即前者眼前尙大概是由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裏面製造出來，製出之後才取而裝置于由機械所生產的作業機體之上(註二)。

(註一) 就中，力織機的本來形態之中具有舊來的織機之形態的話，是一看就明白的。其本質的變化，到近世的力織機內才能看到。

(註二) 英國的作業機的用具裏面主要的部分，由機械製造出來——雖不是由製造機械本身的製造家製造——的事，概是一八五〇年以後才如是。製造這種機械的器具、的機械，如自働卷絲的製造機械，梳刷毛的磨齒機械，梭的製造機械，forging rule 的製造機械及 throstle 紡錘的製造機械等。

要之用具機這東西，是適當的運動傳到了自己身上之後、作從前勞働者用相類似的用具所作過的那種同樣的作業、的東西。至于動力是從人來或不從人來，則毫不與問題的本質相關。嚴密的意義上的用具、從人手移轉到了機械之手時，一機械即起而代單純的用具。這區別，在人本身還是第一動力的時候就是如此。即勞働者同時可得而使用的勞働器具之數量，是受勞働者自然的生產器具——即其自身的身體器官——的數量所限制的。德國最初想一個紡績工人踏兩架機車。即想一個工人同時因兩脚去勞働。但這也太費力的勞働法，故後來就發明了一架紡車上設兩個紡錘。于是同時能紡兩根絲的那樣熟練工人，遂如兩頭人一樣少到萬分了。而反之多軸紡織機，則最初就是用十二到十八個紡錘組成的，編織機也是同時用幾千根編針一同起編的。蓋用具——一個機器能同時使之運轉的用具——的數目，早已從手工勞働者身體器官上之制限——狹小其自己的用具、的身體器官上之制限——解放出來了。

作產業革命之起點的機械，是用同時操縱同一或類似的多數用具、及依單一的動力——無論是什麼形態的都可以——而運轉、的機構，去換處理單一的用具的勞動者的（註）。結果于是機械遂成立。然這還不過是以機械為一生產的單純要素、的意味上的說法。

（註）『統合這一切單純器具・用單一的動力去使之運轉、的，即為機械』。（Babbage・前

揭）

想把作業機擴大、且增大在該機內同時運轉得來的用具的數目時，更大的發動機構就不可少；這機構為戰勝其自身的抵抗起見，比人的動力還強大的動力又不可少。人是極不完全的——想他作製造劃一而又不間斷的運動、的生產機關時。同時這點縱不問，也還是非更強大的動力不可。因為人是只能作單純的動力之作用的；他的用具一旦被用具機代理了時，自然力之能作動力起而代之的位置乃是至明至白的事。從工場手工業時代傳來的一切大動力之中，馬力

是最壞的。理由則因爲一方面馬有自己的慾求，另一方面馬價既高而其在工場內的用途又有限制（註）。

但是雖然如此，在大工業的幼年少年時代，馬還是屢被充用過。看當時許多農家的苦訴可以曉得，看用馬力表現機械力的習慣今猶未變，也可曉得。

（註） John C. Morton，一八六一年一月在「技術協會」上曾朗讀過一篇關於「農業方面所充用的動力」一論文，其中有一節這樣說過：「助長土地劃一的一切改良，更擴大了蒸汽機關——純粹機械力生產上所能利用的——的範圍……。在爲曲灣的垣牆或其他障礙物所妨礙。劃一的動作不可能時，馬力就不可少。這等障礙物，現正日歸消滅。在須要意志發動之處絕無、須要現實力量發動之處亦僅少、的作業上，可得而利用的力是沒有的，——除不斷地依人的心意所指導的力（換句話即人力）之外」。——這些話說完之後，接着 Morton 又把蒸汽力、馬力、人力、三者化爲蒸汽機關上所常用的單位（即將三萬三千封度的重量、一分間舉高一呎時所要的力），而定蒸汽機關一時間

一馬力的費用爲三片士，馬一時間一馬力的費用爲五片士。再則馬要完全維持其健康時，每天就不能作八時間以上的工。使用蒸氣力時，則每年耕地上充用的七匹馬當中至少可以節省三匹。同時一年之內馬可實際使用的期間不過三個月至四個月，用蒸氣力時所花的費用又不會比上舉能夠節省的三匹馬的費用還多。最後，在農業上能用蒸氣力作業的地方，其作物的品質又較馬力作業的還要好的多。僅用蒸氣機關去勞動時，要六十六個勞動者，其一時間的總費用爲十五先令；作和馬所作過的工程時則要勞動者三十二人，一時間的總費用爲八先令。

風太不規則而且難于制馭；而且在大工業的發祥地英國，也于工場手工業時代就會多用過水力。——蓋用一個水車運轉兩個上臼及兩個下臼，十七世紀的時候就流行過。但配力機之範圍擴大以來，素來的水力就不够用了。這于是成了使一般人更精確地去研究摩擦律、的動機之一。同樣在磨穀機——將杆子前後運動而運轉的——方面，亦因其動力作用不規則，後年大工業上占過極重

要地位、的節動輪 (Fly-Wheel) 之學理與應用，也就因以產生。(註)

(註) Faulhebr 式，一六二五年。De Couss 式，一六八八年。

——這樣，於是近代大工業之最初科學的及技術的要素，遂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展開了。亞克萊特 (Arkwright) 的 Throatsle 紡織機器，雖最初就是用水力運轉，但用水力爲主要動力時也有種種困難。因水力既不能任意增大，不足的時候又不能補充，有時候且有一點也沒有的事，尤其是其本質是純地方式的東西。(註)

(註) 近世渦水車 (Turbine) 之發明，將產業上的水力利用、從舊來許多制限當中解放出來了。

到瓦特 (Watt) 的第二個蒸汽機關——所謂複式作用的——發明了的時候，才將炭與水二者消費起來而造出其自身的動力；同時該動力也是完全處在人的統制之下的原動機所發出的東西。這原動機在其自身是可動的，又是能使

他物移動、的手段，其性質且是都市的。——不如水車那樣鄉下的，且不如水車那樣在國內分散地生產，而是生產在都會集中的（註）。其在工業上的應用又是普遍的，依地方情形或處所影響的點比較少。瓦特的偉才，在其一七八四年所得的特許明細書中已表示過。即他在該書內曾將其蒸汽機關敘述之爲：不僅是特殊的目的上可以使用、的一發明，而且是大工業上普遍地可以利用的一力。他在該書內所加各種考察，像汽槌那樣的東西在半世紀餘以後才被採用的很不少。同時他自己也對於在航河上可得而應用與否尚在疑懼當中。他的後繼者波爾吞（Boulton）及蔣、瓦特（John Watt），才將大洋汽船上可以使用的——一個巨大的蒸汽機關在一八五一年倫敦勸業博覽會上出品。

（註）「機械手工業工場初期，經營場的位置必要在於水車運轉上有充分的落流、（Falls）的

河畔。但水車之採用雖爲使家內工業制度解體的首先發難者，然水車本身既只能設於

河流之傍，相互間又必隔很大的距離而後可能，則與其謂爲都會制度的一部分，很明

瞭地是田舍制度的一部分。迨蒸氣力起而代用水流的時代一來，工場才得集中於都市

——蒸氣生產上所必要的炭與水皆能充分發見的都市——及其他的方面。蒸氣機關是

工業都市的母親』。（『工場監督報告、一八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三六頁、(Alexander

Redgrave 所論。)

最初由人的手脚去運轉過的用具、一轉化成爲一個機械裝置的作業機的工具以後，發動機才亦從人力之制限之中解放出來，獲取了獨立的形態。結果、上述的各個作業機的地位，遂降落到了用機械去生產時的一單純的要素而止，一個發動機則成了同時可以運轉多數的作業機。在同時可以運轉的作業機的數量愈增大時，使發動機得以發達的配力機又成了擴大及于多方面的一裝置。

依配力機之單純的媒介、從中心的發動機接受運動、的各種作業機的組織體，才真是機械經營之最發達的形態；機械的怪物遂代個個的機械而出現於其中。這怪物用其自己的體軀，充塞了工場房屋的全部。其魔力最初雖爲巨大的

四肢之莊重緩漫的運動所隱蔽，但一行發動即立使無數的作業器官、發出一種狂熱的旋風運動。

一產業部門的生產方法革命時，惹起別的產業部門的生產方法也起同樣的革命。這個只要看各種產業部門——即依社會的分業而被相互個別化、而各生產獨立的一商品、而又相互錯綜、作一個相同的全過程之各階段、的各種產業部門——，就是如此。故機械紡績業就非使機械機織業成立起來不可，兩者相合，復在漂白業、擦染業、及染色業、各方面，非惹起機械化學的革命不可。他方面木綿紡績上的革命又喚起了綿纈機（gin）——從綿種內分離木綿的纖維出來時所必要的纈綿機——之發明，而使眼前社會所要求的大規模的木綿生產得以可能。（註）

（註）美國人 Eli Whitney 的纈綿機，比之十八世紀其他任何機械都是受根本變化最少的

——直到最近止。換句話，到一八五〇年紐約州 Albany 地方的 Emery 氏想出單純

而有效的改良機後，前者才變爲廢物。

農工業上生產方法之革命結果，又使運輸與交通機關——二者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不能不革命。傅立葉曾對於以小農業及其家庭的副產業以及都市手工業爲樞軸的一社會、說過許多話，但這種社會的運輸與交通機關就萬不能滿足工場手工業時代——社會的分業擴大了、勞働工具及勞働者集中了、殖民市場也有了、的工場手工業時代——生產上的慾望。故事實上這等運輸交通機關上面也就非發生革命不可。同時這工場手工業時代所傳下來的這運輸及交通機關又化成了大工業——以生產之熱病的發展爲特徵、以生產上規模龐大而豐富的資本及勞働者不斷地從一生產部門移轉到別一生產部門爲特徵、以新造出的世界市場之聯絡爲特徵、的大工業——方面很利害的桎梏。故結果帆船的築造上所起的革命的變化雖暫置不問，內河汽船、鐵道、大洋汽船、電信等的組織一發生，運輸機關及交通機關也就必得漸次和大工業的生產方法適合下

去才行。同時非常大量的鐵材上又新發生了鍛鍊、鍛接、截斷、穿孔、造形、等等的必要，從而於是各種巨大的機械——工場手工業式的經營到底製造不來的——就更得必須。

要之大工業是不可不掌握機械——即其特徵的生產機關——本身，而以機械生產機械的。必如此而後大工業才造得出和自己相適稱的技術基礎、而用自己的腳站得起來。十九世紀以來幾十年間，機械經營非常增大了，機械在事實上漸作了作業機之支配者。只有巨大的鐵道建設及大洋汽船之使龐大的機械——可使用於原動機創造上的龐大的機械——發生出來，則是一八六七年較前十多年間的事。

作以機械製造機械、上最本質的生產條件的，是隨什麼數量的動力也能供給、同時又完全能由人力制御下去、的那種發動機。這條件在蒸汽機關裏面已經存在了。但同時幾何學的各种形態——即在綫、平面、圓、圓筒、圓錐、

球、等那些個機械部分之構成上所必要的非常嚴密的幾何學之各種形態，又非由機械製造不可。於是十九世紀初葉十年間，莫茨勒 (Henry Maudslay) 所發明的滑台 (slide rest)，即爲解決這問題的東西。這滑台并且不久就被改造變形，除在本來的目的方面——即旋盤 (Lathe) 方面——充用以外，別的機械部分製造機方面也得充用起來了。這種機械裝置一來，因而失却其位置的并不是特殊用具，反是人手本身——比方便截斷機的切口向勞働對象的鐵相接觸而截成一定的形態、的人手本身。換句話即個個機械部分之幾何學的形狀，由此就能極容易地正確地迅速地製造出來；「這容易正確迅速三者的情形、縱是最高明的熟練工人傾其全部經驗所積的能力也趕不上」。(註)

(註) 匿名者著『國民之產業』，(倫敦、一八五五年、第二部、三三九頁、)。并且這書內

還說過：「這種附在旋盤上的屬具 (Appendage)，表面上或覺得是單純而不重要；

但在機械之改良與擴張上這屬具所給的影響是可和瓦特在蒸氣機關上所給的影響等量

齊觀的。自這屬具採用以來，一切機械之完備上、廉價上、乃至新發明與改良上、都受了刺激。

但製造機械時所使用的機械之中，那最嚴密的意味上的作業機一部分，如加以精察時則立可發見其中手工器具極多極多地被攝取在內。例如鑿孔機那種作業部分就是一巨大的錐，這錐雖是因蒸汽機關運轉，但如使這錐（作業機）沒有的話則這種蒸汽機關與水壓機等必不能產生Cylinders（圓筒）。機械迴盤，是普通踏旋盤（Foot-Lathe）之巨大的再生；機器鉋，是用木匠加工於木材時所使用的同一用具而加工於鐵材、的鐵製木匠。又在倫敦碼頭上鋸大木的器具是用的大剃刀，鋸鐵的剪截機是用的剪布樣的怪偉的剪刀；汽鎚那東西一般概是用鎚頭鎚打，該鎚頭的重量恐怕雷神Thor都舉不起。（註一）這汽鎚是涅士密士（Nasmyth）所發明的，其中以六噸的重要，從七呎高的高處垂直落下、打在一個三十六噸重的銑砧上、的也有。用這種汽鎚去擊碎一花崗石時簡直是如同兒

戲，一擊無餘；在柔軟的木材上連接不斷一拂一鎚地釘釘子，也是極其輕易。

(註二)

(註一) 在倫敦·用之製造蹶輪軸(Paddle-wheel Shafts)，而呼其名爲「Thor」。完全像鐵匠

造蹶鐵那樣的容易，將十六噸半那麼重的蹶輪軸隨隨便便地就造出來了。

(註二) 規模不大的地方也能使用的木材加工機，則概是美國方面發明出來的。

勞働工具成了機械的時候，即形成物質的存在樣式。——即形成以自然力代人力、以自然科學之意識的應用代經驗之常規、的物質的存在樣式。工場手工業時代的社會勞働過程之組織，是純主觀的，大部分是由勞働者結合而成的。但大工業時代的機械組織則爲純客觀的生產組織；則爲完成了的物質條件；和勞働者是相對立的。在單純的協業裏面，社會化了的勞働者之對個別的勞働者之驅逐，多少總是偶然的事實；在被分業所分化了的協業裏面，也是如此。反之除後面還會要述及的若干場合之外，機械則是僅藉直接社會化了的勞

働——即共同的勞動——而作用的；勞動過程之協業性，現成了技術上——基于勞動工具自身的性質的——的必須條件。（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

作生產力之基礎、的技術

我們從物質的構成部分的見地上觀察勞動生產能力的量時，我們可以發化三個量。一為被生產出來了的財富之量。二為生產工具（手段）之量。三為勞働力之量——即活的勞働者之數目。這三個量是相互依存的。實際上我們如曉得後二量——生產工具的狀態及勞働者的狀態如何時，我們當能曉得一定的勞働時間之內可以生產得若干財富。即由後兩個量可以決定前一個量——被生產出來了的財貨的量。同時後兩個量則又正是我們素所稱呼的物質的生產力。如果

我們曉得一社會內其生產手段爲何種且有若干、勞働者爲何類亦有若干、時，則我們依此又能曉得該社會支配自然的程度究如何，使自然隸屬於自己的程度又如何。換句話，我們在生產手段與勞働力二者之中，能發見指示社會發展的程度、的精確的指路碑。

不過這事體我們又還能深刻地觀察一下。即我們還可以說生產工具還決定勞働力。例言之單式印刷機如加入於社會勞働體系去時，與之相倚應的熟練勞働者就也要出現。同時在勞働過程內相協働的各種要素，也不是人與物之單單的集積，而是各物各人各站在自己所負的職務上而又相互適合的一組織體。故生產工具存在的地方，與之相應的勞働者就也必存在，這是一定的。同時生產工具當中，又可區別之爲二大集團，即原料及勞働器具。後者勞働器具之爲能動的部分，尤立能看出，即人用以作用於原料之上。——自然，當我們說某一社會具有這些這些用具的時候，該社會同時具有與這些這些用具相對應的原料

在、的話，又是不待說的。我們考察常規的再生產過程時就立可曉得。——唯其如此故我們可以斷言曰：社會的勞働器具之體系——即該社會之技術，乃是自然與社會之相互關係之精確的標準。這技術是表現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及社會的勞働之生產力的。（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技術之發達

經濟的發達要即技術之發達——要即發見與發明之系列。這發見與發明，當然又就是人的精神與經濟的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只有對於人的精神在社會內具有積極的作用的點絕不加以否定、的史的唯物論，才能和從來一切理論不同，對這力之活動作出說明來。

(註)

馬克斯曾指摘過直到現在沒有工藝學之批判的歷史。資本論內曾說：「達爾文曾喚起過我們去注意自然界的工藝史（換句話即動植物為生產生活資料起見而形成的其自己的各種器官之發達史）。但社會人的生產器官，也是被用作各種特殊社會體制之物質基礎而形成起來的，然則豈不也值得同樣注意麼？著述這種形成史時，并且豈不是比動植物史時還要容易得多麼。——因為如威哥所說：人類史是我們所創造的，自然史則不然。至於工藝學這東西則又正是顯明人類對自然的能動關係的，換句話是顯明人類生活之直接生活過程、從而又是顯明人類的社會生活情況及由該情況所生出的知識上各觀念之直接生產過程、的；漢殺這物質基礎時，宗教史都會成爲無批判的東西。而實際上，由分析以發見宗教之夢幻的觀念之現實的本質，較之從各場合的實際生活情況去展開其天國化了的各形態還要容易得多。并且唯這後者才是唯一唯物論的——從而故·又·就·是·科·學·的——方·法·

人的精神能導引社會使之運動；但導引時決不是以經濟條件之主人的資格

而是以經濟條件之奴僕的資格去導引的。蓋唯經濟的條件是主人，常對其作奴僕的「精神」提出任務來，促其解決。同時復給之以解決的手段。故經濟條件，實是對人的精神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可得而到達的結果、及不能不到達的結果，加以決定的。人的精神將其當前的任務立加以解決而達到於某一最近的結果時，這最近的結果是他能夠預見能夠希求的。但其他各任務則他決不會預見，而且屢要生出和他的意嚮正相反對的結果來。蓋經濟的發達，雖是經濟的條件和精神之間的相互作用之產物；然決不是人的自由計劃的行動之產物，即決不是任意按自己的心性去左右經濟條件、的那種自由行動之產物；故如此。

177

某一技術的任務之解決，同時必更提出別的新任務來。某一自然障礙克服了之後，更要克服的障礙必又會發生。一慾望之滿足尤必誕生新慾望。而各個技術過程，則又為這些新任務之解決上提出新手段。

至於自然科學方面的事情則如何的話，巴克士曾歸之於單純的『外面自然現象之觀察』上。但這樣是半步也沒有前進的。僅僅觀察的話，野蠻人也可能。一般地說時，而且對外面自然現象作觀察時野蠻人的觀察力比我們還要銳敏得多。故對自然方面的事僅講觀察，是毫不能解決的。野蠻人不能解決就是明證。蓋野蠻人雖有銳敏的觀察力，然決不是說野蠻人就是哲學家。自然之觀察成了自然之征服的時候，該觀察才能進到於自然之研究的地步。哲學家與蠻人的區別，不在於觀察自然的點上，而在於前者懂了自然、後者則說自然是一個謎莫明其妙、的點上。單純的觀察，固然對於自然各現象如何發生的點是能告示我們的，但自然之哲學的研究則從爲什麼有這麼一些現象發生的點出發。人本最初就不能不設法將自己與自然間的臍帶切斷。即在對自然能作哲學的研究以前，人在某一程度內必先克服了自然、站在自然頭上、才行。人對自然的支配愈增大時，人對自然之科學的研究才能按技術之進步而擴大其範圍。哲學家

先生們如果沒有望遠鏡、顯微鏡、度量衡、實驗室、測候所，即僅用其『思想之進化』的話，是於自然科學毫沒補益的。一切這種技術的裝置，不僅是提供如何解決自然科學上各問題的手段而且是能够發見問題本身。而這一切用具又是經濟發達的結果，即又是依人的媒介而作過新的進步之起點、的結果。自然科學之發達，是和最廣的意味的技術發達相提并進的。任何時代的技術條件，都不單是那時代的用具與機械。近代化學的方法及近代數學也是其構成部分，參加過其現存技術體系的。假使沒有數學的話，試建設一汽船或一鐵橋看看。沒有近代的數學，資本主義社會明是不可能的。而該數學的情形又和機械技術的情形及至世界貿易的情形一樣，同是參加現存社會經濟條件之構成的。換句話即這些要素是彼此最密接地相關聯的。

結果即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哲學，其發達是與經濟的發達有內面聯繫的。一時代的經濟條件，對於哲學家不僅給以觀察上必要的餘暇，而且給以更

大的東西，即給以解決任務——該時代所提出的、思想家所不能不急與解決的——的手段。（考茨基：『唯物史觀想給些什麼且能給些什麼？』）

技術的發明

一、精神與發明

我們說過：生產技術是生產關係之基礎。然則我們不是承認了人的精神是生產關係之基礎、的說法麼？

不待說是承認了的。因為所謂生產技術，是有思考力的人意識地發明生產器具而應用之之謂。同時我們從唯物史觀的立場上說全社會的基礎在於生產技術上、時，不啻又就是說全社會的基礎在於人的心身之勞動上。

但是這樣豈不與我們素來所說的相矛盾麼？豈不也是和精神爲社會進化之主要動力、的說法，同一內容麼？

蓋說精神產出生產技術，生產技術造出社會時，畢竟還是精神是社會之第一原因。這點還得精詳地考察一下。

精神是生產技術的一部分、的話，唯物史觀決不否認。因爲生產技術是人間的事業。人又不待說是思考的動物。而生產關係（即財產關係）又是人的關係。人的行爲思考都是在這關係裏面表出。生產技術、財產關係等，又概是物質的而兼精神的。故我們不能否認這話。

但說精神有自立性、其活動亦有自立性、時，則我們毫不遲疑地加以拒絕。即拒絕精神的超自然性，不可解性。故我們說：精神縱發見新科學，或發見新生產技術，然還不是由於精神自己自立獨主的活動得來，而全是社會的慾求之結果。

技術上之發明，古來大概是由直接與生產關係相關的人所作成的；因為他們心裏頭，有意使勞働更能有效地更能迅速地為他們乃至為社會全體增進富裕及安樂。

無論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社會，只要是一社會，則不問其為大為小，為游牧羣團或為家族共產體，為封建社會或為資本家社會，——這種發明技術的衝動總是社會的東西，又總是經濟的慾求之結果。

詳言之即在共產社會的時候，該衝動是想對團體作些貢獻、的社會的衝動，在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該衝動是想對階級的個人——有產者或有產階級——作些事情、的社會的衝動。

這是不奇怪的。人本來是社會的動物，人的勞働是社會的勞働，故想改良勞働的衝動也不是從個人的特殊精神產生而是從各個人的社會關係產生。換句話，對於生產技術之改善、的勞働之衝動——即發明之衝動，完全是一個社會

的衝動。是完全由一個社會的慾求所產生出來的東西。

這個就是唯物史觀所想的點。唯物史觀是否認精神的自主權，排斥其上權的。即唯物史觀曰：精神是依社會慾求所強制而餒在一定的軌道之內的，這慾求則又是一定的物質生產關係所產生的。故在這點上，精神之至上絕對權早已被否認。

這生產技術與科學的關係，是極重要的問題，我們還得暫對牠加些攷究才行。現為說明起見試舉二三實例如下。——

二、中世之發明

先看：中世紀的匠人。當時社會為滿足布疋的需要，概用手織機就够。并且商業、交通、外國市場等，當時都還極幼稚，故很強大的生產力之發現也不必要。社會對這種慾求，還一點兒也不感着。

但聰明的織匠，在當時也就對自己的生產器具多少注起意來了。因為生產

愈順利愈迅速則於他們就愈有利，故他們注意及之。

結果於是他們發明了一些且應用起來。該發明又爲同行的織匠所知道，所模倣。但是這種發明又究不過如是如是而止。一點點而且差不多沒有進步、的生產上之變化，正是當時十年百年間唯一的變化。而且這一點點而又沒進步的變化，又是完全根於個人慾求而來的變化。

但其後（如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通商非常發展，外國市場非常擴大，需要母國的製品、的殖民地又新建設成了功。這時候於是對於生產技術之改善——即對於勞働生產力之增進、的社會的慾求，就擴大，就普及了，對該改善增進關心的人就不和從前一樣只有一二人，而成了幾十人，幾百人了。結果於是多數的小變化就急速度地累積起來，集中起來，該器具之完成遂得以促進。

三、過渡期之發明

其次我們又把最初發明蒸汽機械的人們——譬如拍興(Patin)——看看。

許多人對於生產技術特別具有趣味與才能。這趣味才能是幾百萬年來人類進化之所賜；一受生產關係的助援，在少數人心中更成了燎原之火。同時像這樣的少數人也就是屬於生產技術已經發達了的社會的，他們是只想更把該生產技術改善一下，依以確保社會的生產之發達增進的。他們——被一個社會的思想所驅策於是就注意到那水蒸汽的魔力上去。而以過去無數人類獸類水力風力所運轉的古器具作基礎，想出一個新機器來。他們誠然是具有偉大的社會感情的人物。想出這樣一個機器時他們又具有一個巨大的歡悅與慾求。故為完成這機器應用這機器起見，他們會犧牲時間、財產、健康、乃至其他。

但是這機器還沒有成為社會一般的要求。這機器之生產技術之進步太大。經費要得太多。結果於是他們發見出來的機器，乃不為世間所應用且漸被埋沒忘却下去。他們發明者遂因以落魄起來，坎坷以死。他們明是感到社會有此要

求而着手的，但誰知社會實際還不需要。或則極不充分地需要。換句話即發明過早。

四、現代之發明

其次我們取現代的發明家——如挨底蓀 (Edison) 那樣的人看看。他是一個耑門技術家。他的一生涯實是對生產技術作思索的一生涯。但他決不是早熟的發明家。他的思索決不是不能實現的空計。他只求社會——不、有產階級——要。生產技術之改良，在有產階級在資本家即是利潤利益之增進。故一切能使生產迅速、能使生產價廉、的發明，皆能立刻被採用。這立刻能够被採用的一宗事情，於是就促進發明家的勞働力，進而且使發明家想出些特別問題來。換句話即他們不復是作偶然的發明，完全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

唯其如此，故像挨底蓀那樣的發明家之發明慾，就純是一個社會的慾求所驅策而成。他的技術趣味，實在是依現社會、且在現社會之中、所生出的趣

味，即純是社會的趣味。同時他的工作基礎也是「社會的」。故他在實際上所成功的，乃至認爲一定有成功可能的，都是這社會之賜。

眼前常常聽到有所謂新機械發明而因須費太大至於不能見諸實用的事。譬如許多高明的農具，就大抵還是這樣。其中雖有實用了的，然還爲數極少。理由則是因爲這社會的生產關係太過於狹小所致。故由此又可曉得：個人縱感到一定的社會要求，用既存的生產技術作基礎新發明了什麼東西，并不一定都爲社會所採用。社會只實際上採用牠所要求、及牠的特殊關係內可得而應用、的發明的。故生產器具在其發生與發達兩觀點上都完全是社會的東西。從而其根基決不可求之於個人的精神之內。而唯於社會之中可得而求得之。（哥爾特：

「史的唯物論」）

發見與發明

誠如馬克斯所說，所謂問題這東西——最深刻地加以觀察時——之出現，是只在解決牠的物質條件已成立了的時候、或則該條件已在成熟的過程上的時候。

這關聯性，在那偉大的發見與發明之研究上也最容易看出。那些偉大的發見與發明，依唯心史觀的見解——理想主義及科學的唯物主義內都得必然地要發生這種見解——說時，都是天才所獨具的創造智叡所產生的，正如神仙能造法寶一樣；而重大的經濟轉機變革則由此始捲起來，興起來。但是事實上這種

發見發明，個個皆有其先行的長期歷史在。這歷史的各個階段如加以研究時，我們隨處又都能看到先有社會的要求存在而後該發見發明才得出來。『使地球表面完全變化了』的火藥之發明，及印刷術之發明，——像這種偉大的發明至今還有許多神話式的傳說與之相纏繞，事實決不偶然。我們對這種事實，除用大發明在其本質上決不是天才獨自的神秘深處所導出的個人產物、一理由，萬不能加以說明。固然事實上發明一東西的總是個人；該個人對社會確曾作過很大的貢獻；但是沒有當時時代的經濟要求及滿足該要求的手段先存在，該個人決發明不來；該個人要不過最深切明確地理解了這要求之性質及理解了滿足這性質的手段而止。換句話并不是發見發明等喚起社會之轉變，反之乃是社會的轉變喚起了該發見發明。社會的轉變產生了發明與發見之故，故發明與發見就具起世界的意義來。看美洲就知道，哥倫布未發見以前早已有人發見過。即紀元一千年的時候，諾爾曼人就到過美洲東北岸，且到過現在北美合衆國內部。

但不久這種被發見的國土立被人忘却了，找不着了。——直到資本主義發展之初步過程喚起了貴金屬、新勞働力、及新市場、等的要求的時候，於是第二次的美洲發見才具經濟革命之世界的意義。換句話，哥倫布并不是恃其天才的漠然不正確的自信去委身於作新世界發見之努力的，當時他心目中不過是想找出一條近路來、去接近古代文明國——印度——之神秘的寶庫。這事實是一有名的事實。即他發見最初一島的翌日，特書於其日記上曰：『這些心地純良的人們，大概會成爲很好的主之奴隸吧』。但事實上他每天對主的祈禱辭中，則說：『主其用其恩惠助我發見砂金吧！』。『主其用其恩惠』——的話，是當時的觀念形態。但現代的觀念形態則較此、較哥倫布、更爲虛飾了，即曰：『永處於黑暗地獄中的世界某部分的人類，我們當對之普及人性與文明』。

(註)

(註) 莫爾干在其前揭的著作二六頁裏面曾這樣說過：『和其他許多偉大的發明一樣，音的

字母之發明也是許多接三連四層出不窮的努力與企圖之最後的結果」。馬克斯在資力論第一卷二八五頁內也說過：「工藝學之批判史，必將指出十八世紀任何一個發明都不是屬於某一個人的」。

關於最天才發明家之悲運，在唯心史觀依其表面性自然也能發見人類忘恩的例證出來，以為純是由於這忘恩所致；但實際上這悲運乃是發明不能造成經濟的轉變、反之經濟的轉變乃造出發明、的事實所必要形成的正當的歸結。具有洞察力的深厚的智慧家，在物的條件當沒成熟達於能解決牠自己的程度的時候，其間所存在的社會形態尚未達於使一切生產力抵於發達的程度的時候，即該形態尚能使其生產力不感壓迫而且游仍有餘的時候，——這時候該智慧家就已感覺到了問題之所在，進而謀其解決。而產出使生產力較以前能擴大到非常程度、的發明來。但這真是他們的運命悲劇；他們的發明常如曇花一現，消滅無蹤。同時這一現一滅的事實，又很具意義，初非偶然。比方安湯、習兒勒爾

(Anton Schaller) 在一五二九年頃在「坦碎格」地方發明了連織機，六個織物能同時織紡。但「坦碎格」地方的委員會，認這發明將使勞工變成乞丐，禁止其使用，且謀把習兒勒爾秘密絞死或溺死。同時勒登地方在一六二九年雖曾使用過這機器，亦被織匠暴動所逼，至於廢棄。德國在一六八五年及一七一九年，尤會明下勅令禁止這機器，漢堡地方且由上官命令加以焚燬。而實則「這樣弄得世界不太平的這機器，在其本質上乃是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之先驅及紡織機器、織物機器等之先驅」。(註)同時在瑪堡 (Marburg) 當數學教授、想為產業發達計製造蒸汽機關、的德尼士、拍興 (Denis Pahn) 的運命，也是同樣的悲壯。因受各方面的反對至於勞騷潦倒不堪的拍興，將其已經完成的發明棄之不復顧、僅作一小汽輪於一七〇七年乘以出佛蘭塔河、出奔英國。然途中明丁 (Mundin) 市的高明的官廳，竟不許他再航行；挨塞爾的漁夫且把他的小輪破壞無餘。他於是幾成爲國人皆曰可殺的一個人，最後貧死於英國。而誰也明

白，一五二七年習兒勒爾連織機之發明及一七〇七年拍興蒸汽船之發明，又較之一七六四年哈格里甫士（James Hargreaves）之發明 Jenny 紡績機器（同時可以紡八根紗的小形紡績機，哈格里甫士發明之，用其妻 Jenny 之名名之，故有是名。——重譯者）及一八〇七年美國人滑爾吞所發明的汽船，還遙為重大的人類創造上的重大事件。是則縱謂前者毫無一點意義、而後者則產生了世界的轉變、的話為正確，然由此也就可以證實：發明之不能創出經濟的發達、經濟的發達反創出發明、以及人的智力不能生出社會的轉變、而只能完成社會的轉變、——的一事實之為絕對正確了。

（註）馬克斯「資本論」。

其次、理想主義的歷史家所常好利用以作其思想之怪異的飛躍、的印刷術及火藥二者之發明，試又對其來由加些探討看看。自商品商業日發達及商品生產日發達以來，中世紀的終期就引起了文學作品之急速的團體準備之必要，極

熱心的宗教的交通也抵於發達。結果遂造成古代厚板書新加以印刷、的結果。

從而印刷文書的事業，在十五世紀初期就發達到了要組織行會、的那種程度。在這行會裏面，最大的是紐倫伯爾(Nürnberg)、奧古士伯爾(Augsberg)、克倫(Köln)、邁因茨(Mainz)及紐伯克(Nübeck)等處。同時當時文書印刷者與書籍印刷者又不在一行會內，反與畫工在一行會內。又和書籍印刷者一樣長期間存在過，從事於小作品之複製。至於書籍印刷則又不是從文書印刷發生，而是從金屬業發生。漸次於是將印刷上所用的木製版板上的字一個一個切離，以便能任意排合，以使書籍能非常易於複製。不過這企圖，因為從木製的字版上想得到每行每行的平坦是技術上做不到的事情，故沒成功。同時用手去雕刻金屬製的字版也多費時間，版的凸凹雖可減少很多然也還不能完全除去。結果於是就只有將金屬製的文字版鑄造起來，這二缺點才可以概行除却。這鑄造即是活字之鑄造，亦即本質的書籍印刷之發明。即依文字能移動的援助，於

是一言一行、一序文、各頁數、皆得排印而至於複製起來、的技術之發明。孤吞伯爾 (Gutenberg) 與當時佛羅連士 (Florence) 所謂發明了印刷術的伯納爾德、擇披尼 (Bernard) 一樣，都是雕刻黃金的名人。究竟該實際的發明者是一個什麼人，恐怕爭到什麼時候都不能得到解決。因為第一提出這問題的地方只要是由其經濟的發達作背景，則各地方隨處都必對其解決努過多少力、成過多少功無疑；第二，孤吞伯爾對於這發明的最後一步發揮過最大的勇氣、最大的堅實、及得過最大的成功、——從而該新技藝遂得由邁因茨傳擴及于全世界、之說，縱歷史上確能舉出一些材料證明之為事實，然也只能說是他對過去積累下來的企圖、及許多先知先覺的不成功或半成功的事業、加過一番總決算而止。固然說他僅僅作過總決算并不是要減低他的功勞、乃至他的功勞或由此就要減色。他的功勞誰也曉得是不磨不滅的，他的發明是人類製造史上一個可驚可駭的新計錄是不成問題的。不過雖然如此，他也究不是提一聞所未聞見

所未見的植物移植于我們地上；而不過是將緩緩地成熟下來的一果實，高妙地加過摘取而止。

至于火藥之發明，則有名的諺語說是「最光輝地表出了人智」。這個在其自身本是不錯，但在其歷史的意義之說明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派又和哲學的理想主義派一樣，只留下可憐的結論，無往而不示其悲慘的不完全。比方克羅士教授證實過火藥發明後，暴力之權力及奴隸之從屬性都遭了破壞，原因則因其對於社會的幸福征服了個人的權力。即謂我們人類全部從此以後都得到了自由動作、再不致被縛死在地上。同時丟巴、勒筭教授則說：使羅馬人亦能知道火藥，——至少能曉得有火繩槍而應用之時，則欽波爾人、特甫吞人、以及哥特人、灣搭爾人、等日耳曼民族之襲擊，當會容易地加以擊破無疑。這真是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者，比在自鳴得意的銜學主義（Pedantism）內游泳着的哲學的理想主義家還要不可思議的說法！他——勒筭——而且繼續地說：「古代

人之未能發達自然科學，正是人類運命中先天註定下來了的莫可如何的事。意謂這自然科學之未克發達之中，即含有古代文化之趨于破滅、的一重要原因在內。而這『即是人類最大的不幸；使我們現在所有的自然科學古代人也能具有時，則那些野蠻民族之征服地中海沿岸的事那能會發生呢？』云云。——嗚乎哀哉，勒筭先生之未得爲一古代羅馬人，真是多麼可惜的一宗恨事啊！但是同時又像不怎麼可惜，因爲依先生自己的歷史哲學說時，也說過這『哥根礎倫之精神的近衛兵』（他以此名稱呼德國的學生團）之指揮官、縱在「布尼」戰爭時作羅馬軍團的指揮官也必不能發明火藥、——的話。但不管怎樣，總之對克羅士與勒筭這種無稽可駭的假說提出過反對論的，在布爾喬亞歷史家當中就有過一德里布留克其人在。德里布留克離史的唯物主義自然是離得很遠的；但他承認發明必先有與其相適合的必要在才行，該必要則又必在很多時代——有時須經過幾世紀——受過刺激之後才能真正成立。又說發明不能與其時代的要求

相分離，正如人無母則不得生。同時唯幻想的空虛遊戲才能耽溺于克、勒二氏的那種假說之內、及某種發明在別一時代亦有能保全其地位、以及且能使歷史的步調全然一變、——等說法，他也概行承認。且他正確地將自己的見解認為科學的，克羅士及勒密的思想認為『銳智的』遊戲。尤其是他正確地將火發之發明——精密地說時是火藥之使用——只認作封建主義沒落的手段，而不認作該沒落的原因。——固然他之認之為手段只是認之為非常微弱的手段，根本上沒有也不要緊的手段，這樣誠為矯枉過正，非我們所取；但這是另一問題，同時也很有意義，以下試作些深究。（註）

（註） 德里布留克：『史論及政論』三三九頁以下。

經濟的轉變導封建制度于崩壞。這是事實。然同時政治的上層構造方面之轉變，無論在那一點都決不能如軍事方面那樣迅速明瞭地反映出來。這點在布爾喬亞的歷史家也看破過。尤其普魯士軍國之形成是一顯例。故孤士它甫、

佛勒它格就認德國史是『德國精神』的產物。但是德國藝術創作之特殊性，及歷史上許多德國人集團生活之情形，又使他對史的唯物主義不得不讓步而與以承認。即他說：『墨羅因格（五世紀中期佛蘭克王國的第一朝代。因其王名墨羅埃亞，故有是名。

——譯者註）的佛蘭克軍隊，持楯的騎士軍，及宗教改革時代的瑞西人及蘭德士克涅甫特人（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之間的傭雇步兵。——譯者註），以及和此相同的十三世紀的傭兵等，概是那些時代非常特殊性之組織；亦概是那些時代的社會條件之產物，而又依該條件之變遷而俱變遷過的』。換句話即有產階級是發源于古代地方自治國及地方州之組織之中；騎士軍隊發源于封建組織之中；蘭德士克涅甫特人軍隊發源于年青的布爾喬亞向前發展的偉大之中；傭兵軍隊發源于諸侯地方割據之發展之中；——各皆有其一定的社會的發源條件。同時這類軍隊組織形態之後跟着來的就是十八世紀專制國家的軍隊；即由國家給以俸祿，施以訓練，成爲盧德威希十四世及佛勒德里希大王作皇子時代的

『規律軍隊』。(註一)而這『規律軍隊』則完全用火器把素來用槍刀的武力加以消滅了。他們是從種種民族殘滓裏面，用種種強制方法徵集得來的；對任何襲擊與攻擊本皆無抵抗能力，不過只能作射箭的機械而止。但他們這種雇傭得來的步兵，在其一般性及特性上，又曾對十四世紀式的封建騎士軍隊給之以瑪格拉登時代及曾巴甫時代的大敗績。這正是他們那種步兵民族之直接反映。即他們曾與楯戰，且曾與原始的武器——投石器——戰。至于他們那種戰勝攻取的強力則是由于將他們結合過在一起、的古代地方州組織內產生出來的。

(註一)

(註一) 佛勒官格著：『繪圖』五章·一七三頁以下。

(註二) 關於這點請看卡爾·標爾克里的名著『初代瑞士人的戰術』及『瑞士聯合國之由地方州黨派發生，及馬加爾登之戰』。

由上單純的對比·火藥發明是封建制度沒落的原因、之說之爲無據，就可

證實。蓋封建制度，是依都市發達及都市的王政之發達而沒落的。都市發達之結果，自然經濟才讓其支配的地位于商業經濟及工業經濟。于是封建貴族就只得讓其地位于都市布爾喬亞及各都市的諸侯。這新經濟力，從而又爲它自己創出了適合于它自己的經濟形態、的軍隊形態。即諸侯等依金錢的力量從封建制度沒落所形成的廣大的普羅列塔里亞之中，組成他們自己的軍隊。而籍產業發展的援助，諸侯的武器不僅較封建時代的武器爲優，而且在其生產之資本主義方法之中將這種爲優的武器準備好了。換句話，火藥雖不是他們所發明，——火藥是十四世紀之初亞拉畢亞人所發明而傳來西歐的——使用火藥的方法則爲他們所發見。自火器的使用方法發見以後，于是市民的攻擊手段遂比封建的攻擊手段，無條件地占到了優越性。新式大砲的砲彈一打來，舊勢的城寨就不復能保。槍彈一飛來，騎士的楯就失了作用。

不過雖然如此，射擊術則不是一朝一夕所發明的。這也是如其他一切事

情一樣，經濟的必要總是發明的母親。同時封建制度之沒落能那樣迅速地完結、都市與諸侯之努力能那樣敏捷地成長也都不是人智之創造力使之然；火器在其最初，不過比弓矢等高明點點，其改良進步從該創造力方面得過刺激很少。在加里桑與姆登的時代，雖占得火器在手然騎士軍還是非敗北不可。故知火器之發達是進行得極緩慢的。步兵之使用適宜的火槍及火繩槍等是其後很久很久才發生的事，我們誰也知道。蓋近代的步槍等是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某一高階段時才發生，才發生可能的。這種步槍，是專制主義持以與其軍隊組織及與其和絕對主義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兵法戰略——等相呼應、而導成其商業的軍國、的武器。人們如以為古代火器之發達遲緩是由于人智不進步之結果，則我們就可斷言：經濟發達的時候，——即在資本主義之狂暴的競爭迫逐之中、及資本主義持其狂暴競爭的鞭策日撻箠于人智之上、的時候，人智在殺人武器之發明上必可以表現其無窮無盡的能力無疑。——關於這點，我們現在能向說那

種話的人提出確切的實證。即只要請他們睜開眼睛，看看眼前這世紀的內情就得。（默林：『史的唯物論』）

自然——人體——社會

觀念形成的過程上，不僅外面的世界能予有作用，就是人的生活體亦予有作用；這是很明瞭的事。但是人的生活體，人的思考能力，人的藝術創作能力等，對於歷史曾多少給過很顯著的變化呢？——一點也沒有。比亞里士特勒士的思想能力還高明的人，我們曾沒有看過幾個。比古代希臘時代的藝術能力還強盛的時代，我們也還沒碰過一一。同時外面的世界也是一樣，變化過什麼呢？自然變化過嗎？——毫沒變化過什麼。即現代希臘人頭上還是和迫里克勒

士 (Picles) 時代一樣頂着同樣藍蔚的青天。而反之變化的只有社會。——歸根結尾起來又只有經濟的關係。自然與人縱有過變化，也只是在這經濟關係變化之影響之下。

固然這種經濟關係，不是決定『全人類行動』、決定『全體全人類生活』的唯一要素。但在對人類生活能給以影響、的各要素之中，這經濟關係總是唯一可變的要素。其餘的一切要素則概是不可變的，從而就決不會變化的。如果變化則只是依這可變要素的影響。故其餘各要素縱也能作構成人類生活之必然要素，然決不能作歷史的發動之動力。(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的要素』)



春秋書店最近出版各書

社會科學教科書	實用經濟學	新帝國主義論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韋爾斯世界文化史	蘇聯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	『國際』史論	哲學之貧困	德國農民戰爭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烏里雅諾夫與哲學	我的生活	光明在我們前面
塞姆柯甫士基編	高橋龜吉著	桑特爾著	博洽德著	韋爾斯著	日本改造社編	山川均著	馬克思著	昂格斯著	烏里雅諾夫著	石濱知行著	盧樸爾著	託洛茨基著	
劉沁儀譯	施復亮合譯 周白樑合譯	劉沁儀譯	嚴靈峯譯	蔡慕暉合譯 蔡希陶合譯	施復亮合譯 鍾復光合譯	唐俊夫譯	許楚生譯	吳西岑譯	彭葦秋合譯 杜畏之合譯	施復亮合譯 周白樑合譯	楊東尊譯	成紹宗譯	胡也頻作

社會科學教科書

俄國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 第一編 社會主義的必然
- 第二編 史的唯物論
- 第三編 史的唯物論例證
- 第四編 自由與必然
- 第五編 辯證法
- 第六編 辯證法的唯物論
- 第七編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書凡七編，共分九冊（一二編各二冊），計五十餘萬言。內容爲馬克思，昂格斯及其第二代的學徒——拉發格，列甯，普勒哈諾甫，考茨基，歐林，盧森堡，布哈林，希爾發丁，坡克羅甫士基，枯諾，哥特爾，……等，各專著內的代表文字所選集而成。爲有馬克思學以來唯一的拔萃文集，亦爲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唯一有結構有體系的教科書。完全不是散漫的機械的羅列與集錄，完全是由淺而深，由基礎而上層的最有機的全般的綜合。在其第一編論「社會主義的必然」時附有「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二篇以作入門者的參證。第二編論「史的唯物論」時，馬克斯主義以前的該學說，達爾文學說，自然條件與生產技術，基礎理論與上層理論，史的唯物論之應用限界及與「觀念」的關係，各階級，——等，皆成專篇。第五六編論「辯證法」與「辯證的唯物論」時，古代黑拉克勒特，德謨克里特；盧克勒秋士，及唯心的黑格爾等也都被採錄。我們于此，對馬克思學之歷史的地位，馬克思學之體系的組織，才算得到了立體的紹介。譯者排除無數障礙與花費最大苦心，爲之譯出。有志于斯學的人實是在是得未曾有的好讀本。第一及第二冊，已出版；第一冊實價三角五分，第二冊實價四角五分。其餘陸續出版，年內出齊。

經 濟 學 教 程

烏里雅諾夫著 施誠一譯

這是系統地編纂烏里雅諾夫的經濟文獻而成的一部著作，可以說是資本論以後的第一經濟名著，那有名的帝國主義論便包含在內。烏里雅諾夫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亦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者。讀了這本書，不但可以知道分析經濟的方法，而且可以懂得運用政治的根據。譯者以最大的苦心與努力把它的譯出，譯文之忠實流暢，想必讀者是早已認識了的。

高橋龜吉著

施復亮
周白棣合譯

實 用 經 濟 學

實價一元五角

近來關於經濟學的書雖則很多，但多偏重理論忽于實際問題，因此在初學者覺得經濟學不過是定義的羅列，術語的解釋，以及原理的分析罷了。究竟那些定義術語原理怎樣應用於事實，而事實又究竟怎樣有待於那項艱深的學理？這都使學者難以捉摸。這本書可以說是以學理為經，以事實為緯而編織成功的。換言之，即以學理來解剖活的事實，以活的事實來證實學理，又如以事實之橋來渡到學理之岸以學理之岸來引導我人的路。因其是這樣體裁，所以深入淺出絕無枯澀難解之弊，求理于事更有引人入勝之妙。無論已學或未學經濟學者，讀之均可得益，並可由此進而研究實際問題。用為學校教本，亦甚相宜。譯文明白流暢，讀者一讀便知。

德國桑特爾著 劉沁儀譯

新帝國主義論

實價八角

以大戰後德國的經濟復興及帝國主義政策再建為經，精密地深刻地總論全世界新政局及勞動運動前途的一九二八年世界最良的名著。新帝國主義的「獨占」「合理化」的實況如何，建築在這上面的內外政策如何，在其矛盾裏面所孕藏的世界政局的危機如何，——皆根據實際材料及馬克思學的正確應用，解剖無遺。對這新帝國主義的十年來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尤穿擊指摘到體無完膚。當然中國問題在裏面也占很重要的一頁，「不許干涉中國革命！」的口號為作者熱情的絕叫。譯者根據原文及模範的日譯本譯成于此，敢斷言這才真是十年來的世界「真相」，任何關心「中國與世界」問題的人皆不可不手置一卷！

德國博洽德著 嚴靈峯譯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實價七角

本書係世界有名的通俗資本論著者博洽德的傑作。本書的特色處，就在它能把艱深的學理與以「通俗化」；如果拿通俗資本論與本書相較，則前者甯可說是資本論之精華；而本書則是「名符其實」，堪稱為初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唯一良好的著作——尤其是要讀通俗資本論和資本論者非先讀此書不可。全書都十萬言，凡十九章，譯筆流暢，可以信賴。

■ 我 的 生 活

托洛斯基著 成紹宗譯

(上冊) 實價一元二角

著者是二十世紀國際革命戲劇的偉大天才導演家，同時他又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他的傳記不僅富於歷史文獻的意義，且亦富於實際政治的意義。這部自敘傳，是他最近流放生活中的產品，書出以後，英法德日的出版界競相傳譯。這部著作可以說是著者政治天才與文學天才的交織品，所以竟能轟動國際出版界，在國際革命青年中普遍得着熱烈的同情與景仰。

■ 歷 史 的 唯 物 論

畢斯列夫斯基著 嚴靈峯譯

這是一本通俗扼要而又適於學校教授的歷史唯物論教科書。書分三編，第一編為辯證法的唯物論，第二編為社會科學中之辯證唯物論或歷史唯物論，第三編為歷史唯物論的考證即社會現象研究的方法。著者為俄國有名的教授，本書即係根據其教授經驗而編成的。在同樣題目之下，本書有其獨特的價值，無論未研究或已研究者，均應一讀。

辯證邏輯的基本原理

彭葦森譯

辯證法這個名詞，在中國思想界已是流行得很廣了。但什麼叫做辯證法？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的異點何在？二者之間的關係如何？他們是不是不能併存的？辯證法這一思想法則，其基本原理如何？怎樣具體運用之以觀測事物發展的實際？讀過這本簡括扼要的小書，對於以上這些問題，即可明確的得一解答。

唯物史觀之具體運用

坡克洛夫斯基著 余囂如譯

著者是全世界知名的第一個馬克思派歷史家，所著四大本俄國史是一部別開生面的不朽著作。本書中所包含的幾篇文章，是以唯物史觀論點討論歷史學的重要文獻。有心研究唯物史觀之具體運用者，必須一讀此書。

日本改造社版經濟學全集第四七卷
劉 侃 元 譯

產 業 合 理 化

大戰以後席卷全世界（連蘇俄也在內）的「產業合理化」，資產階級及其使徒——第二國際理論家——曾幻想之謳歌之為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等子返老還童。但是問題的解答首先要馬克思經濟學考察，其次當從唯物歷史學去把握。由前一個研究法可以發見其經濟學上的本質，後一個研究法可以發見其歷史學的具體。本書則正是這種立場出發，對本問題的最大研究結晶。全書四十萬言，合理化的「意義」；與「勞動階級」；與「國內市場」及「國外市場」；以及「世界經濟之現狀」等。概用十二分的內容闡發得至精且詳。統計及圖表近百種；各國的經濟情況皆一覽無遺。譯筆極忠實平敏。不久出版，謹與新時代的進步青年！

盧樸爾著 楊東蓀譯

烏 里 雅 諾 夫 與 哲 學

實 價 八 角

本書為解說烏里雅諾夫之哲學的名著，其要目如下：序論，存在與思維問題，唯物辯證法的問題，社會的方法論的問題，普羅獨裁問題，文化問題。對於研究哲學的朋友，這是一本必讀的書。其他研究社會科學者，亦有一讀的必要。

馬克思著 許楚生譯

哲 學 的 貧 乏

實 價 七 角

這是馬克思批評蒲魯東學說的一本名著。他在這本名著中不獨開始闡明了唯物史觀和漸經濟學的理論，並且推毀了資本主義經濟學說之立論的根據，為研究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革命理論的人所不得不先讀的一本書。譯者是依據第三版法文原本，參攷英日文譯本，對照蒲魯東的《貧乏的哲學》來翻譯的。遇有艱深難懂的地方，特加以註釋。譯筆流暢清醒，絕無令人感覺不懂的地方。

昂格斯等著 許楚生譯

馬克思的學說及其生平

這是昂格斯，蒲列哈諾夫，拉發格，烏里雅諾夫，盧森堡，黎雅特諾夫等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文和對於馬克思的一些傳略，黎雅特諾夫近時為着國際勞動者對於馬克思主義之一個深切的領悟而編輯的一本好書。他其中有的是有系統的介紹馬克思的學說，有的是很科學的說明馬克思的思想來源；有的是敘述他革命的經歷，有的是追憶他生活的狀況。並且還有他女兒對於他的一篇行狀，和他自己生前的一篇記錄，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譯筆亦活潑動人，為出版界所不可多見之著述。

反 杜 林 論

昂格斯著 林超真譯

本書係科學社會主義之一個創立者昂格斯有系統的批評杜林學說之一部著作。杜林的學說成一個體系，本來是無所不包的，因此昂格斯的批評也不得不涉及一切方面。『從時空的抽象觀念到稜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動的永久性到倫理觀念的暫時性，從達爾文的天擇論到未來社會的青年教育』。可是因此昂格斯這部論戰體的和批評體的著作，反成爲一部很好的有系統敘述馬克思主義之世界觀和社會觀的名著。在馬克思和昂格斯本人著作中這部書算是系統敘述他們二人學說的唯一名著。在社會主義文獻上，這部著作所佔地位并不亞於馬克思的資本論。著名的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小冊子就是摘錄本書中若干段而成的。譯者林先生對於馬昂二氏學說素有精深的研究，譯文之忠實可靠是不待言的。

德 國 農 民 戰 爭

昂格斯著 吳西岑譯

實 價 七 角

農民問題是目前中國嚷鬧得最利害的問題。所以特地把這本名著翻譯出來，使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得個更正確的認識。譯文係以黎雅贊諾夫所纂馬克斯主義者叢書本爲依據并參以英譯。書末附有重要的註釋。凡研究社會科學及欲了解農民問題者，不可不讀此書。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烏里雅諾夫著

彭葦秋
杜畏之
合譯

(上冊) 實價一元四角

本書和『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一樣，是烏里雅諾夫在理論上一本最重要的系統著作。作者以正確的經濟學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當時俄國的農業與工業的狀況。指出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及其趨向。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證明當時民粹派經濟派之錯誤。它是後來烏里雅諾夫一切實際行動策略的基礎。若對於目前中國經濟狀況有個正確的認識，不僅要懂得馬克思主義，尤其重要的是學得馬克思主義之實際運用。所以，我們急于將這本書譯出來供獻給讀者，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經濟的榜樣。每個讀者細心的讀了這一本書之後，總會看出烏里雅諾夫是怎樣的在實際分析中巧妙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全書共四十餘萬言，除中國外世界各國都有譯本。本書係直接根據俄文原本譯出，間或有參及日文之處。

英國韋爾斯著

蔡慕暉
蔡希陶
合譯

韋爾斯世界文化史

實價一元五角

本書是韋爾斯繼承『世界史綱』而著的富有小說意味的文化史。從地球上尚無生物的時代起筆，凡屬世界文化重要的現象都有簡明卓拔的敘述。『世界史綱』至今尚為中國最首尾完全的第一歷史名著，本書亦當可為中國文化史方面與『社會意識學大綱』，同一適於青年誦讀的好書。蔡慕暉蔡希陶兩位先生今根據英國最近版本譯出，譯筆信達，經陳望道先生通讀一過，認為比某氏譯本好過一倍以上。其信達可知。

日本改造社編

施復亮
鍾復光合譯

蘇聯
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

實價九角

蘇聯是一個新的國家，它的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都與一般國家不同，值得我們作特殊的研究。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論經濟政策，說明蘇聯經濟的由來，蘇聯經濟政策的變遷，蘇聯經濟的現狀及經濟法則，以至最近五年經濟計畫。下篇論「社會政策」，關於蘇聯的階級關係，工會，工錢，勞動時間，勞動保護，勞動爭議，失業問題，社會保險及勞動者的社會地位等，均有正確明瞭的介紹。原書為日本改造社出版經濟學全集中的一部分，著者為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凡欲研究蘇聯經濟及社會狀況者，這是一本極好的參考書。

石濱知行著

施復亮
周白楸合譯

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實價九角

美國是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霸王，是今日世界政治經濟的中心。它的資本主義怎樣發達而來，是每個關心近代政治經濟的人所必須知道的。本書是解剖這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來經濟發達的良著。它從有史以前的亞美利加講起，依次敘述發見亞美利加之經濟的背景，殖民地時代的亞美利加，亞美利加革命前後，資本主義的胎生期，資本主義的成熟期，一直到世界大戰與美國的關係，構成一貫的系統。著者為日本有名的唯物史觀派經濟史專家，其著作被譯成中文的亦已不少，想必大家已知道了。

班納柯克著 鍾復光譯

社會進化與生物進化

實價二角

生物是進化的，社會亦是進化的。闡明生物進化法則的是達爾文，闡明社會進化法則的是馬克思。這是十九世紀兩大偉人的兩大學說，直到現在，最普遍地支配人類思想界的，還是這兩大學說。這本小書，就是說明這兩大學說之關係的，又通俗，又扼要，而且有趣味。譯者根據英文原本並參照日譯本譯出，文字既忠實又流麗。有心研究社會進化說與生物進化說之關係者，這是一本最好的入門書。

山川均著

唐俊夫譯
劉侃元校

國際史論

實價四角

國際運動是資本主義必然的產物，亦馬克思主義最實際具體的結晶。不明乎此不能曉得理論之應用，更不能曉得理論與實際之曲綫的關係。原著者的大名在國內已不須紹介了，本書為量雖不大，然解剖方面與敘述態度極正確，自第一國際以迄現狀皆于其最本質的方面加以展開，和一般流俗的市民的國際史論迥乎兩樣。譯文亦平明，亦真實，敢薦與諸君作良伴。

丁玲作

■一九三零年春的上

——未曾發表過的長篇創作——

一九三〇年的春天的上海，其實是包括全中國，在文壇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偉大的變動。這變動，就是許多作者的紛雜的文學見解，在這時，鎔成兩種對立的思想，因此顯明地，中國的文壇是現着單純的尖銳化。並且在這分化的劇變中，也發生了作者之間的友情的破壞。本書就是描寫這樣新文壇的序幕，尤其深刻的表現出這時代的尖銳化的精神。

長篇小說 胡也頻作

■光明在我們前面

實價 六角

紅色的「五卅」，是我們民衆的空前慘劇，同時也是我們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空前的革命運動。全國的罷市，罷工，罷課，流血，成爲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的動力。所以，不論在革命史上，在思想史上，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都是一個重要的時期。本書的內容，就是描寫那時候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描寫十二萬人大示威的北京的社會生活，並且以直接參加這一運動的人物作爲書中的骨幹。全書共八萬字，有七萬字未曾發表過，是作者的一部比「到莫斯科去」更尖銳的長篇創作。

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

社會科學教科書第三冊

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總發行所 春秋書店

上海愛文義路普益里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